

引　　言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新旧世纪交替的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主动 力。在科学之手的牵引和带领下，人类摆脱了愚昧和无知，远离了迷狂和崇拜。追逐着科学的理性之光，人类一步一步走出困惑和疑虑……科学的昌明，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环境；科学的昌明，正在更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精神世界。

然而，科学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愚昧与迷信的终结。纵观今日世界，晨钟暮鼓依然声声斥耳，香火袅袅仍旧历历在目；各种各样的“教”，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颇显兴旺；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教主声望日隆，教众趋之若鹜。各种各样的迷信活动也并未因科学的兴盛而销声匿迹，反而打起了科学的幌子，有扩展的迹象。譬如，电脑的出现，却给某些人提供了一种高科技的算命工具；因特网的兴起，反而给各种“教”提供了一条新的便利的传播通道……

在我国，宗教信徒的数量十几年来又有上升的趋势，而

且信徒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对邪教进行了打击，邪教在我国基本上销声匿迹。然而，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总是伴随着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以往的计划经济，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旧价值观的碰撞造成了人们心灵的巨大阵痛，给迷信乃至邪教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契机。“法轮功”的出现更是猛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原来邪教还在我们身边，迷信一直还是深潜人心的一种普遍心理，一旦掉以轻心，它们就会乘虚而入，抓住机会，迅速滋长蔓延。我们面对新的历史进程，面对新的社会问题，该如何树立新的科学的价值观，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世纪之交之际，当科学与现代化的车轮迅速推进的时候，历史老人却与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原本在神州大地已经销声匿迹的各种迷信活动，竟似蛰伏冬眠的动物在春天里复苏，不知不觉中又卷土重来且愈演愈烈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兴邪教与沉渣泛起的迷信活动，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招摇撞骗。特别是邪教，更完全以宗教的面孔出现，混淆人们的视听。在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的现代社会，它们比以往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使许多善良无辜的人们无法分辨它们的真实面目，误入泥淖，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非常迫切的课题。

宗教、邪教、迷信——三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成为当今世界人们不得不常常面对的问题。然而，当人们面对它的时候，却往往是一团迷雾，无法做出正确的辨别，

从而造成方向的迷失。因此,我们在极力昌明科学、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亟需对宗教、邪教、迷信重新加以理性的审视,厘清它们发生、发展的源头、脉络,辨析它们的不同属性,区分它们的不同功用,以期更好地发挥宗教的进步作用,彻底揭开邪教与迷信特别是邪教欺骗虚伪的面具。

一 宗教：缥缈的海市蜃楼

在山东蓬莱庙岛群岛海域，每年春夏之际，偶尔可见到一种奇特的景观：倏然之间海雾缭绕，缭绕之中隐约可见宫阙闪现，楼台榭阁，歌舞笙箫……宫阙前或车水马龙，或幽幽寂静。多么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这种奇异的幻境，即海市蜃楼。它是由光线经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时，把远处景物显示在海面上所形成的。

宗教正是这样一个缥缈的海市蜃楼，它令人向往，却又虚幻不实；它描绘的是神仙世界，却又是现实世界的折射；它常常给人希望，却又往往令人失望……这就是宗教——人类精神世界的海市蜃楼。

1. 从圣诞节到麦加城——世界宗教概观

每年 12 月 25 日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纪念基督耶稣诞生的节日。而每年的伊斯兰历十二月，对伊斯兰教更为重要，是穆斯林的朝觐月。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都有一二百万人，他们来自 100 多个国家，有着不同



宗教：缥缈的海市蜃楼

的肤色,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的乘坐最现代化的飞机和高级小轿车;有的骑着骆驼、骏马或毛驴;有的甚至跋山涉水,徒步而来。每当这个时候,在麦加城郊 10 公里内外的各个山坡上和谷地里,就搭满了一排排各式各样的高大帐篷,人山人海,盛况空前,麦加城简直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迷人世界。麦加朝觐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人物之众多,精神之执迷,可以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宗教现象。对于一切虔诚的穆斯林,赴麦加朝觐乃是他们一生中渴望实现的最崇高的理想。宗教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影响广泛的社会现象。相近或相同的宗教信仰,可以拉近两个民族的感情;而宗教信仰的差异,却是以导致一个民族不同部分之间的战争。

(1) 种族宗教和世界宗教

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认为,原始人把人的灵魂看成是不灭的,人死后将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这是宗教产生的最初根源。在生活于距今约 10 至 4 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中发现的随葬物,证明当时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被视为最原始的宗教发现。此后,宗教的发展经历了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鬼神观念与天命观念,经历了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直到人格神的形成等过程。现代发展成熟的宗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包括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宗教设施和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宗教仪式、专门的神职人员等。

世界上的宗教纷繁复杂,宗教徒的数量估计一直保持在占世界人口的 $3/4$,即在 36 亿人以上。各种宗教信徒数

量和流传区域不尽相同，有的宗教流传区域较广且信徒众多，有的宗教流传区域则较窄且信徒数量较少。《不列颠百科年鉴》列举的几个大陆地区的宗教有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巴哈伊教（大同教）、神道教以及中国民间宗教、新宗教、部落宗教、萨满教、其它宗教等等。

根据宗教流传范围的不同，一般可以将它划分为种族宗教和世界宗教。种族宗教是由一个民族的成员共同信奉的宗教，它所崇拜的通常是一个民族的保护神，充当这个民族的祖先或造就者。一般来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犹太教、印度教、神道教等是当今世界上影响较大的种族宗教，信奉的人数比较多。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也仍流传着种族宗教。

世界宗教则是有许多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其崇拜的是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其信徒特别重视传教活动，从而使这一宗教广为流传。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是典型的世界性宗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历史都很悠久：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 7 世纪；基督教起源于公元 1 世纪中期；佛教更是创立于公元前 6 世纪，有着二千年的历史。这三大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衍化分裂出许多宗派，如基督教当今已有 150 多派，佛教和伊斯兰教亦各有数十派。

所有流行于一定地区的宗教都同产生它的民族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信仰内容和崇拜形式无不具有自身的特点。即使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样的世界性宗教，在传播过程中，也都带上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特性。

有一些宗教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即宗教组织与政权机构完全同一，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政治领袖，宗教法规和伦理道德直接充当了社会法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伊斯兰教在其形成之初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宗教。现在有的伊斯兰国家仍然是政教合一。西藏的喇嘛教在民主改革前也是政教合一的宗教。

有的国家未采取政教合一的形式，但宗教与政权组织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常常被国家奉为国教。处于国教地位的宗教，一方面在社会中享有许多特权，另一方面又要听命于世俗政权组织。国教和政权组织在社会管理上各司其职，但又互相配合。基督教在 4 世纪曾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灭亡后，它又在很长时间里充当欧亚许多国家的国教。佛教在古代印度以及中国南梁王朝时也曾经做过国教。它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至今仍是国教。日本神道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失去国教的地位。亚非地区，现在有不少国家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

(2) 世界三大宗教的现状和趋势

各种宗教信仰人数不同，分布地区也各不相同。其中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其庞大的信徒数量以及广泛的分布区域是其它宗教所不能比拟的。根据美国《教会研究国际公报》1993 年第 1 期的统计数字，全世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信徒人数约 18.7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33.5%；伊斯兰教信徒约 10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18.2%；佛教徒约 3.34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6%；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和其它宗教信徒共约 10 亿

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18.2%；无宗教者和无神论者约 11.5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20.7%；信仰情况不详者 1.9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3.4%。三大宗教信徒总数已占世界总人口的 57.7%。

从近年来的趋势看，三大宗教信徒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如据《不列颠百科全书·1988 年年鉴》统计数字，那时基督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 32.9%；穆斯林占世界总人口的 17.2%；佛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 6.2%。以前引 1993 年的数字与 1988 年的数字相比较，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所占比重略有增长，而穆斯林所占比重的增长又比基督教徒略高，佛教徒所占比重稍有下降。

基督教徒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虽有所增加，但从各地区来看，增减情况却各不相同。从近百年来的总趋势看，基督教徒在欧洲和北美人口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在非洲、东亚和南亚人口中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例如，1900 年基督教徒在欧洲人口中的比重为 96.9%，1970 年下降到 88.3%，1989 年更下降到 83.7%；在北美，1900 年基督教徒在人口中的比重为 96.6%，1970 年下降到 91.2%，1989 年更下降到 86.5%。而在非洲、东亚和南亚，情况却相反。1900 年基督徒在非洲人口中的比重为 9.2%，1970 年上升到 40.6%，1989 年稍退到 39.3%；1900 年基督徒在南亚人口中的比重为 1.2%，1970 年稍退到 1.0%，1989 年上升到 2.7%；1900 年基督徒在东亚人口中的比重为 0.4%，1970 年上升到 1.4%，1989 年猛升到 6.1%。而在拉丁美洲，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重处于基本稳定而略有下降的状态。

这些数字表明，基督教徒在它的第一故乡欧洲和第二故乡北美洲，明显地走向衰退。在它的第三故乡拉丁美洲也已处于停顿状态，甚至可以说已开始出现某些衰退迹象。近 10 年间，甚至在非洲也呈现出衰退趋势。但在南亚和东亚，却一直在上升，特别是东亚，近 10 年间可说是猛升。基督教在欧洲和北美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显然是因为那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生活方式走向高度现代化，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趋于世俗化，宗教观念也就越来越淡化。而在亚洲，佛教态势处于稳中略降的同时，基督教却趋于上升，显然是由于近二三十年间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正以高速度奔向现代化。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商品大量涌出的同时，西方的基督教也获得日益增多的信徒，是可以想见的，而且这种上升趋势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以拉丁美洲的情况作为参照来看，上升趋势不大可能持续太久。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看来只有伊斯兰教显示出相当强劲的上升趋势。这不只是表现在信徒数字上，更表现在近年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中。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达 90 多个，其信徒占全国总人口 80% 以上的国家有 30 多个。^①

在我国，据不完全统计，现有各种宗教信徒 1 亿多人，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8.5 万余处，各种宗教教职员人员约 30 万人，全国性和地方宗教团体 3000 多个，宗教院校 74 所。各教都自己出版经典、书刊，其中仅《圣经》的印数即达

^① 《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第 296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2000 万册。中国各宗教团体已同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宗教人士建立了联系。在中国的人大、政协中，都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当选为代表、委员。在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宗教界人士有 17000 余人。我国特别尊重少数民族的信教自由，目前，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群众有 1800 多万，清真寺 3 万余座，伊玛目、阿訇 4 万余人。其中新疆信教群众有 810 多万，占全新疆总人口的 56.3% 以上；有宗教活动场所 2.3 万座，其中清真寺 2 万多座，宗教教职员人员 2.9 万多人，宗教团体 80 多个。在西藏，藏传佛教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1700 多处，住寺僧尼 4.6 万多人。^①

2. 玉皇大帝与如来佛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后，在小孩子中间造成很大困惑，他们常常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即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究竟谁的本领大？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如来佛战胜玉皇大帝。一个小小的孙猴子左一个玉帝老儿，右一个玉帝老儿，当初大闹天宫玉帝也奈何不了他；但孙猴子见了如来佛却是毕恭毕敬，因为孙猴子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还好，《西游记》里只有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如果再加上上帝和安拉，小孩子可就犯难了。小孩子是天真的，他们不知道如来佛为什么比玉皇大帝厉害。其实答案就是信仰，孙悟空师徒 4 人信仰的是佛教，或者说吴承恩信仰的是佛教，因而要抑道扬佛，如来佛当然威力无比。

^① 《中国人权发展 50 年》，《光明日报》2000 年 2 月 18 日，A3、A4 版。

既然如来佛如此厉害，碰到困难自然找他解决就行了，但是，如来佛在哪里？他真的存在吗？

在一本名为《要理大全》的天主教宣教读物里，第一章开宗明义的一个问答就是：“问：你信天主吗？答：信天主。问：什么是信天主？答：就是信真有天主。”至于天主为什么“真有”，它并不去讲，而只是要人去信。不信会怎样？书中写道：“信的赏升天堂，不信的罚下地狱。”看来，如若不愿下地狱，只能不问青红皂白地相信才是。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宗教是一个只有信仰的领域，只要信仰就行。离开了信仰，也就没有了宗教。对于神学家们和宗教信徒们来说，他们并不是想说明什么，而只是要相信什么。因而，宗教的世界，是信仰的世界。

(1) 神的王国

在宗教的观点看来，相对于人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神的世界存在。《旧约·创世纪》第1章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是人和万物的主宰，人只是神的奴仆，人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神的恩赐或惩罚。人在神面前，神高大无比，而人是渺小卑微的。超社会的、超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神灵正是人的信仰对象。

对于宗教信仰者而言，灵魂不灭和超验世界的存在是其信仰的前提。因此，神与人的关系构成了宗教的基本内容：第一，信仰与崇拜一种或数种根本不存在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神，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佛教的佛陀，道教的玉皇大帝等；相信人世间万物都由一位全能的神所造，神是宇宙间惟一的主宰，神的王国是

至福的境地。由于人是按神的形象造成、并秉受了神的灵气，所以，人可以通过宗教的途径蒙神救援或成为神，并进入神的王国。道教主张世间一切皆由神秘的“道”衍生而来，人可修炼而得道成仙。佛教认为有情世界变幻无常，尽是苦难，惟有涅槃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之苦。第二，相信灵魂不灭，认为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神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天堂、地狱、极乐世界、火狱等。宗教教义承认存在着现实社会之外的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并把这个神秘领域作为认识对象，探讨和回答“人”与“神”的关系、“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今生”与“来世”的关系。宗教教义一般都认为永生、解脱、灵魂得救、进入天国这些彼岸世界的幸福是真实的、至关重要的，神灵是世界和人类的主宰者，而人类应当以神的意志为意志，应当依从于“神启”、“神谕”，依从于“天意”、“天命”，违反神的意志必将招致“神谴”和祸殃，信徒们应该祈祷、斋戒、朝拜、禅观、苦修，以获得神灵的庇护，甚至转为神灵。

伊斯兰教讲有“六大信仰”，即：①信仰安拉是唯一的神；②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③信天使；④《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⑤世间一切事物均由安拉前定；⑥信仰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简称为：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前定、信后世。基督教把“信、望、爱”作为“三主德”，而以“信德”居其首；佛教则通过苦、集、灭、道“四谛”即轮回等教理维系着佛教徒的信仰。

背弃信仰，是一个信徒的莫大之罪，它意味着对原信仰的神的抛弃。各种宗教只能信仰自己的神，信仰别的神就是

对自己宗教的背叛。基督教《圣经》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降谕摩西十诫称：“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伊斯兰教同样严格强调一神论信仰，只能信真主安拉，真主至尊至大，背离真主，将永坠可怕的火狱之中，决不可崇拜那“以物配主的”，“万物非主，惟有安拉”。佛教徒的心也只能向着西天佛陀，所以孙悟空才不敢在如来佛祖面前撒野。犹太教同样也严格规定不准崇拜它神。不同的宗教，其神的王国是各自独立，互不搭界的。

(2) 神启的宗教

人们为什么要信仰宗教？宗教是如何形成的？每一种宗教都有关于自己宗教起源的解释，有一系列关于自身起源的神话、教义和理论学说，从而为宗教信仰寻找依据。尽管说法各异，但是都强调宗教源于超自然的神的启示，宗教信仰具有神圣性质，因而宗教徒必须皈依和忠诚信仰。

一些比较古老的宗教把自己的产生追溯到一位主神，直接把某一个神作为它们的直接创立者，或认为这个神与它的信奉者有血缘联系。比如古埃及宗教的主神是太阳神，法老是太阳神的儿子。日本的神道教认为，天照大神是治理上天的主神，它的孙子琼琼杵尊为人世间第一位统治者，这是日本世代相袭的天皇制度的渊源。中国的道教，奉春秋时

代的思想家老子为教主，并将其神化为三清尊神之末道德天尊。

还有一些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它们自称是启示宗教，即把它们宗教的来源看成是神的启示。据犹太教经典记载，摩西奉上帝之命率领以色列人摆脱埃及的奴役，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定居。其间，上帝在西奈旷野中与摩西立约，以色列人从此以后要奉神耶和华的名，而神耶和华则允诺庇佑以色列人。上帝甚至把以色列人应当遵守的宗教律法告诉摩西，让以色列人时刻遵守。

基督教则认为，基督耶稣是上帝派来降世救人的主。《新约全书》中的福音书记载，其母玛利亚因圣灵受孕生耶稣于伯利恒，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生前的主要任务是传道与创教，并为贫苦百姓治病，最后用生命作代价赎去了人们的罪过。他死后 3 天复活升天，并宣称将复临人间，建立理想的“上帝之国”。基督教会是基督的门徒根据他的教诲和安排而建立的。

伊斯兰教则宣称，它是穆罕默德根据上帝安拉的天启而创立的。安拉为救人先后差遣 315 位使者向世人传播神的启示。穆罕默德是安拉遣来的最后一位使者，故又称“封印使者”。他最终完成了安拉救人的启示，创立了能够给人以永生的伊斯兰教。第一次天启，是在穆罕默德 40 岁莱麦丹月 27 日（回历 9 月 27 日）夜晚降示，据说正当他在希拉山洞沉思时，突然听到命令他宣读的声音：“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这是哲布勒伊来天使传达安拉的神谕，让穆罕默德成为“先知”。他听到这个声音很惊慌，

急忙跑回家，要妻子拿被子给他蒙上，接着，他又接到启示说：“盖被的人啊！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从此，穆罕默德便以先知警告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宗教活动，创立了伊斯兰教。

起源于古印度的一些宗教，如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等，虽然大都把一些得道的宗教导师作为自己宗教形成的渊源，但也与某种神启的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佛教为例，佛教把释迦牟尼作为其创始人，释迦牟尼原本为求摆脱生老病死之道而出家苦修，他四处求师并苦修 6 年终不得其解。后来，他换了一种方式重新思考人生的真谛，终于在菩提树下悟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道理，并开始收徒传道，从此创立佛教。后来的佛教把这一悟道的过程附会进了许多神话因素，如释迦牟尼修道时曾受魔鬼的考验，得到觉悟后具有无边法力等，使佛教具有了神启的特征，渲染了其超自然的特点。

各门宗教之所以把它们的产生同某种神启的力量联系起来，就是为了宣传它们的神怪性，把自身的存在附会成神的存在，宣扬与神沟通的能力。这种超自然主义的宗教起源说，能够极大地满足宗教信仰者的心理需求，使信徒们以为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真的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人，使信徒们获得与信仰对象沟通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解释才能长期地为人们深信不疑。然而，这些说法与其说是对宗教起源的说明，不如说是对宗教信仰的一种宣传或解释。

(3)“神圣的”与“世俗的”

宗教把世界分为两类：一是现实的世界，一是理想的世

界;现实的世界是“世俗的”,理想的世界是“神圣的”。

每个宗教都无一例外地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神的王国。神的王国是神圣的,具有神圣的称呼、名称。譬如,基督教的上帝又被称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耶稣被称为圣婴,耶稣诞生称圣诞,他的母亲为圣母。与神圣的神的王国相对应的,是现实的世俗世界。许多宗教把人的世俗生活看作人生苦海的地狱,或者在死后的灵魂世界里设一个地狱,与神圣幸福的天国相对应,宣传人的一切现实的世俗活动都要照顾死后的幸福,一切修心、修身、修道的信仰活动,都是为了死后的造化,即进入神的王国。神的王国以其神圣性,决不容许人们对它怀疑、持异议和反对,人们只有信从它,信仰它。

实际上,对于宗教信仰来说,只要与神发生联系的,都是“神圣的”。寺庙、官观、教堂、清真寺等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因而被称为圣堂、圣殿。这些建筑都建得宏伟、庄严,人们进入这些建筑都要敛神、静心、虔敬、肃穆。宗教的经典被说成是传达神的旨意,称为圣经、圣书,具有神圣性。颂经时,虔诚的教徒必须先整衣洗手,排除杂念,决不允许嬉笑、戏谑。宗教仪式中唱的歌也不同于一般的歌,而是圣诗、赞美诗。就连宗教的教职员也被称为神职人员。

这就清楚地表明,所谓“神圣的”,就是在信仰界内的,或者是信仰对象本身,或者是与信仰对象有联系的事物。凡是离开信仰视界的,都是世俗的。一句话,信仰的就是神圣的。

(4) 麦加朝觐是“活受罪”?

麦加朝觐是一种异常艰苦的宗教仪式，在非穆斯林看来简直是“活受罪”，因为麦加地区气候奇热，干燥闷人，加上这里的山野一片光秃，既无绿荫又无溪流，四周山上的黑色火成岩和山谷中的沙石，发出强烈的热辐射，人人其境，如蹈火盆。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朝觐者还要光着脑袋，顶着烈日，脚踏灼热炙人的砂石上，身裹露肩朝服，在百万人流中拥挤旅行，辗转多地，来回奔波，又露宿山野，戒除一切个人娱乐。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并且有的贫苦人不惜把自己一生辛勤劳动所积攒下来的一点钱财，全部变作路费去麦加朝觐，其中有的人路费花光了，沿途乞讨继续前进；有的人因饥饿与疾病，死在路边。然而，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活受罪”。对于一切虔诚的穆斯林，赴麦加朝觐，乃是他们一生中渴望实现的最崇高的理想。他们认为，朝觐就是“返回到人的本原，回到了真主身边”。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忍受这一切艰苦，凭的就是他们对所信奉的宗教的坚定信仰。信仰给了他们信心、勇气和力量。

更有甚者，一些信徒的宗教信仰热情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像的，他们甘愿为神而赴汤蹈火。印度教派在大祭日子里，当载着毗湿奴神像的圣车开过时，沿途大批教徒为了表达对神的虔诚，争先恐后地投身子于车轮之下，车过之处，横尸遍地。教徒坚信肉体是罪恶的载体，灵魂永不会死亡，只有肉体死亡之后才能升天或来世转生，获得高贵的灵魂。在他们看来，这不是死亡，而是永生；不是痛苦，而是幸福。

我们从麦加朝觐这一宗教仪式上，以及印度教徒甘愿为神而赴汤蹈火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信仰在宗教中的核

心作用。一般来说，宗教是由宗教心态、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三大要素构成的体系，其中宗教心态是整个宗教要素的前提。宗教心态就是宗教信仰，是对宗教的确信、崇敬、依从的心态。只有首先坚定地信仰某一宗教，才能成为真正的宗教信徒，也才能够自觉自愿地参加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各种宗教无不十分重视信仰的纯正和坚定。如果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一切宗教活动都不过是虚应故事，徒具形式，一切宗教组织也必然名存实亡，也就根本不存在宗教。

(5)两种不同的信仰

通常，讲科学理论时也称信仰。对科学理论的信仰，指的是一种对科学真理的相信态度和坚持态度，这与宗教信仰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信仰。二者的不同首先在于信仰的对象不同。宗教信仰的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世界”，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神秘主宰。信仰的是论述神的理论的宗教教义、宗教神学理论。宗教教义把永生、解脱、灵魂得救、进入天国这些彼岸世界的幸福看成是真实的，具有至上的价值，而今生在尘世中的世俗生活则是虚幻的，只具有虚幻的价值。科学信仰正好相反。科学信仰的对象是现实的世界，信仰的是论述自然、社会发展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科学不承认现实世界之外存在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神秘主宰，只承认存在人类认识目前无法达到的未知领域，并且相信人的认识最终会揭示这一未知领域的真面目。科学理论不去讨论无法为经验所证实的、虚幻的问题，只相信现实的经验世界。对科学真理的信仰和坚持是以经验作为基础的。在科学

信仰看来,彼岸世界是虚幻的,彼岸世界的幸福只是一种虚幻的价值,而现实世界里的生活才具有真实的意义。

二者的不同还在于,宗教信仰只要人们相信,不容信徒怀疑,更不容信徒反对,人们只能一味地盲信盲从。这就使宗教教义、命题能够长久保持不变,使宗教信仰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在现实的需要面前,例如在久旱不雨或久病不愈的折磨下,宗教虽然并不绝对地排斥人的努力,但却认为主要应该依靠“神力”与“神恩”,此岸的需要与彼岸的需要都必须祈求和依赖于神力之助和神的恩典,信徒最需要做的就是求神拜佛;而科学信仰有严密的逻辑基础,实际上是对理性的相信和坚持,科学容许人们怀疑,坚决反对盲信盲从,因而科学理论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因此,科学理论的世界,是一个经验与逻辑的世界,这便与宗教信仰的世界有了本质的区别。

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二者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具有非功利性,而科学信仰具有功利性。宗教信仰在其信徒看来是神圣的、高尚的,是一种净化灵魂、拯救灵魂的行为,不是为了达到一定功利目的的活动,是非世俗的、非功利的。这种非世俗、非功利性,一方面使信徒们无视现实的社会生活,专心于寻求虚幻的天国,使宗教信仰成为“精神鸦片”,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精神追求。科学信仰的目的是为了运用科学的力量获得对世界的功利性改造,以便获得实际的社会利益,是一种世俗的活动。科学信仰的世俗性、功利性,一方面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类的精神更新。

3. 终极眷注：精神的家园

英国作家拉什迪曾写了一部小说，名叫《撒旦的诗篇》。作者本想名利双收，不料小说出版后，却引来了杀身之祸，被伊斯兰教认为是亵渎了神灵，伤害了教徒的宗教情感。伊朗伊斯兰法庭判处拉什迪死刑，伊朗精神领袖向教徒们发出了追杀令，所有伊斯兰教徒只要遇见拉什迪就应杀无赦。这让拉什迪呆在英国十几年不敢露面，不仅英国人派重兵保护，甚至还引发了英、伊间的外交战，直到最近伊朗才取消了追杀令。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也曾出现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份文学刊物发表了一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小说的内容涉及许多西藏宗教习俗，然而不恰当的描写却伤害了西藏佛教徒的宗教情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严重关注。不仅小说作者本人，而且刊物主编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那么，究竟什么是宗教情感？为什么宗教情感在宗教信仰中如此重要呢？

(1) 情感的世界

从无神论的角度看待宗教，所谓无所不能的神灵的存在、人们为信奉宗教所举行的各种仪式，如朝觐、忏悔、灵童转世等，都令人觉得不可理解。然而，宗教毕竟产生了，并且始终存在着，影响也非常大，以至于世界上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还多。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种信仰，宗教渗透了人的情感。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想像、情感需要、情感愿望统统加在神的身上，把自己的情感通过宗教表现出来。可以说，宗教的世界，就是情感的世界。

①宗教体现了人的精神需要。人生在世，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有物质追求，也有精神追求。宗教正是适应人的精神需要和追求而产生的。情感是某一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体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人的精神需要，因而才有了宗教情感。

“在所有地方，也就是说，在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深层里，宗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家园。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它居于人类精神整体中的深层。”^{①②}这里的“基础”“深层”的意思是，宗教指向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一面。“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眷注。”^②具体地说，这种“终极的眷注”，在道德领域，是作为道德需求的无条件的严肃性；在认识领域，是作为对终极实在的热切渴望；在审美机能方面，是作为表达终极意义的无尽的期望。简言之，就是一种精神的终极需要，一种精神的至高追求。这种精神的需要和追求，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情感的最深切的表现。

宗教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由于认识的需要、求知的需要。人们需要对环境和自身做出一定的理解，甚至是追根究底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终极眷注”了。这种终极的解释往往被追溯为超自然的原因。正是这种对超自然原因的需要和“眷注”，才形成了超自然的解释和信仰，亦即形成了宗教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也是人类追根究底的精神需要所创造的产物。自然，宗教也就包含着和体现着人类精神需要这一情感因素了。

^{①②}蒂利希：《文化神学》，第 7 页，工人出版社 1988 年版。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求知的需要基本不需要靠宗教来满足了，但是人类追根究底“终极眷注”的精神需要仍然存在，而且表现得更为迫切。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却带来了部分人们精神的空虚。充实人的精神需要，“愿自己更高尚”，成为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新的入教动机。入教满足了现代一些年轻人的精神需求。在现代加入宗教的一些年轻人中，大多数人怀着种种不安、烦恼或者寂寞孤独感。他们常常发出“什么都没有意思”；“人生是什么呀？”；“愿我活着有价值”；“人世如同地狱”；“我该怎么办？”等等感叹和疑问。加入宗教可以从精神上消除人们的这些疑问，这从反面上说明宗教体现了人的精神需求。

②宗教包含着人的愿望。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宗教都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与崇拜。其实，这正是人类试图支配自然的愿望的曲折表现。恩格斯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人们在宗教中赋予神灵、上帝以无穷的超自然力，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现实的自然。实际上，神灵、上帝等超自然力量是不存在的，人们硬是通过想像创造出万能的神灵和上帝。正是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折射出人类试图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伟大愿望，表明了人类对万能目标的热切追求。众多的宗教传说、神话，乃是人类在想像中、幻想中对大自然的征服。由于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35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过去只存在于宗教和神话中的事情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其实就是人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中充满了人的愿望。

宗教非常讲究“心诚则灵”的道理。要实现人的愿望，就要对宗教教义深信不疑，而深信不疑需要情感上的虔诚。要达到心悦诚服地信仰宗教，需要有热切渴望的情感心境。其实，“心诚则灵”命题本身就已经内含了人的愿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宗教就是人的情感愿望的产物。

③宗教表现着人的喜恶。人有喜怒哀乐，在宗教信仰中也充满了人的喜恶之情。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有其依赖的一面，表现为喜的情感；也有其恐惧的一面，表现为恶的情感。这种喜恶情感在宗教信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人们把神分为善神和恶神就是这种情感的表达。

恶神被认为会给人带来厄运，人们对其怀着一种恐怖的心情予以供祭。人们常把地狱中的鬼神当作恶神进行描述。据《目连救母》的佛经故事上说，目连为了拯救被打入地狱的母亲，曾向如来佛请求前去地狱探望。他在地狱中一处处寻找，只看到一幅幅刀山剑树的恐怖景象。最可怕的还是那阿鼻地狱，在这里受罪的人，一日万生万死，痛苦万状。这种对恶鬼的描述，表现了人的宗教情感中避恶的一面。

善神被认为会给人带来好运，人们对其怀着敬仰的心情予以供奉，祈求他们的帮助。这种善神起初多为本氏族、家庭成员死后变成的，并成为祖先崇拜的先导。人格神形成以后，人们给这些神赋予慈悲、和善等形象，如如来佛方

面大耳,无所不能,除恶斩魔;观世音菩萨慈眉善目、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这都表现了人的喜善的宗教情感。

宗教情感尽管是一种虚幻的体验,是信徒们想像的产物,但它却把人和神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信徒们来说,宗教情感具有神圣性,甚至能够引发宗教狂热,而且其一旦产生,就不会轻易改变、除去。

(2) 恐惧与希望交织的情感

对宗教信徒来说,人的生命、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祸福都源自神的恩赐,只有神能解救自己于苦难之中,只有神才能使灵魂得到安宁,只有神才能使自己洗净罪过而进入天国,得到永恒的幸福。同时也只有神才能给自己带来灾祸,给自己加以罪名打入地狱,甚至可以毁灭自己。宗教徒们对宗教的情感如此复杂,对神既充满了恐惧,又怀有极大的希望。恐惧与希望的交织并存,形成了教徒们矛盾的宗教情感。综括观之,这种矛盾的宗教情感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①恐惧感。人对神有畏惧的情感,甚至有人认为人的恐惧创造了神,产生了宗教。人类最初最惧怕的是自然力量,于是将自然力量神化为众多的自然神,如雷神、水神等,因而,恐惧感是一种久远的宗教情感。恐惧感是一种普遍的宗教情感,包括了对所有神灵的恐惧:对善神,教徒们惧怕得不到庇佑;对恶神,教徒们又怕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实际上,这种恐惧的情感来自于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忧虑:神主宰着人世的一切,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因而人对神惟有敬畏与惧怕。神不仅主宰着人世的一切,而且还决定人死后是升

天堂还是下地狱。各种宗教将地狱描绘得十分可怕，令人闻而生畏。有的寺庙还把地狱的情状做成塑像，恶人有的被倒挂，有的被肢解，有的上刀山，有的下火海，令人看了毛骨悚然，更增强了教徒们的恐惧感。

②依赖感。依赖感同恐惧感一样，都是宗教的基础，没有依赖感也不会有宗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的世俗生活充满了苦难。然而人并不甘心受苦难的折磨，总要与苦难抗争，可是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能战胜所有的苦难，人需要一个救世主或圣人能够帮助他战胜苦难，在情感上有所依赖。成人像儿童一样，也渴望着有人能使他感到可靠、无忧、安全，这就使人具有了宗教情感的心理基础，愿意崇拜偶像，崇拜救世主和圣人。宗教信徒们常常称其信仰的神为“父”，如基督徒称基督耶稣为“天上的父”，宗教徒们对宗教的情感如同子女对父母、奴仆对主人一般的依赖，渴望神的庇佑。

③安宁感。宗教信徒相信神，依赖神，认为有神的庇佑，总能够战胜苦难，逢凶化吉，从而消除了烦恼、焦虑，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安宁感。宗教徒们出于对神的信仰，在情感上形成了顺从神的意志的思维定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由神来安排，认为由神来支配自己的意志，人就获得了解脱和自由，生活就可以平静、泰然，可以无忧无虑地过安宁生活。在宗教信仰中，教徒的安宁感还可以通过修行来达到。宗教一般都认为，人的现实世界的生活充满了痛苦、烦恼，信仰、修行等宗教活动能够帮助人们消除痛苦。例如，佛教认为人的欲望是一切痛苦、烦恼的根源，佛教教义要求信徒们去欲、

去贪、于世无争、于世无求、不杀生、不食荤，面对各种欲望不心动、不去争，做到知足常乐。达到这样的修行境界，就不会有痛苦和烦恼，就会获得一种安宁感。

④恩情感。就是教徒对神的感恩之情。宗教徒通过跪拜、祈求等宗教活动，从神那里获得了庇佑、幸福和安宁，对神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古兰经》中有一段真主对教徒恩泽的描述，“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并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对于善于听话的民众，此中却有一种迹象。……我使你们得饮那从牲畜腹内提出的又纯洁又可口的乳汁。你们用椰枣和葡萄酿制醇酒和佳美的给养。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却有一种迹象。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筑房在山上和树上，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将有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却有一种迹象。”为了表达对神的感恩之情，信徒们不仅要唱感谢神的颂歌，而且经常举行各种感谢神的仪式。

⑤负疚感。就是宗教徒对自己罪过的负疚情感。宗教教义中都有关于人的罪恶意识的内容。对于基督教徒来说，除了从祖先亚当、夏娃遗存下来的原罪之外，自己的言行也可能有罪。佛教徒中的罪恶意识也非常深刻，以至于佛教徒不时口称“罪过、罪过”。中国的道教把罪过与人得疾病联系起来，形成了因罪致病、释罪病愈的观念。这就使教徒背上了沉重的罪恶负疚感。为了免除或减轻自己的罪恶负疚感，教徒们利用各种形式谢罪、释罪，如道教早期教人叩头思过、跪拜思过，后来还设立“静室”让人闭门思过；而忏悔则是天

主教徒必须完成的圣事。有的基督教派特别强调悔改罪过，其礼拜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徒们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犯的罪。

⑥卑微感。去过乐山大佛的人无不为佛像的高大发出自衷的赞叹：“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人在乐山大佛面前还不及佛的一瓣脚趾甲大，显得非常渺小。对于宗教徒来说，神是伟大的，集中了一切能力、智慧、真、善、美；在万能的神面前，人是非常渺小、卑微、无智、无能的，这就使宗教徒们有一种卑微的情感。在宗教的祷告中，教徒们常常是一边赞美主的伟大，一边自薄、自责，说自己如何渺小，如何不配享受神的恩典，如何像一粒尘土，全靠神的指引等等。

⑦神圣感。这是教徒们对宗教怀有的神圣情感。在教徒们的心目中，其所信奉的宗教是神圣的，所崇敬的神是神圣的，教义是神圣的，教堂、寺庙、清真寺等宗教建筑是神圣的，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是神圣的。总之，与宗教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性充盈着教徒的心怀，不容任何人贬低、亵渎。作家拉什迪所写的小说，就是被认为亵渎了伊斯兰教神灵，侵犯了教徒们的神圣情感，伊斯兰世界对他同仇敌忾的态度充分说明了宗教神圣感在教徒心目中的位置。

(3)没有情感就没有宗教

宗教情感与宗教信仰是直接相连系的，没有对神灵、上帝的信仰，就不会有宗教情感。反过来说，宗教情感又进一步强化了宗教信仰，没有宗教情感也就没有宗教。宗教情感使人们相信人类的命运、个人的安危均系于神的安排和掌

握之中，产生一种对神的敬畏心理和有求于神的愿望，对神产生感恩和负罪的心理。对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当他虚幻地体验到神灵赐予他的福祉时，就产生了宗教式的喜悦和欢乐的心情，而当他虚幻地感受到神灵对于他的惩罚时，则会怨恨和责怪自己，并祈求神灵的宽恕，这又产生了怒与哀的心情。由于这些喜、怒、哀、乐的情绪体验乃是由于对神灵的信仰所致，因而成为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甚至能够引发教徒的狂热情绪。

然而，宗教情感并不仅仅止于群体的那种响应神的召唤而激起的兴奋与狂热。实际上，人类祈于神的愿望越多，神给予人的失望也就越多，因此，人类常常要对自己的创造物——神进行审视。在社会发展和进步面前，宗教教义对于人生、对于人世的诠释日益暴露出它的虚伪性，于是人们开始向内寻找人的本性，寻找人生的意义，宗教情感也就成了一种向内的情绪体验，日益注重于那种超越一切的圣洁和庄严，越来越专情于那种悲壮的牺牲和献身精神。正因如此，有的人甚至把宗教情感视作人的本质所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更进而断言宗教是人所必需的，并永远不会消亡。也因如此，现代社会有的信徒在理智上并不信教，但却有浓厚的宗教情感。许多科学家也都是教徒，他们之所以信教，多数就出于宗教情感上的原因。断言宗教是人所固有的这种观点虽然并非人人同意，但它从一个方面说明，情感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宗教情感具有较强的持久性。一种信仰一旦在人的心灵中建立起来，就不会轻易剔除。人有思想、有精神，尽管宗

教观念是虚幻的，然而却是人的精神的一种伟大创造。人笃信其精神创造显示了人的精神本性。一个人从小就接受宗教思想灌输和熏陶，宗教信仰和宗教价值观念就会在其心灵深处扎下牢固的根，潜移默化为持久的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又通过宗教组织的各种宗教活动而得到巩固和发展，时而表现得比较深沉，时而又表现得十分狂热。宗教情感的作用是强大的，是支配宗教信徒活动的一种巨大力量。

宗教情感本质上属于个体体验，然而共同的宗教信仰与崇拜能够使个体的体验转变为群体的共同体验。这种群体化了的宗教情感不仅起着巩固宗教教义的作用，也巩固和发展了群体间的共同意识。特别是宗教情感向民族情感的转化，使得宗教情感变为一种民族的共同心理和传统习惯，如伊斯兰教的宗教情感和民族情感的合而为一，成为伊斯兰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4. 第一次推动:科学家的发现

牛顿是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仅在数学、光学、天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即人们所说的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建立了经典力学的基本体系。一个苹果掉到地上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而行星的运动则导致了牛顿更令人惊讶的发现，即“第一次推动”。牛顿认为，行星之间虽然也有引力作用，但是，行星按

照轨道切线方向的运动，是在很久以前受到某种外来的“第一次推动”而开始的，自那时起行星才围绕中央星球旋转，并会一直按同一方向旋转下去。如果说“第一次推动”是由神学家发现的并不足为怪，但它确是山有“伟大的科学家”之称的牛顿发现的，就不能不引人思量。承认超自然的所谓“第一次推动”，也就变相地承认了上帝即造物主的存在，得出了僧侣主义的结论，这就与宗教挂上了钩。

其实不仅牛顿，历史上宗教徒与科学家之间、宗教与科学之间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宗教信徒中有科学家，甚至宗教中包含有科学成分。但是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上也曾尖锐地对立过，科学在同宗教的斗争中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科学与宗教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看来必须搞明白。

(1) 认识的世界

实际上，科学与宗教从一开始就是纠缠在一起的。“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①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也是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宗教之所以发生，并非完全出于情感的需要，也是人类认知活动的需要。宗教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出宗教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自然界的恐惧，达到对自然的认识和控制。可以说，人类最初的认识形式就是宗教。宗教在历史上具有认识的功能。宗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一定的认识功能，原因即在于它包含了许多方面的认识因素。

宗教中包含了对自然的认识。许多宗教观念的产生，实



牛顿万有引力

际上并非为了信仰，而是为了解释自然现象。在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是最基本的概念。“灵”这一概念是为了解释山、水、日、月、生、死、梦等这些事物和现象而产生的，并非一开始就是为了想像出这样一个东西为人们所崇拜和信仰。自然崇拜是对自然力的认识，如对火的崇拜。在原始人的生活中，火是不可缺少的自然力，又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对火的崇拜中，包含着对火的认识特别是对火的作用的认识。宗教的这种认识功能在巫术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巫术通常被认为纯粹是骗人之术，没有实际知识可言，实际上，原始巫术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如古代的巫术祛病，就有对疾病的认识，而且从人类科学认识史上看，巫术在某些方面甚至干脆就是科学的来源。如作为巫术的一个重要表现的占星术，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因为观测天象是占星术的一个基本要求，对天象的观测，使古人获得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开始的时候，天文学便离不开宗教。

宗教中包含着人对自身的认识。原始人通过对梦、死亡等现象的考察得出结论，人是具有灵魂的，灵魂与肉体是可以分离的，灵魂离开肉体不灭。“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后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

灵魂不死的观念”，^①从而就建立了灵魂崇拜的宗教，成为原始宗教的普遍形态之一。

我们今天可以把灵魂不灭观念驳得一无是处，然而它却是早期人类一种关于梦、生死等问题的解释。从人类认识史上看，它是人类认识活动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必然阶段。

宗教还包含着对人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人们为什么会崇拜太阳和月亮呢？这是因为太阳与月亮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他们的生活需要它。人们为什么会崇拜山川、河流、大地呢？这是因为山川、河流、大地给了他们以食物、住所，保证了他们的生存需要。为什么某一部落的人们会崇拜某一植物和动物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中，这些植物和动物对于他们的生活太重要了，以至于决定着他们的生存。这些自然崇拜，本身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崇拜的对象是无所不能的，我们需要祈求于它，这种认识就是人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

至于神灵崇拜，则标志着人类的抽象认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神灵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已很难进行具体的描绘，即使可以描绘也是典型化、夸张化的产物，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人们把神灵作为解释自然、社会之谜的最终谜底，说明人类追求自然、社会认识的决心和水平。

上面我们曾说过，没有情感就没有宗教。同样，没有认识也没有宗教，情感与认识在宗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19~220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 科学家与宗教

在考察古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时,就会发现,许多杰出的古代科学家都是僧侣祭司。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分工史上,最早出现的脑力劳动者大都是宗教的僧侣和祭司,僧侣和祭司在最初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占据主要地位,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收集、保存、整理当时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为发展和传播这些知识做出过独特的贡献。如古代的巫师、占星术士等就属于这样的阶层,他们对搜集、整理和传播古代科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巫师大都能掌握一些医药知识,在运用巫术进行治病的过程中,经常夹杂着一些药物治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一大批古代道教思想家,他们笃信用炼丹炉可以炼出使人长生不老的丹药,炼出的丹药却是化学、植物学和医药学的重要科研成果。古代占星术士也同时成为了古代的天文学家,他们为了掌握预卜人间祸福的技能而仔细研究星相,奠定了古代天文学的基础。

在西方,基督教的许多神职人员同时也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他们在教堂、修道院中既从事宗教工作,又从事研究工作。例如,5世纪希腊的普罗克拉斯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注释书;6世纪罗马的博埃修斯撰写了《算术入门》、《几何学》;德国女科学家希德加尔是一名修道院院长;法国的一个数学家、天文学家更是当上了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

即使在近代,也有不少人怀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去从事科学研究,并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哥白尼起初为了认识

神的智慧而潜心研究宇宙星体运动规律，研究的结果是提出了“日心说”，导致了宇宙观的一场革命；弗兰西斯·培根试图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巫术可以使人返老还童，结果目的没有达到，却开了西方近代科学实验方法之先河；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相信，上帝可以造出许多小天使参加创世，而分子可能像是精灵一样的存在。他所预言的小天使至今无人能证实，而他所预言的无线电波的存在以及其速度与光速相等，却为人所证实，成为科学的重大发现。

宗教经籍文献是古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记载了古代的科学知识，它们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并为后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例如，中国古代道教经籍辑录的炼丹术中，就含有丰富的化学研究成果。我国古代大量的天象是通过宗教占卜被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不少日食、月食、彗星的记录。古代埃及的医学纸草书和古代巫术——巴比伦的医学泥版书常常是既有医学的经验与理论，又有神秘的巫术。巴比伦的天文观测也很有成就，它们的每一个庙宇几乎都设有图书馆，收藏着大量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文献。德国早期的炼金术士马格纳斯是一个教会僧侣，他除了搞炼金术，还从事占星术和幻术，他所著的《炼金术》一书，记载了大量的化学变化，如明矾、铅丹、砒石等，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宗教著作。

(3) 宗教和科学：井水不犯河水？

按照一般人们的理解，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宗教会逐渐丧失它的认识功能，随之也将走向衰亡。然而，宗教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与科学一样在发展甚至有所壮大。当今社会

也存在着两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一种是宗教徒们一方面接受科学，愉快地享受着现代科学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信仰宗教，对神灵怀有虔诚的心理；一种是科学家们一方面以执著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埋头于实验室的试验，另一方面又以诚恳的态度崇拜神灵，不断地去教堂做礼拜。以至于有人认为，现代社会是宗教和科学的时代，而不是宗教或科学的时代。

现代科学的功能，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不是为了寻求上帝、灵魂存在的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把火箭远远地送出了地球，卫星已开始能够探测火星等茫茫星球，先进的射电技术使人们的视线已达到上百亿光年的宇宙深处，人们也能够通过解剖对人脑进行细致的研究，了解人脑的构造及功能。探测宇宙，没有寻找上帝是否存在的任务；解剖人脑，也不是为了寻找灵魂是否居于其中的证据，这都不是科学的功能。科学的作用只在于去认识并根据认识成果为人类服务。

当今时代，宗教和科学之所以能够同时存在，主要在于它们适应了人们不同的需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宗教已经失去了它的认识功能，其信仰功能也正在减弱，相反，它的另一种功能——情感功能却正在不断强化，宗教越来越偏重于满足人的情感的需要。现代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快节奏、竞争性、紧张性等等，加重了人的情感的焦虑，打破了人的心理的平衡，人们渴望一种寂宁的环境、互爱的气氛、温柔的情感，甚至无拘无束的幻想。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就为人们保留了这样一块“干净的圣地”。寺院、教堂

的感人心弦的钟声对寻求宽慰的人们充满无限的魅力，人们涌向教堂，更多的不是去聆听上帝的福音，而是去享受人们互相之间的信任、关心、爱护，寻找亲密无间的气氛，寻求情感的寄托。尽管这种气氛只是短暂的，甚至是作假的，但人们并不需要认真追究其真伪程度，而只是为了在这里求得片刻的宁静，得到心理的宽慰，然后走出圣地，回到纷乱繁忙的凡尘，继续紧张、机械的生活。正是为了适应人的情感的需要，宗教也变得越来越宽容、随和。

情感与认识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两个方面，宗教是表达人的情感的重要形式，科学则是人类认识的主要方法。人们不能仅仅生活在情感的世界里，还需要认识世界，宗教需要科学；人们也不能仅仅生活在科学的世界里，还需要情感的世界，宗教属于情感的园地。从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科学与宗教曾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在这一意义上，科学也需要宗教。正如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的：“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

如上所说，宗教与科学岂不成了一对好朋友？非也。二者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古代时期，科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宗教承担了一部分认识的功能，但从根本上说却有着质的区别。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变得不可避免。

宗教关注的是超现实、超社会的神秘的彼岸世界，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来自神的力量；科学则恰恰相反，它关注的是现实的世界，自然的力量。如此一来，科学的发展必然要揭露宗教的虚伪，动摇宗教存在的基础，而违反教义的学说都

被宗教说成是异端邪说，这就必然导致宗教的反科学性，从而造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近代以来，为了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宗教当权者曾经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向新生的科学发动了残酷的围攻，成为一股强大的反科学力量。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以离经叛道、亵渎神圣的罪名横遭迫害，有的甚至为自己的科学信念献出了生命。哥白尼的日心说不得不等到临终前才敢发表，伽利略因为竭力宣扬日心说而被判管制，布鲁诺更由于声张科学真理而在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宗教在近代科学史上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从本质上讲，宗教是反科学的，科学也是反宗教的。现代社会中，宗教与科学能够和平相处，并水不犯河水，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已没有了质的区别，只是说宗教与科学适应了人们各自不同的需要。宗教徒需要现代科学所带来的成果，因而，本世纪中期以来，各个宗教都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对科学的研究的支持，天主教会甚至为受到过迫害的伽利略平反，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支持是有条件的，即科学的研究不能损害宗教的根本信仰。同样，人们进行科学活动也需要有精神的寄托和追求，宗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们这一需求。但是，人们进行科学活动时决不能以宗教的世界观为指导，否则，只能走上牛顿似的“第一次推动”的道路，从而也就背离了科学。

5. 宗教：信不信由你

当今世界，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它对社会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宗教信仰上，

有人信它，有人不信它，这都是由宗教自身的特点和人们的不同需求所决定的。正确认识宗教的社会作用，从而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始终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正确对待的重要问题。信仰自由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宗教政策，一句话，在一般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上，信不信由你。

(1) 宗教的社会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作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从积极作用方面来说，宗教具有社会凝聚作用，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向心力量。宗教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构成的要素。相同的宗教信仰，构成相同的文化背景，各种宗教在一定地区和一定的民族范围内可形成各自的宗教文化圈，维系着人们之间的关系，成牢固的民族凝聚力。如当今的某些伊斯兰国家，真主作为这个国家的共同信仰，能把全体国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成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量。

宗教作为媒介，具有密切世界各民族间友好交往和增进各国人民间感情的积极作用。宗教的传播交流了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思想文化成果，推动了社会进步。宗教的构成要素中，既有异于科学的内容，又有人类创造的思想文化的精华。宗教界也不乏饱学之士，他们对于人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代僧人玄奘取经，带来了印度文化；名僧鉴真 6 次东渡，宣扬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建筑、医药、书法和绘画等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7 ~

18 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把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引进中国，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当今世界，宗教的这种积极作用也非常明显，20 世纪 80 年代在日本的鉴真佛像重回故乡就成为当时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中也有积极的作用。宗教为人们描绘出一个符合宗教要求的世界秩序和社会秩序，并通过这个秩序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例如通过共同信仰规范人们的思想，通过宗教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宗教戒律控制社会违规行为并制裁违规行为等来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实现着它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宗教作为法律、道德的辅助手段，积极劝人向善，宣传因果联系，善恶必报，因而它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强化人们对疾病、失败、贫困等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减少以至消除人们在险途逆境中的迷误和恐惧，有助于使人心理平衡，保持情绪宁静，有利于社会安定。

宗教对社会的作用除积极的一面外，还有消极的一面。宗教最大的消极面就是对人的麻痹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宗教往往无视眼前的实际社会生活，回避现实矛盾，从而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成为反动阶级维护反动统治、调和阶级矛盾的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各种宗教都包含着忍受现实痛苦、不反抗现实的主张。佛教的目的虽然是要消灭人世间的一切苦难，把世人救出苦海，但给人们开出的方子却是灭除欲望，在静心修行中获得解脱，这是一张所谓自己救自己的空头支票。基督教宣

传忍耐服从、寄托来世的宗教主张，宣称它是爱的宗教，要求一切信徒都要爱上帝、爱他人，这一爱憎观的本质是要人们顺从、不要反抗。这样，宗教的信仰就要求人们逃避一切现实的斗争，无视一切现实的压迫和痛苦，专心于寻求虚幻的天国，既麻痹了人们的思想，成为人民的精神鸦片，又成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有效工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就曾说过：“在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我国各种宗教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①

对待宗教，我们应该全面理解和认识，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当人们称宗教为精神鸦片时，同样也可以因其能煽动起大众的狂热而将它称为兴奋剂。至于宗教究竟是作为鸦片还是兴奋剂或别的什么东西，取决于人们对宗教认识的角度、方式和其他的种种原因。在当今社会，人们之所以相信、接受宗教，或是相信它的教义，或是赞同它的伦理观点，或是欣赏它的审美情趣，或是出于某种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对于某些宗教来说，它的存在有世代相传的缘故，更有民族的或政治上的凝聚力的需要以及社会控制的需要。只有对宗教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宗教政策。

(2) 宗教政策

我国的宗教政策是以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为核心内容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宗教信仰自由的理

^①《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 198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5 年版。

解应该是：每个公民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种教派或那种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利用政权力量来推行某种宗教或者禁止某种宗教。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不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主义公共教育。宗教徒作为普通公民，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或直接对行政、司法和教育机关的工作提出意见，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

1999年1月31日，李瑞环同志在同宗教团体领导人举行迎春座谈时，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强调指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是长期的政策而不是权宜之计。

第一，这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是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任何违反其内在规律的外部干预，任何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处理，都是不能奏效的。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一种普遍、长期存在的现象，有其发生和发展的深刻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动规律，企图用行政手段去限制甚至消灭宗教是行不通的，企图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同样也是错误的。

第二，这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所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一切努力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宗教信仰的自由选择权利。在我国，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才是主要的。只有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才能调动广大信教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使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一致和力量凝聚到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共同目标上来。

第三，这是引导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所必需的。我国五大宗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都有热爱祖国、服务社会、弃恶扬善、造福人群的内容，这些内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只有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对宗教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加以挖掘、整理，使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这也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我国是一个讲求“和合”文化的国家，主张以和为贵，对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这当然也包括对待宗教。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部分与宗教文化有联系，各种外来宗教也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不同程度地“中国化”。我们所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既符合信教群众的要求，也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不信教群众所接受。

在历史上，任何宗教想要存在和发展，都要解决一个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宗教界理所当然地应当通过自己的方式投身于这一事业，并做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努力做到“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践证明，坚持“四个维护”，有利于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利于保障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地位，有利于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 邪教披着羊皮的狼

这是一则人人都熟知的寓言故事，说的是只非常狡猾的狼，为了能常常吃到羊，不致挨饿，便谋得一张羊皮，披在自己身上，混在羊群之中，每天随着羊群活动。羊的主人眼见天天在少羊，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细细观察羊群，终于发现了羊群中那只披着羊皮的狼。狼消灭了，祸害便消除了。邪教，正是这样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它打着宗教的旗号，干着祸害宗教和社会的勾当。掀去羊皮，自然便露出狼的本性。对于凶残的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坚决消灭之。

1. 人类肌体上的毒瘤——世界邪教概况

1999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北京，发生了数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事件，这一事件披露了“法轮功”的邪教面目，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警觉，“邪教”被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了出来。

何谓邪教？“邪”在汉语中的首要含义是“不正”，即不正常、不正当、不走正道。在这样的意义上，邪教可以称之为



邪教·披着羊皮的狼

“不正常、不正当、不走正道的教”。在西方，一般把膜拜团体（也称新兴宗教）中那些邪恶、怪诞的组织称为邪教。在中国，邪教的“教”不是指宗教的“教”，而是特指一类邪恶的说教，邪恶的势力。因此，邪教并不是宗教，它早已超出了宗教所指。所谓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邪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当今世界，邪教及各种旁门左道组织在不断增加。它们都装神弄鬼，诈骗钱财，盘剥群众，破坏家庭，损害健康，摧残生命。邪教常以犯罪群体的形式出现，建立严密的非法组织，进行诡秘活动，宣扬奇论怪说，用尽办法吸收信徒并进行洗脑，威胁社会安定。它们除了敛财，还想得到权利，操控某一社区或一群人，甚至想控制政府。邪教组织像一个个毒瘤附着在人类社会的肌体上，不断侵蚀着人类社会。对于这样的毒瘤，必须拿起手术刀予以坚决切除。

（1）国外邪教概况

有研究人员估计，全球邪教组织不少于 3000 个，信徒数千万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世界日趋进步的今天，信奉正式宗教的人相对减少，加入邪教组织的人反而增加。在西方国家，邪教一开始常常是以新兴宗教的形式存在。比如，1965 年琼斯在美国正式创立了“人民圣殿”教，到 1975 年，“人民圣殿”教已经从一个小小的乡村教堂发展成一个有权有势的全州性组织，琼斯也成为加州名人。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在 1989 年被东京都批准为“宗教法人”，麻原

甚至于 1990 年创立“真理党”参加当年的日本众议院大选。由福永法源在 1980 年前后创设的“法之华三法行”，1987 年在静冈县获准为宗教法人。但是这些“新兴宗教”并不进行一些正常的宗教活动，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搞一些旁门左道，搞一些怪诞、邪恶、极端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范围。国际上一些恐怖组织在本质上也有邪教成分。

在国外，邪教很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着。单从 20 世纪来看，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一个叫作“耶和华见证者”的邪教组织。从邪教组织活动地域来看，邪教组织无处不在，这其中尤以美国为甚，堪称邪教王国。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和 40 年代二次大战期间，邪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高峰时期邪教组织逾 2000 个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以后，美国的邪教组织更是不断膨胀。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辛格在写给白宫的一份报告中估计，美国的邪教组织多达 2000~5000 个，有 1000~2000 万人不同程度地加入了邪教活动。美《新闻周刊》的报道也认为，在美国有 700~5000 个邪教组织，比较有名的有：吉姆·琼斯为“教主”的“人民圣殿”教，大卫·考雷什为教主的“大卫教派”，以及“上帝的儿女”、“天堂之门”、“耶和华教堂”、“忧虑的基督徒”等。美国邪教组织的特点是组织多，信徒少，十多人亦能自成一教。世界最惊人的邪教事件，多发生在美国，包括像 1978 年“人民圣殿”教千人服毒集体自杀惨案等。

日本也是一个邪教多发的国家，有各种邪教打着宗教

的幌子进行活动,如“奥姆真理教”“法之华三法行”等。它们虽然被承认为一种正式宗教,但本质上却是完完全全的邪教组织,干着欺人欺世、骗财夺权的坏事,包括像 1995 年 3 月 20 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的沙林毒气惨案等。麻原彰晃和他 10 多名手下后来被控杀人罪,目前在监狱服刑。“奥姆真理教”现由麻原彰晃的女儿掌舵,声言要发扬光大。麻原彰晃曾与若干倡导军国主义复活的政客有密切交往。邪教不死,说明背后有某种势力支持。邪教在日本的猖獗,是有一定原因的。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主要武器是利用神道教控制军民,团结一致扩张势力。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又有复活的迹象,神道教首先回魂。这种起源于日本古代的传统宗教,本来是祖先崇拜,后来却被有政治背景的高僧将之逐步政治化。按照神道教说法,天皇由天照大神的神系而来,因此日本民族就是神的后代,天皇是神人。神道教主张政教合一,全盛时期有各种组织 10 万个,如政党一般严密,信徒 7000 多万人,社寺遍布各地,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等是其主要神社。现在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是拜祭战争亡魂,也是支持军国主义复活的手段,邪教的滋生不能说与此一点关系也没有。近年有若干日本神秘僧人,自称为神的使者,活跃于日本、美国、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宣扬神教道理,有超过 600 万人人教。这其中不能排除邪教性质的组织的存在。

在欧洲,也有许多邪教性质的组织存在。法国人迪蒙布洛和比利时人儒埃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创立了“太阳神殿”教,它们在瑞士佛里堡州和瓦莱州的深山里,建立起几

座神坛,神坛设在大厅里,铺着红色地毯,以象征太阳;黑色讲坛后挂着一只双头鹰皇冠的“教徽”,象征着教权,黑色讲坛表示对“世界末日”的向往。1994年秋季,有数十人死在这些神殿里。1995年圣诞节期间,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又有16名教徒神秘死亡。1991年4月,德国政府发现了一个自称为“科学教派”的邪教组织,该教派原诞生于美国,号称拥有500万信徒,在世界65个国家建立了700多个活动中心。20世纪90年代初,塞尔基·托罗普在俄罗斯创立了“最后的圣约书神庙”的邪教组织。耶路撒冷被视为“上帝之城”,1999年1月3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来自美国的14名准备在所谓“世界末日”来临前到耶路撒冷作乱的邪教徒。

在非洲,1999年8月6日,肯尼亚总统莫伊就邪教组织“共济会”一事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政府将尽快查清邪教内幕真相。乌干达邪教组织“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教主导演了2000年3月17日教堂火灾案,由此慢慢揭开了这一邪教组织的内幕,到目前为止已发现被害邪教尸体近千具……各种邪教组织真是数不胜数,罪行令人发指。

综观世界范围的邪教,其产生主要有三种社会环境。一是长期的社会贫困。非洲是邪教的温床,一年总有数百人因“教主”身份败露而死于非命,这与非洲生活贫困有关。非洲南部曾盛行一种恐怖邪教,把部族祖先与“神”混合而成神授教,经常举行古怪崇拜,用男人尸体和女人的血做饼分赠信徒,称为血餐,闻之令人毛骨悚然;二是时逢灾变。如1918年流行性感冒肆虐欧美,群众束手无策,近2000万人

死亡，人们被迫乞灵于宗教驱魔，数以百计的邪教由此而生。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非洲几乎每年都有多个国家闹饥荒。1982年至1984年发生的特大灾荒，由东非到非洲南部，遍及35国，半数非洲人受灾，数百万人因饥饿或营养不良而死。有些地方半年未见一滴雨，邪教因天灾厄运而生，增添了更多人类悲剧，数以百计的小孩惨变成邪教求雨的祭品；三是经济虽然发达但人们思想空虚。欧美日等国的邪教基本属于这一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加入邪教的许多人或是精神无所依靠，或是受到离婚、失恋、失去亲人等打击，而有些则是思想不稳定的青少年。邪教正是利用这些因素，编造千奇百怪的“说法”，对他们进行精神毒害，使邪教组织得以不断扩展。

此外，由于科学尚未能解答所有的宇宙问题，也未能解决人类所有的困难，也造成了邪教乘虚而入。各种教派都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不仅在精神上能满足某些人的需要，“教主”还通常自称有超凡力量，导人迷信，从精神上控制信徒，所以有的人一旦加入邪教便很难自拔。邪教还经常打着所谓“科学”的旗号，钻科学的空子，狂言能够解决一切科学问题，足以应付各类悲剧、疾病、饥荒和其它天灾。科学尚未到达的未知世界，往往是邪教泛滥之处。

(2) 中国邪教概况

在中国，邪教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解放以前，邪教在我国泛滥成灾。解放以后，邪教本来基本上被我国政府铲除干净，可是近些年来，邪教又有抬头迹象，特别是最近出现的“法轮功”，使邪教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

邪教在我国古已有之，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即一种具有秘密宗旨和仪式的、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秘密团体。这种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一般有下面几个特征：第一，它是在秘密状态下组成的，其活动也是在暗中进行的。第二，它具有秘密的宗旨、奇异的入会仪式，和秘密联络的隐语暗号。第三，进行非法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国民间的秘密结社起于何时，今天已很难判定，东汉时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与秘密结社极为相似，而其前的赤眉、铜马等农民起义成立的组织与秘密结社更是大同小异。据史载，早在公元 7 世纪左右，即有秘密结社的名目出现，如隋末谯郡的“黑社”、“白社”组织。及至赵宋，民间秘密结社日趋增多：耀州豪姓李甲聚党号称“没命社”；章丘民众聚集号曰“霸五社”；扬州则有“亡命社”。宋之后，民间秘密结社时有显现，到了清代，则盛极一时。这些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后来逐步演变成民间的秘密教门——“会道门”组织。清代时期，各种秘密教门组织层出不穷，特别是那些同朝廷对抗的教门组织，被历代清廷定为邪教组织。清代雍正就曾说过：“所谓邪教者，非指世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雍正朱批谕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特别是各种水患不断，每一次灾难之后都会涌现出一大批秘密教门组织，成为邪教滋生的温床。

中国秘密教门的盛行，是从白莲教开始的。白莲教初称

白莲菜，又称白莲社，本为南宋僧人茅子元开创的带有异端性质的佛教派别，14世纪进入民间，变成一种教义怪诞的秘密宗教，称白莲教。元朝末年，白莲教主韩山童和刘福通利用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发动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开始时利用红巾军反元，但后来大概认为白莲教教义荒诞不经，要夺取政权特别是建设新的政权靠这些东西有害无益，所以开始反对白莲教。明朝建立后，一直把白莲教当成邪教进行镇压，于是白莲教就变换名目以求发展，出现了红阳教、闻香教、涅槃教、黄天教等数十种名称。这些组织积蓄力量到一定程度，遇到合适的气候，就会谋反。明朝末年的徐鸿儒起义，就是明代白莲教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到了清代，这些教门的传播更加广泛，除原有的名目外，又增加了众多的新名目。有一个教主，就有一个教名。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载，清代民间秘密教门主要名目有：无为教、武圣教、阴盘教、阳盘教、白莲教、达摩教、在理教、先天教、大乘教、清茶门教、红羊教、一炷香教、圣贤教、义和门教、八卦教、天龙八卦教、牛八教、添柱教、红胡教、天理教、天公教、佛门教、明灵教、无极门教、青莲教、黄阳教、西洋教、收圆教、顺天教、鸿钧教、罗祖教、龙门教、白山教、天门教、儒门教、圆顿教、黄天教、一碗水教、幅教、白莲地教、红灯教、红莲教、红教、白阳九宫教、摸摸教、未来真教、斋教、青教、青阳教、新新教、混元教、白衣教、邱萃教、罗教、弘阳教、如意道教、八路教、虎尾教、老佛教、看香学好教、末后一著教、灯花教、清水教、老理教、潘安教、老安教、新安教、金兰教、黄天道教、长生教、红单教、矢么教、皈依无为教、金丹

教、文贤教、黑莲教等。

清代民间秘密教门的谋反活动更加频繁，规模较大的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山东爆发的清水教王伦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历时9年半时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爆发的林清、李文成起义。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期间，这些民间教门也在全国各地举行起义。清朝被推翻后，皇帝没有了，有的教门又企图复辟帝制；有的则发展武装，占山为匪。

在新中国成立后，流传最广、势力最大、活动最突出、危害最严重的教门当数“一贯道”。“一贯道”初创于清光绪年间，其名取自《论语·里仁篇》中的一句话，“吾道一以贯之”。它来源于东震堂，后来又有中华道德慈善会、孔孟道、孔圣道等众多名称。1932年以前，“一贯道”主要是一个民间的秘密教门。1932年，道士出身的张光璧接管道务，他自称“天然子”，改名张天然，号称是“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使“一贯道”不仅在组织上、教义上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在性质上也起了根本变化。到1936年的4年间，山东济南、青岛、兗州、曹县、单县、滕县以及京津一带都有了“一贯道”组织。1936年冬，国民党将张骗至南京软禁，经谈判，张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后于1937年被释放。自此，“一贯道”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封建迷信团体，而一变成为国民党操纵利用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一贯道”在各个城市公开设坛布道，势力渐向四方扩展。三四十年代，张光璧与日寇、汉奸沆瀣一气，充任汪伪外交部顾问，在日寇、汉奸的庇护下，“一贯道”势力迅速遍及全国各地。

1938 年扩张到东北，1944 年蔓延至华南，1945 年又向四川发展，道徒日众，势力旺盛，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日寇投降后，“一贯道”又重新投靠国民党。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全国有秘密教门“会道门”300 多种，道首 80 多万，道徒约 1300 余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贯道”及其它遗留下来的教门“会道门”，又利用封建迷信反对新政权。1950～1953 年，各级人民政府下大力气对秘密教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一一取缔了这些邪教组织，使这一绵延数百年的庞大的邪教组织基本绝迹。其后几十年，邪教在我国基本上销声匿迹。然而近几年来，邪教又陈渣泛起，暗流涌动，各种邪教组织不时出现，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近些年来查获了“被立王”、“主神教”、“门徒会”等邪教组织。它们蛊惑人心，毒害百姓，极其顽固。特别是“法轮功”的真相被揭露后，人们彻底地认清了邪教的真面目。

林林总总的邪教组织在世界各地不断兴风作浪，给各国政府制造了很大麻烦。随着邪教组织活动的内幕不断被曝光，其罪恶行径昭然于世，令人触目惊心。邪教组织很不简单，绝对不能小视。了解邪教的实质，认清邪教的极端危害性，同邪教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是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2. 荒诞不经的歪理邪说

“众神天空站，站在空中把账算，哪个该，哪个欠，哪个还。你们把钱收到不行动，到那时后悔迟，阎王叫你三更死，

想活四更也难言。就有金银也拿不去，满堂儿女要丢完。你们要好好尊师，效法前人。快点行动，以后加倍还。”这是具有邪教性质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的“碑文”中所言。多么荒诞、邪恶之语！通观中外古今邪教，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个“邪”字——讲的是歪理邪说，干的是歪门邪道，聚集为邪恶势力。

邪教作为一种“教”，自然有它的“教理”“教义”。为了达到控制教徒的目的，邪教必然要编造各种邪说，这些邪说不仅荒诞不经，而且可谓登峰造极。

(1) 教主——神的化身

邪教的一大特征就是教主崇拜。教徒惟教主是从，为教主而生而死，因为教主是神或神的化身。邪教教主都大言不惭地自封为具有超能的“神”，将自己吹嘘成法力无边的“上帝”。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宣称自己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超人”，自称“上帝”，是全体教徒的“父”和“主”；“大卫教派”的弗农·豪威尔将自己改名为“大卫·考雷什”，声称自己不仅是复活的耶稣，而且地位比耶稣还高，是解放人类的象征；“上帝的儿女”伯格称自己是“上帝挑选的王”；“太阳圣殿教”的儒雷称自己是人类“新的救世主”；美国还有一个“天堂之门”，其头目阿普尔怀特原本在一个大学里教音乐，后因搞同性恋被校方开除。从 1975 年起，他突然自称是“转世耶稣”，外星人派他来拯救地球，开始了邪教宣传；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本以针灸和按摩为业，1978 年来到东京近郊的千叶县船桥市，在经营药铺的同时从事“传教”活动。1982 年，27 岁的麻原曾

因私自制售假药被捕。1984 年在东京创立“奥姆神仙会”。1987 年自称在国外修炼得道而最终解脱，遂将“奥姆神仙会”改称为“奥姆真理教”，称自己具有“空中浮游、冥想透视、精神感应、掌握预言”的超人能力，是“本世纪最大的济众者”，是全人类的“救世主”；90 年代初塞尔基托罗普创立的“最后的圣约书神庙”，是俄罗斯最大的邪教组织。他自我神化，告诉追随者，他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长相很像耶稣。

中国的邪教组织也奉行教主崇拜。教主当然不是凡人，而是神或神的化身，具有超凡的能力。清朝被定为邪教的清水教首领王伦就宣称“千手挡，万手遮，盖世英雄就是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齐集在我身。求大天就助，拜天地就灵”。中国过去的“会道门”组织的大大小小的会道门头子，或者吹嘘自己是什么先知转世，把自己塑造成“神仙”，或者自封为“皇帝”。邪教“会道门”最著名的支派“一贯道”，其道首张光璧就自称“天然子”。1950 年 9 月，济南一个叫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其会首之一的石云星曾自称“活佛”，其子石东林自称“皇帝”，企图阴谋叛乱，1950 年 12 月 9 日被济南市人民政府予以取缔。其他“会道门”头头也大多称帝。解放前后，在河北邯郸破获的“会道门”案件中，共挖出 104 个“皇帝”；在江苏挖出 38 个“皇帝”，6 个“大元帅”。“被立王”教主吴杨明声称自己是上帝立的王，是信徒的“父王”；脱胎于“被立王”的“主神教”，其头目刘家国原被“被立王”从安徽差遣到湖南湘乡、湘潭等地活动，1993 年初拉上一伙亲信成立“主神教”，并自称

“主神”，另一头目朱爱清则被封为“在上主”。邪教“法轮功”“老师”李洪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把自己的生日由 1952 年 7 月 7 日改为 1951 年 5 月 13 日（阴历四月初八），与佛祖同日诞生，宣称自己 3 岁时修炼圆满，得上乘大法”，“12 岁时，道家师傅八极真人传授道家功夫”，“1972 年又由道号真道子的师父传授道学”，“1974 年又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直到出山”。李洪志不仅宣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而且吹嘘自己的功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经达到了可“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的极高层次，远远超出了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高的佛，是惟一的“救世主”，具有“四大超能力”，可以“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中”。在台湾，刑满释放分子宋七力于 1990 年创设了“中国天人合一境界研究学会”，后又更名为“中国宋七力显相协会”。这个组织把宋吹捧为“本尊”、“宇宙光明体”，能够发放神功，其元体可以“分身”、“发光”。他们利用摄影特技制作成照片高价兜售，称买照片的人可“立地成佛”。

邪教的教主都以吹牛、撒谎的欺骗术自称为“神”，将邪教头目这个具体、有限的人，吹捧成绝对、无限的“神”，只有超人的特异能力，比如预卜先知、消灾除病、呼风唤雨、降妖伏魔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拯救人类，把人类带离现实社会，带到另外一个更高的、美妙的社会中去，也就是带到某个神的国度中去。邪教教主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大搞“造神运动”，其目的是要信徒对之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为了达到使教徒对自己绝对忠诚的邪恶目的，邪教教主除了标榜自己

是神或神的化身外,还无一不以各种谎言、骗术、心理暗示、诱导等手法对教徒实行“洗脑术”,玩弄一套“诚则灵,不诚则不灵”的把戏,使教徒染上一种丧失理智的疯狂与邪劲,对教徒进行牢牢的精神控制。

(2)世界末日论与末劫论

由于科学尚未能解答所有宇宙问题,也未能解决人类所有困难,邪教便乘虚而入。各种教派都具有惊人诡辩力,能在精神上满足某些人的需要。“教主”通常自称有超凡力量,足以应付各类悲剧、疾病、饥荒和其他天灾,不仅导人迷信,还意图在精神上控制信徒。天体物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大爆炸理论,认为星球的形成是由弥漫的星云爆炸而产生的。各种邪教也有一个类似的大爆炸理论,但同天体物理学理论相反,邪教所说的大爆炸不是对宇宙地球生成的前推假说,而是对宇宙地球未来的预言。邪教每隔若干时候就有人预言末日来临,今天某教派的预言虽不灵验,却可能在日后被人反复引用,借以骗人和发财。各种邪教都扬言,宇宙世界行将发生大灾大难,或将发生大爆炸,世界到了末日。

其实,早在公元 365 年,一个名叫希拉里的男人就开创了预言世界末日具体日期的先河;968 年,德国皇帝奥托三世的军队认为一次日食是世界末日的前奏;1000 年 1 月 1 日,有人认为世界将于该日终结。预言发出后,一些基督徒把自己的财产赠送给了教会,但预言没有出现,教会也没有将这些馈赠归还给教徒;1534 年,德国曼斯特坚信基督就要复临的再洗礼派教徒在该市构筑街垒反叛,他们起初信

奉清教主义，后来又转而大搞性放纵，最后因饥饿而投降，其领导人也被处死；1736 年，英国伦敦一个叫文斯顿的占卜家预言，世界末日将从伦敦居民楼的坍塌开始，吓得当地的居民纷纷跑到汉普斯特德山上避难。

进入 20 世纪，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世界末日”之说不仅没有绝迹，各种新的邪教组织更是极力鼓吹和利用“世界末日论”，为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一个叫作“耶和华见证者”的邪教组织，宣称世界将在 1914 年毁灭；1919 年，美国气象学家波塔预言，6 个行星的连接所产生的磁流将引起太阳于 12 月 17 日爆炸并吞没地球；1967 年，保守派基督徒相信，以色列军队在 6 日战争期间攻克整个耶路撒冷将触发“被提”——正义者被提升进天堂，而世界将在大火中毁灭；1992 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考雷什及其大卫教派信徒鼓吹并相信，世界将于 1995 年完蛋，他和 75 名信徒在被围困 51 天后，于 1993 年 4 月 10 日在一场烈火中丧生；1993 年，乌克兰基辅的白人兄弟邪教组织预言人类大劫难即将来临，并组织信徒举行盛大的仪式迎接这一刻，结果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9 天以后，他们再次做出同样的预言，举行了同样隆重的仪式，引起不少人围观，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最后以一场闹剧收场；1997 年，以美国加州圣迭戈为基地的邪教“天堂之门教派”认为，“海尔——波谱彗星”从地球轨道的边缘划过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于是他们集体自杀，以期投生到另外一个星系里去；美国另一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教主琼斯也曾极力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日本的“奥姆

真拜教”也极力鼓吹末日论,预言“世界最终战争”即将来临,麻原彰晃要求信徒加强“超常能力”修炼以协助他实现“世界最终战争”后的“救济计划”。他还在 1995 年 3 月出版了一部名为《日出之国,灾难近了》的书,书中预言:“1998 年 8 月 1 日前后,是决定你生死的关键时刻,那是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日子”。1999 年更是预言家们及各种邪教组织造谣惑众的一年,“世界末日论”甚嚣尘上,尤其是:7 月份,16 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恐怖之王”在 1999 年第 7 个月从天而降;8 月 11 日,法国预言家拉巴内说,那次日全食到来时,俄罗斯的“和平”号轨道站将在巴黎坠毁,从而造成灾难性后果;9 月 9 日,这一日期近似于在一些电脑程序中被用作终止信号的“9999”,致使一些人预言,将发生世界范围的断电,从而有可能引发世界的终结;9 月 11 日,洛杉矶有影响的犹太教拉比伯格相信,在这一天,一个巨大的火球将击中地球。还有一些人预言,随着 2000 年的日益临近,由于计算机“千年虫”发作,地球上的核武器将会失去控制,一场“核战”在所难免,人类生存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1999 年 1 月 3 日,在“上帝之城”耶路撒冷,以色列警方逮捕了来自美国的 14 名准备在所谓“世界末日”来临前到耶路撒冷作乱的邪教徒,后来查明,这些邪教徒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个名为蒙迪·金·米勒的人的信徒。米勒创建了叫做“忧虑的基督徒”邪教组织,宣扬“世界末日”。米勒预告他将在 1999 年 12 月死在耶路撒冷,并于其后 3 天像耶稣一样复活,信徒们相信能死在耶路撒冷就会升入天堂。

从古到今，有关“人类末日论”的预言五花八门，不计其数，然而这些预言毕竟是谣言。特别是随着 2000 年的平安来临，所有谣言都已经不攻自破了。

在中国，各种邪教组织同样也极力鼓吹“世界末日论”，只不过在中国，世界末日论更多的足以“末劫论”的形式出现。“末劫论”最早是中国历史上被民间教门组织用来谋反的理论。在民间教门那里，“末劫论”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或体系。“劫”本来是佛教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世界从形成到灭亡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每一个循环是一大劫，其中有 4 个中劫，每个中劫又分成 20 个小劫。由于劫同时又有灾难的意思，所以佛教把世界和人的经历看成大大小小劫难的组合。民间教门把这种“劫”的观念与明教、弥勒教的部分教义结合起来，创造了“末劫论”。这种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过去、现在、未来。有的教门把这三个阶段称为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有的把这三个阶段称为龙华初会、龙华二会、龙华三会。在青阳期或者说龙华初会的时期，是燃灯佛主持世界；在红阳期或龙华二会时期，是释迦佛主持世界；在白阳期或龙华三会的时期，是弥勒佛主持世界。前两个时期是不断发生灾难的时期，现在是处于释迦佛所主持的红阳世界的末期，世界将有大灾大难。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灾难，所以称为“末劫”。过此以后，将进入美好的白阳世界，龙华三会，大聚神佛。“末劫”时期，弥勒佛已经转世，他将收杀妖孽，度化众生。这种“末劫论”的一大特点，就是推崇弥勒佛，贬低释迦佛。他们说：“燃灯佛子，兽面人

心;释迦佛子,人面兽心;弥勒佛子,佛面佛心”。燃灯佛代表“过去”,那时人类处于远古时期,荒蛮时代,过着原始的生活,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但心地诚实善良,所以是兽面人心。“现在”虽然已经进入文明时期,但人变得虚伪奸诈了,道德水平下降了,所以是人面兽心。只有经历“末劫”,才有弥勒佛转世,才能进入“未来”世界。因而各种教门都宣扬“末劫论”,都宣称自己的教门有弥勒佛转世,这就出现了今天一个弥勒佛转世,明天一个弥勒佛转世的情况。

中国历史上所有教门的谋反活动,无一不是利用“末劫论”,宣扬“末劫论”。比如说,清朝乾隆四十年(1775年)豫皖鄂3省混元教准备发动起义时,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劫年”;“末劫年,刀兵现”。天理教组织谋反时也有许多劫变的说法,不妨详细列举一下:

①起义前声称:“今岁九月后交白阳劫。劫数到时,教主给白布小旗树于门,可免杀戮。”

②又称:“本年八、九月间,白阳大劫,刮黑风七昼夜,为人教之人,临时各给奉天开道小白旗,即可免祸,其余遭劫,一概死亡。”

③官员捉拿教徒后,“诘以白阳劫在何处?俱称在于近京二十余里云城地方,遭劫之人系刘姓。”

④天理教宣传白阳劫,并说“山西是羊头,河南是羊肚,山东是羊尾,所以先收山西,次收河南,后收山东。”

⑤天理教教徒孙九对曹纶说:“河南七卦人都归了林清,日下劫数已到,林清该当起事。”

⑥《靖逆记》说林清等人“贼造妖书,言弥勒佛,有青阳、

红阳、白阳三劫，此时白阳应劫”。

⑦那彦成说：“林清滋事时，即持此书惑众（指《三教应劫通观通书》），扬言为应劫起事。”

⑧李文成对教徒们说：“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

⑨林清回答皇帝顺琰的审问说：“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⑩

一貫道等“会道门”所宣扬的“三期末劫”邪说，宣称自天地产生后，要经过三个劫期，每一个劫期之末人类都将遭遇巨大的灾难。说什么从 1943 年起，全国要天天降大雪，那时便是“三期末劫”，只有加入“一貫道”等“会道门”组织才能免于灾难，即“一貫道”的“人道免劫”说教。

鼓吹“末劫论”观点，是中国邪教的一大特点。各种民间教门宣扬末劫论，意在吸引对未来充满朦胧幻想以及害怕劫难的群众入教，并为谋反造势。因而，这些民间教门都被历代朝廷定为邪教进行镇压。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继承了中外邪教的邪说，在理论上也极力宣扬“地球爆炸论”“世界末日论”。李洪志编造说：“人类社会在史前时期每次不同周期毁灭时，都是在人类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况下发生的……”，“人类有 81 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说什么地球就要爆炸了，人类现在到了“末劫时期”，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上，而末劫到来之时，就会“形体和灵魂全灭”。惟有他才能推迟地球爆炸的时间，惟有他才能度人上天，惟有“法轮大法”才是拯救全人

^⑩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 181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三巴掌治好罗锅

类的“超常大法”。中外末日论或末劫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3)“三巴掌治好罗锅”

从电视上听过李洪志“演讲”的人，都会对李洪志“三巴掌治好巴锅”的一段“精彩演讲”记忆犹新。说一个驼得很厉害的罗锅求治于李洪志，李洪志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在罗锅背后“啪、啪、啪”三巴掌，罗锅马上直起来了，多少年没有治好的病李洪志给治好了。只是李洪志没有说出罗锅叫什么名字，家住在什么地方，否则我们都应该去看一看这一奇迹，再给李洪志送一个“神医”的匾牌。

何止李洪志一个“神医”，世界上的邪教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无不在老百姓日常最为关注的健康、祛病问题上打主意，做文章。有的以“包治百病”起家，有的靠巫术咒语驱病，有的搞“医病赶鬼”，有的以“习法祛病”、“练功健身”为名，可谓巧舌如簧，机关算尽。邪教都高举“治病驱病”的幌子，宣扬有“功到病除”、“妙手回春”、“包治百病”的能耐。

日本有一个“生活空间”的邪教组织，其教主高桥自称能治百病，只用几分钟，敲一敲头就可以治病。“法之华三法行”的福永法源在没有医师执照的情况下，打着“零力学”的幌子，宣称自己是能用天行力治病的超人，能用通过看足底可判断人的运气和健康状况的所谓“足底诊断”治疗各种疾病，宣称“不参加修行，就会得癌症”，造成许多人上当受骗。1954年创立于美国、其后在欧洲日益猖獗起来的“科学教派”组织，其创始人哈勃特打着为人治病的幌子，推广他的“宗教精神疗法”，又称“意念疗法”，骗人钱财。“一贯道”

也经常利用设立坛堂、扶乩降神、求神拜仙、装神弄鬼等形式为道徒们祛邪、赶鬼、治病身。近些年来，本来早已被取缔的“一贯道”的老道首、老道徒，又重新进行活动，宣扬入道可以“躲灾避难保平安”，还扬言入道后有病能治病，无病能防病。河南叶县“一贯道”道首张玉卿给人看病时，用泥土、野草、鸡毛、羊屎、大粪等配成药，让病人服用，严重地摧残了患者的身心健康。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不仅有“三巴掌治好罗锅”的能耐，而且宣称有病不用就医吃药，得“法轮大法”即可，功到病自然除，只有法轮功才具有祛病强身的“神奇妙用”、“信则灵，练就行”。1989年，山西省一个叫季三保的农民搞起来的邪教组织“门徒会”，宣扬信神就能治病。一个信徒对在家瘫痪多年的村民说“你要想站起来，就劝亲戚朋友都信‘门徒会’”，最后弄得该病人的病情越来越厉害。

邪教的歪理邪说，由于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因而其教理教义能够欺骗蒙蔽一些人，而有的邪说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却仍能够欺骗蒙蔽一些人，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反思。

3. 诳世害人的歪门邪道

“为大义牺牲财产，为大仁牺牲名誉，为大慈牺牲家庭爱情，为大勇牺牲生命，为大智牺牲功果”，这是“一贯道”所谓的“五大牺牲”，一句话，为了“一贯道”，什么都可以牺牲。所有的邪教都是利用各种歪理邪说诱导、控制信徒，诳世害人，一路歪门邪道走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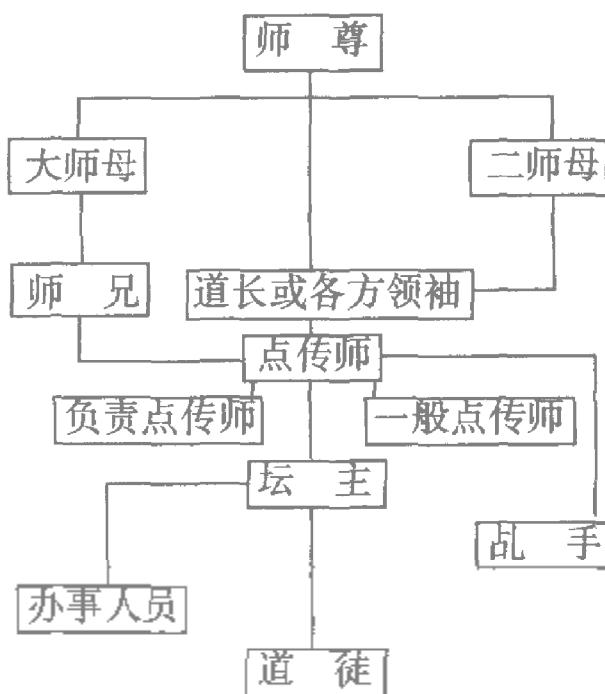
(1) 秘密结社——严密的组织体系

由于邪教宣扬的思想违背社会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宣扬一些歪理邪说，不被社会所承认，成为社会反对和打击的对象，因而邪教基本都是秘密组织，从事诡秘活动。

在旧中国，邪教主要指一些民间的秘密教门（如白莲教、清茶门等），被称为秘密会社，又叫秘密结社。秘密教门一般采取传教的方式吸收教徒，大多根据农村聚族而居的社会特点，按照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乡土关系寻求发展。一般由教主、教师直接传教给门徒弟子，即“口传密授”，并以烧香施符为招募徒众的不二法门。收徒的仪式有授戒、传诀、唱誓愿文、上表挂号等内容。授戒即是传授教内的戒律，有五戒、七戒、十戒等，内容与佛教戒律大致相同；传诀以传“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最为普遍；唱誓愿文即上香宣誓，表示入教的决心；上表挂号，即书写入教者的姓名，向所供奉的神祇——无生老母等焚化报告，以取得日后的升天的许可。教徒入教以后，要吃斋诵经，定期集会，并缴纳会费。所纳银钱教内称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等，意思是种下弥勒佛下凡时代的幸福，届时可以按纳钱的多少，十倍、数十倍获偿。

秘密教门内部，都实行教主的家长制统治，内部有非常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大主教到教主、主香司篆、教徒，逐级相承，界限分明：“教徒不得与闻司篆之事，司篆不得闻主教之事，主教不得闻大主教之事”。而且等级制度也非常严格，一般人难窥其里。各教门的首领和等级名称、等级层次不尽相同。清代山东的八卦教中，有指路真人、开路真人、挡来真

人、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传仕 8 个等级。“一贯道”在解放前后基本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其组织体系更为庞杂和严密，好似一个金字塔。大道首张光壁高居在上，往下是各地道首、点传师、道徒组成的庞大基座，构成遍及城乡各地、星罗棋布的巨大网络。其组织结构图示如下：



师尊居于首位，总揽全道事务，其言行诡称“代表天意”。师母同师尊一样享有道内最高权威，其言行则称“母训”。其下是道长、各方领袖。道长是经过师尊或师母正式任命，各方领袖虽未经正式任命但其职权相当于道长。道长及各方领袖代表师尊、师母，总揽一省一地或数省道内大权，是道内掌握实权的人，负责传达师尊、师母旨意和培养训练点传师。点传师即传递师，又分为“负责点传师”和“一般点传师”。“负责点传师”负责训练三才和坛主，且领导和指挥

“一般点传师”的活动。“一般点传师”是山坛主升任，只负责掌管分坛的道务，如管理坛主、发展道徒等。坛主是一贯道基层负责人，山忠实的道徒升任，平时负有劝道渡人、审查道徒、讲解道义、保管文件之责。道徒升任坛主，多由乩手假托神训任命。坛主又分为出力办道的“法施坛主”，出钱办道的“财施坛主”，于家中设坛、接纳道徒烧香叩头的“公共佛坛坛主”和于家中设坛但不接纳其他道徒烧香叩头的“家庭佛坛坛主”。乩手即“三才”，道内称为“传法官”。“三才”之中，“天才”为主。处于一贯道最基层的是办事人员和道徒。办事人员包括“乩手”假托神训任命的负责抄写表文的“文牍”、一般讲解员、跑道的以及打扫佛堂卫生的人员等。一般道徒一方面潜力修道，一方面出钱出力弘扬一贯大道。到后来，“一贯道”为加强组织，又在各地设立“枢纽”，下设“分坛”，坛下设“小组”，小组有代号，每 3~10 个道徒为一组，每个道徒发展的人，又可编组。“一贯通”就是这样通过严密的组织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罪恶的活动。

从“一贯道”的组织体系即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邪教组织。其它的各种邪教组织都是按照一定的组织体系建立起来的。如“主神教”建立了“主神”、“在上主”、“四活物”、“七天使”、“省权柄”、“县权柄”、“同工”、“信徒”等 8 个层次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等级制度，还在内部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培训和发展计划。他们对骨干成员进行集体培训后，派往外地传教，物色发展新的骨干。活动方式为亲传亲、友传友，秘密地逐步传开，要求每个“省权柄”发展 20 个县，每个县发展 500 名信徒。从 1993 年到 1997 年，这一邪教组织

先后秘密违法大型聚会 10 余次,其中全国性聚会 5 次,培训出重要骨干 42 名,一般骨干上百人。“门徒会”组织分为总会、大会、分会、小分会、点会、教会、聚会点等 7 级,信徒相互间不通报真名、住址,男的称“弟兄”,女的称“姊妹”。邪教“法轮功”的组织体系则是建立了以李洪志为总头目的“法轮大法研究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总站 39 个,辅导站 1900 个,练功点 28263 个,有严格的管理控制,包括由“法轮大法研究会”审批各地总站的建立、合并、撤销,总站站长、副站长的考核、任免等。其组织诡秘、联络诡秘、活动诡秘、策划诡秘,不仅外界难窥其里,一般“法轮功”练习者也不得其详。

在一些西方国家,有的邪教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新兴宗教而公开存在的,在受到社会限制或打击后,转而从事秘密活动。实际上,即使其作为新兴宗教存在的时候,其内部也进行一些诡秘的活动,其组织体系也是非常严密的。

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首领麻原曾于 1990 年创立“真理党”,参加当年的日本众议院大选。选举前,麻原自以为将以最多票当选,结果只获得 1873 票。选举的惨败改变了麻原的权利战略,从此麻原开始着手构筑“祭政一体”的“麻原王国”。“奥姆真理教”本来就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等级制度,将实现解脱的“成就者”分成“尊师”“正大师”“正悟师”、“师”等层级。后来又将“师”进一步分成“菩师”“爱师”两个集团,并分别设立“师长”“师长补”和“师”3 个职位。为进一步加强对内控制和对外的攻击性,麻原在保留原有的控制系统的同时,采用“省厅制”,设置了“法皇厅”“新信徒

厅”、“东信徒厅”、“西信徒厅”、“劳动省”、“厚生省”、“科技厅”、“文部省”、“法务省”、“自治省”、“防卫厅”、“外务省”、“建设省”、“大藏省”等 21 个省厅。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也对其内部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他对每一个信徒都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个人档案，从个人隐私到医疗记录、家族历史，还有每个信徒都要定期写的“自我忏悔”以及其他信徒的告密材料，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依靠这些，琼斯牢牢地掌握着每个信徒的一言一行和精神世界，把“人民圣殿”教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公众、组织严密的邪教组织。

邪教不仅以严密的组织体系控制教徒，更重要的是以精神控制操纵教徒。邪教实施精神控制一般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引诱。邪教打着“宗教”或“科学”的幌子，以祛病、强身、解脱、成仙等为诱饵，引诱不明真相的人们加入邪教；二是“洗脑”。邪教组织经常举办各种“学习班”传播教义，向教徒反复灌输自己以往的一切思想、信仰、理念统统是错误的，应达到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新境界”。通过听讲演、读“经书”、看录像等方式，诱骗教徒千百遍地、反反复复地接受邪教那套歪理邪说，令教徒逐渐排除其它一切信念和思想，进入一种坚信教主训示的痴迷状态，下决心跟定教主，彻底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教主所要求的那种“新人”。如果教徒发现教主原来的种种许诺并未兑现，对教主稍有怀疑，教主就会拿起“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看家本领，指责教徒心不诚，诱使教徒从自身找原因，不断地“反省”、“检讨”和“洗脑”，死心塌地地听教主指挥；三是恐吓。如果教徒对教主或教义提出异议，想退教的话，教主便会对教徒大肆

恐吓,说什么“上天惩罚”之类的威胁语言,使教徒产生顺者则昌,逆者则亡的恐惧心理,从而绝对服从教主的役使。

这种精神控制使邪教教主的追随者逐渐丧失人的理智,丧失人的尊严,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丧失做人的起码权利,丧失自我,陷入一种迷迷瞪瞪“渴望解脱”的痴迷状态,最终导致精神迷茫,任其驱使,甚至精神失常、分裂,彻底毁灭。有许多邪教组织令教徒与世隔绝,严禁与外界联系,严禁听广播、看电视、通信、打电话,使教徒的思想整日处在教主的影响之下,处于敌视社会、敌视人类、敌视政府、敌视科学的绝望之中。在这种精神控制下,信徒们自私心理极端化,对社会的认识由怀疑到恐惧、再到绝望和敌视,最终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定教主走上反社会的邪路,而不可能再有其它的选择。

(2) 骗财骗色

邪教教主无一不是贪财贪色之徒。他们打着修炼神功、除恶扬善的幌子,自称“公平、公正、正直”。这些“要做历史伟人”的邪教的头目们,实际上是一伙流氓加骗子,一直在干着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他们骗财骗色,甚至劫财劫色,干尽坏事,祸国殃民。

行骗敛财是所有现代邪教的共同特征,邪教的教主大都是非法敛取钱财的暴发户。为了敛取钱财,邪教总是巧立种种名目,疯狂搜刮道徒。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一些方式:

①入教要缴纳的各种费用。以“一贯道”为例,进入“一贯道”的道徒,都要立愿“三施”:一是财施,出钱办道;二是法施,出力办道;三是无畏施,舍身办道,服从指挥。立下“三

施”愿后，要经常缴纳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主要有：功德费，即入道时交纳的费用，是自行束修的贽礼，为入道不可缺少的手续。这些费用美其名曰“善施”，使众道徒心甘情愿缴纳，甚至不惜为此倾家荡产，实则归入道首们的私囊。超拔费，即渡亡灵费，道首欺骗道徒说死去的亲属尚在地狱，必须超拔才能升入天堂，申请超拔“亡灵”的道徒必须缴纳超拔费。渡大仙费，道首们宣称：“历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死后游魂无定所，未登天堂。如求师祖引渡成仙，则为无上功德。将来遇有劫难，所渡的大仙就会来搭救”。一般家资丰厚、迷信较深的道徒受此欺骗，往往出资渡大仙，以求庇佑。张光璧时期，每渡一个大仙要 500 块银元，后来要 10 两黄金。解放前后，渡大仙成了“一贯道”加紧敛财的重要手段。上海点传师潘华龄根据“一贯道”二师母孙素珍的指令，渡了 600 多个大仙，骗得道徒黄金 6170 余两，银元 5000 余枚。后来潘用这部分钱开了许多店铺。财施，又名行功费，是平时道徒对道内事务所交纳的钱财费用。“一贯道”财施名目繁多，主要有月助、供果费、了愿费、开荒费、献心费、免冤费、印书费、开班费、求寿费等。

②举办各种训练班骗财敛钱。还以“一贯道”为例，“一贯道”经常不定期举办各种训练班，一面向道徒灌输其思想，一面乘机诈骗钱财。这些训练班主要有：仙佛班，开始时叫“炉会”，目的是对教徒进行各种考试，如四考（考财、气、酒、色），诱骗道徒多捐钱财以献虔诚之心；研究班，是“一贯道”较高级的理论训练班，会员互相交换办班经验和对道义的理解，道首乘机向道徒结缘敛财；人事班，是“一贯道”训

练坛内办事处人员的训练班，训练时，点传师乘机劝诱参加人员出钱行功；中道班，是孙素珍解放后所办的“护道”秘密训练班，结束时要出钱行功；忏悔班，为道徒向仙佛忏悔而设，据功罪大小、欠功多少，要道徒出钱赎罪。“一贯道”道首们通过各种诈骗手段，疯狂向道徒诈骗钱财，1946年，张光璧去四川时，就用飞机运去1500条黄金。1951年冬，群众在济宁张光璧家挖了7天，挖出埋藏的银元30多箱，大批的黄金、首饰、珍珠玛瑙、古玩玉器，堆了满满3间房子。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也是主要通过传教活动骗取钱财。“在家修行者”参加修炼活动，需要缴半年会费和入会金共4.8万日元。入会后，修炼者可从3个修炼项目中选择符合自己的一项，比如说坐禅，就是修炼“解脱”和“悟”的项目，首先须进“入门预备班”。这个班分初级、中级、高级3个阶段，全部上完需要交14.5万日元，此外还需参加与此相应的函授讲座和集中住宿讲习会。“入门预备班”每参加一次可得3个单位，集中住宿讲习会，每晚6个单位，函授讲座一天1个单位，积累到60个单位时，可参加由“尊师”麻原通过摩顶注入超人能量的仪式，这时需要“布施”5万日元，接着由麻原或“大师”级弟子传授冥想法，还要“布施”5万日元。“入门预备班”毕业后，除了通常课程外，还不定期地举行临时讲座或仪式，鼓励信徒“布施”。如参加“爱仪式”，一次需“布施”30万日元，参加“血仪式”需“布施”100万日元。教团在临时安排某种仪式时，往往故意“限定名额”，以激发那些为了解脱而急于“上层次”的信徒。法国的“科学教”以“听经会”的方式非法敛财，信徒参加“听经会”每小时需支付

1200 法郎。

③“治病”骗钱。一些邪教打着行医治病的幌子，骗取病人的钱财。日本的“法之华三法行”打着“零力学”的幌子，通过所谓的“足底诊断”给人治病，自 1986 年以来的 10 余年间，约有 2.2 万余人参加了该团体组织的 4 晚 5 日的修行，使该组织从信徒手中收取了 1000 多亿日元巨款。福永法源在其写的《超越疾病痛苦的最后的天行力》一书中称“能够治好神经衰弱”，一位病人在看了他的书以后，便入教接受了“法之华三法行”的“足底诊断”，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共支付了 260 万日元现金，当他意识到自己受骗了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借款了。

④制造散布谣言，恐吓骗取钱财。邪教教主们利用教主的身份，恐吓信徒，骗取钱财。“一贯道”有一种“仙佛借窍”的骗术，即假装“仙佛”附在“天才”的身上，借“天才”的嘴说话，道徒一旦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道徒为免遭毒打，表示心诚，就纷纷捐献财物。“主神教”二号头目“盼望主”朱爱清为骗取钱财，到处散布谣言，恐吓、诱惑并用，一会儿说“银行要倒闭了，地球将要毁灭”，“钱存在家里不安全，要存到神那里”，一会儿又说“你们现在交 1 元钱，将来会得到 1000 元的回报”，“花钱打针吃药，不如请神消灾化难”、“天下将有大乱，要向‘主神’奉献财物消灾”等等。在“主”的训导下，信徒纷纷拿出钱来，没交钱的则一直跪在他面前，直到求亲托友借来为止。据查实，“主神教”仅朱爱清一人，就诈骗信徒钱财 16 余万元。日本石川县警方 1995 年 6 月指控，自称“祈”的大师伪装成僧侣，谎称“如果不供钱

除灵,不幸就会降临”,骗取了 1亿多日元;青森县警方 1996 年 3 月指控,宗教团体的主宰者和药剂师对前来买药的客人宣称,“如果不让灵魂成佛的话,一生不能治愈”,给病人做祈祷仪式,从 37 名病人那里骗取约 4700 万日元;德岛县警方 1998 年 2 月指控,祈祷师对想与自己的熟人断绝关系的人宣扬,“猫和狗的灵魂附到对方的身上了”等,从约 250 人中骗取了 1.6 亿日元。麻原向教徒们说,购买和使用其“灵性”物品,就可“上层次”。他的一根胡须、每 500 毫升麻原洗澡水、每 200 毫升“甘露水”,都明码标价 3 万日元,而一颗像章要 200 万日元,一个“头法轮”要 1000 万日元。这些粗制滥造的麻原“灵性”物品,虽然荒唐可笑,但为尽快“上层次”而耗费全部财产的大有人在。麻原仅靠卖“头法轮”就赚了 20 多亿日元。更为恐怖的是,非洲南部盛行一种邪教,常常举行杀人献祭仪式,“祭品”则是男女儿童,只有被选中的儿童的家人献出全部财产,方可免于一死。

迷恋女色是现代邪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邪教教主打着种种幌子干着骗色劫色的勾当。“一贯道”的“纯阳炉”和“顺天会”就以惨无人道和荒淫无耻而臭名昭著。“一贯道”标榜自己戒酒色财气,于是对受训人员考酒、色、财、气。考酒就是让受训者喝酒,不喝是违抗神的旨意,喝了是破禁酒戒,就要挨打;考财就是要多捐钱财以献虔诚之心;考气是要忍气吞声,耐得住折磨。令人作呕的香灰拌饭,唾液拌饭,冷水浇身,谁眉头皱一下就要挨鞭打。考色则是这些关卡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让男女裸体对坐,谁稍有心动,就拉出去杖刑鞭打。在北京“顺天会”上,一次考色 8 名男子没能过

关，竟被活活用扁担打死。有两名女道徒对这些丑态实在看不下去，坚决要求退会，道主怕黑幕被揭穿，就把两位女道徒拉入地窖审问，宣称佛要对她们进行惩罚，后把她们打死。“考色”名为道首们考验道徒是不是被色情所诱惑，实则是他们借机调戏、猥亵妇女。

邪教的头子对教徒从精神和行动上严加管制，自己却过着随心所欲、荒淫无度的生活。道首们常利用女道徒生病之机，宣扬什么“要祛病免灾，就要‘结丹’，得了‘仙种’，才能成仙成佛”，做下了无数次的禽兽恶行。江苏“太上门”头子董德中，将一门徒的妻子长期霸占，该门徒的儿子要与董拼命，董装神弄鬼地恐吓门徒说，会遭到“祖师爷的惩罚”。门徒吓得将自己的儿子痛打一顿，跪下向董求饶。“主神教”的头目们以“降灾”、“遭难”相威胁，以“命定”、“通圣灵”相诱骗，大肆强奸和奸淫信徒。胡说什么与被奸妇女是“前世命定”，被神“蒙召”可以“通圣灵”，能够提高自己的修炼，同时威胁女信徒，如果拒绝“蒙召”，神就要给她降下灾难，她的全家就会生病、死亡。他们特意规定，女信徒必须“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献给神，无论神吩咐什么都应毫无怨言”。更有甚者，有的头目竟要求多名妇女甚至姐妹与他们同床淫乱。据有关部门查实，被“主神”刘家国强奸和奸污的女信徒多达 10 多人，其中未满 14 岁的幼女 2 人，有 6 名女信徒被胁迫为他生儿育女。美国“大卫教”教主考雷什宣称自己是教内惟一有权拥有妻室的人，所有信徒的妻子全归他所有。他在教中任选大至 50 岁女教徒，小至 10 岁的儿童为妻。“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有一个难填的欲望——常常对

自己年轻漂亮的女信徒提出性要求，而在他的巧言令色下，这种淫秽的行径竟然也被那些善良天真的女信徒当做是“圣殿之父”的一种恩赐。到 1971 年底，在“人民圣殿”教中，几乎所有的年轻女信徒都曾在这位“圣殿之父”的床第尽过自己的义务。日本的麻原彰晃要求“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入教必须先饮教主的鲜血，女教徒则要向教主贡献自己的肉体。

4. 罪恶累累的邪恶势力

世纪更替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据所得情报，认为邪教和恐怖分子可能发动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恐怖攻势，对邪教和恐怖分子来说，这是千年一遇的决定性一战。公元千年更替之时，世界上曾发生过宗教战争和不少由邪教及宗教狂热分子发动的恐怖事件。美国担心历史重演，联邦调查局向全国军、警、特工和情报部门发出警告：时刻提高警觉，防止宗教狂热分子、恐怖分子、种族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发动袭击，并调动大量人手做好各种准备，防止邪教作恶。联邦调查局把这项行动称为“美吉多计划”。

基督教《新约全书》的最后一册《启示录》中说，美吉多山是上帝与恶势力决战的指挥中心，基督将在那时再次降临地球。“美吉多”是位于以色列古城泰勒的一座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 1468 年，美吉多曾被古埃及攻占过，以色列征服迦南后收回此镇，由所罗门国王建成军事中心。此地曾发生过宗教和种族流血事件，邪教和极端分子横行，不稳定局面持续多年。后来古犹太人反抗罗马征服者，

分别于公元 66~70 年、公元 132~135 年爆发过两次战争，战况惨烈，数百神庙被焚毁，约 60 万犹太人被杀，其中数以百计的孩子被邪教组织捉去献祭，惨死祭坛，幸存者则背井离乡，流散异地。“美吉多”已经成为邪教与恐怖的代名词。

的确，邪教特别是现代邪教，都是和恐怖联系在一起的。新千年到来之际，基督教神学的“千禧年主义”成为邪教的利用工具，世界各地的邪教组织大搞恐怖活动，无孔不入，无恶不作，不断地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制造事端，以配合“世界末日”论的圣经预言。有些打着宗教、慈善和非政治组织的旗号，从事政治性的活动，有些则参与偷税、诈骗、贩毒、走私、暗杀、绑架等犯罪活动，导演并实施了许多灾变，犯下了一幕幕罪恶行径。每一门邪教，都有其一段罪恶的历史。

(1) 残害生命

邪教组织拿生命当儿戏，肆意残害生命。他们宣扬“世界末日论”、升天、转世等歪理邪说，从精神上控制教徒，然后残害教徒生命。20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发生了数起邪教灾变事件：1969 年 8 月，好莱坞一间豪宅发生淫邪献祭活动，举行“血的弥撒”，艳星莎朗蒂及另 4 人惨变成祭品；1978 年 11 月，“人民圣殿”教的吉姆·琼斯“教主”，在圭亚那丛林举行集体升天仪式，913 人服毒自杀；1985 年，“大主教教会” 60 名信徒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集体服毒自杀；1993 年，德克萨斯州“大卫教”派“教主”劳厄尔，从 2 月起领导信徒与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人员对抗，到 5 月 1 日克林顿批准总攻，双方爆发大战，在交战中邪教自己放燃“圣殿”

大火，80多人死亡；1997年3月，“天堂之门”教主阿普尔怀特和38名信徒集体自杀；1993年2月28日，考雷什在用重机关枪等武器与警方对峙了51天后，竟然点燃大火，将自己与其他85人葬身火海，其中包括17名不到10岁的孩子。乌干达“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残害了千余名教徒的生命。“法轮功”也给自己的信徒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短短的几年里，由于习练“法轮功”，已经造成1400多人死亡，更有不计其数的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邪教组织不仅残害自己的信徒，而且还把矛头指向揭露、反对该邪教组织的人，甚至与邪教组织毫无瓜葛的一般民众。早在1989年11月，6名“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就将对该教持批判态度的“横滨奥姆教被害者之会”顾问律师坂本堤一家3口杀害。1994年6月，麻原彰晃派7名信徒在审理涉嫌“奥姆真理教”案件的长野县松本市一法官住宅附近放置沙林毒气，造成7名当地居民死亡，约有590人受伤。更为残暴的是，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试图通过选举进入日本政治中枢的图谋受挫后，竟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进行疯狂报复，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5500多人中毒。1988年以来，以杀人来祭祀的“撒旦崇拜”曾一度在世界不少国家流行。1989年4月，墨西哥发生了13人在“撒旦崇拜”的仪式中被活祭杀害的事件，其中除一人遭枪击、一人被开水煮死外，其他人均被活活虐待而死。1991年，澳洲又发生“撒旦”杀食儿童事件，在场的居然还有大学教授、警察和医生，亲眼目睹了儿童被剥杀、煮熟和分食……非洲

南部盛行一种恐怖邪教，即由部族祖先与“神”混合而成的“神授教”，经常举行古怪崇拜，用男人尸体和女人的血作饼分赠信徒，称为血餐，闻之令人毛骨悚然。而且他们举行杀人献祭仪式时，选中的“祭品”大多是男女儿童。

1999 年，在美国发生的 3 起事件，也足以说明邪教的恐怖特征。7 月 4 日，美国人本·斯密斯在印地安纳州和伊利诺依州开枪打死 2 名、打伤 10 名少数民族裔人后开枪自杀。警方在他家里搜出一些读物，这些读物宣扬从 2000 年开始杀死少数民族裔人。8 月在洛杉矶犹太人幼儿园开枪杀人的布福德·弗罗被捕后交待说：“现在是美国人觉醒和干掉犹太人的时候了”。在德克萨斯州用汽车拖死一名黑人的约翰·金泽声称，他的行动有助于发起一场“种族圣战”。

世界不少战争或社会动乱，多由宗教和种族冲突而起，而邪教也不甘寂寞，推波助澜，且行动诡秘。在中东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黎巴嫩、印——巴、波斯尼亚、印尼内乱和非洲各个战场中，恐怖行径大多与邪教分不开。1994 年卢旺达内战，胡图族与图西族展开种族大屠杀，数十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在这场大悲剧之中，神授教和其它邪教被认为充当了神秘角色。安哥拉、索马里、乌干达等地内战，往往是邪教使战局复杂化和更为血腥。1998 年初，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游击队在西部作乱，屠杀千人，很多人被割喉而死，据称这并非正派伊斯兰教游击队所为，是邪教血洗村镇。

(2) 反政府、反社会

邪教宣扬歪理邪说，走歪门邪道，聚集了一批邪恶势力

力。邪就必反，邪教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为社会现实所不容，同时，邪教都是被当地政府所打击的对象，因而邪教都有其反政府、反社会性。

一般来讲，妖言惑众是邪教反政府、反社会的惯用伎俩。邪教总是编造谣言，恶毒攻击诽谤政府，煽动群众不满，抹黑社会，把社会说得一无是处，妄图达到邪教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贯道”就是利用造谣这一伎俩进行反革命煽动。他们诽谤党和政府，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破坏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他们造谣说：“现在是佛魔世界，五魔要闹中华，流星（五星红旗）要下地狱”，“牛头鼠尾大考到，老虎头上明灯照”。意即 1948 年鼠年，1949 年牛年共产党胜利了，但到了 1950 年虎年；“一贯道”就得势。当有的地方发生自然灾害，“一贯道”就造谣：“三期末劫已到，七七四十九天暗无天日，刮罡风，下油雨，饭无人吃，衣无人穿，房无人住，路无人行，赶快求佛，才能脱此浩劫。”“一贯道”的谣言，给许多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迷信落后的群众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对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生产建设也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

近些年来，“一贯道”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它利用在一些有迷信思想的落后群众中的残余影响，暗中继续作乱。他们除秘密恢复旧有组织外，还针对政府的各项工作造谣惑众，如“老佛爷要去世，白阳佛要掌道，变中国为‘佛国’”等，同时利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缝制了什么“道国”、“佛国”的国旗，甚至选好了“皇宫”的地址。“法轮功”及李洪志对现实社会和政府的攻击，更是明目张胆，毫不隐讳和肆无忌惮，



打山“一貫道”

他胡说：“现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民族问题、国家与国家的问题、民族之间的矛盾、许许多多社会犯罪，各方面的原因，哪个政府都头痛，谁也解决不了”。他还攻击政府和法律允许社会丑恶现象的存在，扬言：“人类社会黑浪滚滚”、“人类社会法不灵了”。李洪志无限夸大某些社会问题，动辄谩骂人类，谩骂人类社会，带有明显的反人类反社会的性质。但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攻击政府。既然如他所说，社会问题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哪一种法律都没有用，整个人类都没有办法，当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是解决不了的，那就只有靠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大法”了。这是公开的政治煽动，其罪恶用心，昭然若揭。

邪教仅仅通过造谣诽谤是不够的，远远达不到它所要实现的目的，邪教还经常进行捣乱破坏，甚至进行武装暴动、恐怖活动。解放初期，一贯道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疯狂进行破坏和捣乱。1949年1月，江苏高邮、宝应、淮安、淮阴等地以一贯道、西乾道为首，策划武装暴乱；1950年，一些漏网分子再次密谋暴乱，决定南起扬州、北至云台山之间数十县一起暴动，气焰嚣张。与此同时，在辽宁台安县，一贯道头子全德有，纠集道徒七八百人，铸刀买枪准备暴乱。

1950年9月7日，“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在济南秘密集会，该会会长之一的石云星及其子石东林，阴谋纠集地下匪特武装“农众自卫军”，于中秋节前后在德州等地叛乱。时间近一些的邪教暴乱事件也有：1978年，山东曹县王存兴加入“黄沙会”并被发展为“接班人”后，积极进行道务活动，大

办“佛堂”，叫嚷“推翻共产党”、“夺天下当皇帝”、“定都北京”。为策划暴动，王存兴带领其骨干分子专门到陕西秦岭进行所谓“神附体报告”，大讲“改朝换代”的歪理邪说。1980年，王存兴发动暴乱，“告示”要“清村”，“跟着走的是一班人，不跟着走的就打死”。当公安人员包围了暴动现场，开展政治攻势，部分受骗群众离开现场时，王存兴及其骨干分子竟放火烧房子，公安人员在救火时被暴徒打伤 10 多人，最后被迫开枪，平息了暴乱。

在国外，各国邪教组织都把新千年视为他们欺世和扩展影响力的千载良机。据美国反恐怖专家估计，全球约有 200 个邪教组织把新千年定为“世界末日”，鼓吹采取暴力行动加快“末日”的到来，以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他们以所谓“世界末日”的邪说蛊惑人心，令信徒惶惶不可终日。邪教教主为求预言应验，极力想在千年之际制造恐怖事件。美国的邪教组织除了把一些社会现象说成是“世界末日”到来的征兆外，还把政府说成是恶魔撒旦的帮凶，而 2000 年是向撒旦宣战的年份，所以要掀起一场反政府的暴力斗争。现时美国的邪教和极端组织大都受一本《特纳日记》的影响，该书作者威廉姆·皮尔斯是一个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组织“全国联盟”的首领。这本书详细描述了白人至上主义分子武装推翻美国联邦政府的情形，并描写了“同时发生的”一场残酷的种族战争的情景。《特纳日记》是一本新千年到来之际邪教暴力行动的犯罪教科书。邪教教主在演讲、“发经文”和日常公开谈话中，一般都不会号召进行暴力活动，他们往往在讲话中作出暗示，让信徒去悟出其中的奥秘。有从事暴力

活动计划的邪教往往注意招募有军事经验的人员入教。

同各种邪教相比,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反政府、反社会的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麻原不仅购置制造、散布沙林毒气的设备甚至直升飞机,而且着手大量生产自动步枪和研制生物武器,探讨购买坦克、核弹头乃至开发激光武器的可能性,并加强了在自卫队发展信徒的力度,为建立“真理军”做准备。麻原一伙在东京地铁放置沙林毒气事件的主要目的,是选择人口密集的东京都市中心进行沙林毒性试验,为开展大规模反社会的毒气战做准备。

邪教反政府、反社会的真正目的,是要企图控制政府,自建王国,建立以教主为中心的政府和社会。邪教教主大都有政治野心,有的一开始就有政治图谋,有的则是在实力壮大后政治野心随之膨胀,他们不满足于在“秘密王国”实行神权加教权的统治,还要在全国甚至全人类实行神权加教权的统治,于是与政府对抗,试图取而代之。

(3) 网络邪教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时髦名词,,然而当你在互联网上遨游的时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掉入陷阱:你访问的网站可能是一个邪教网站。今天,当全球各地重要网站遭黑客袭击时,追踪黑客的欧美的调查人员在调查时猛然发现,原来已有不少的邪教组织在国际互联网横行,兴风作浪,他们这才察觉,网上邪教危害已深。

1997年3月,美国“天堂之门”教主亚伯·怀特带领39名信徒集体自杀前,在网上留言:“等待海尔一波普神迹,快乐离开世界。”这句恐怖邪语,被视为邪教在网上大行其道

之始。追踪黑客的美国专家指出,美、加、拉丁美洲、欧洲和亚非,都有邪教在网上宣扬异端邪说,抹黑政府,对抗现实社会。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及由该教改名的“阿勒非”教派、法轮功、魁北克的“末世教派”、巴西的“回到未来”及美国“海尔一波普”等,都在网上建立据点,以求无限发展,“接通天堂”。邪教网上行,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发挥其影响力。日本警方相信,真理教内部有不少电脑技术人才,正在从事建立一个网上神殿,利用电脑和互联网导人救赎皈依或进入冥想状态,网络邪教正向全球发放“灵力”,麻原想做网上之神。

邪教网上行,方兴未艾,大多数组织为掩盖其真实面目,以多个名称出击,宣扬永生之道,目的都是为了吸收更多信徒。

(4)东郭先生和狼

邪教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掀掉羊皮,狼的本性已暴露无遗。如何对待狼,“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会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东郭先生不分正邪,帮助狼逃过猎人的追杀。然而,狼终归是狼,是不会改变吃人的本性的,狼当然要回过头来吃掉东郭先生。农夫设计把狼骗进口袋,毫不犹豫地举起镢头把狼打死了,并告诫东郭先生,“对于狼是不能心慈手软的”。

邪教这只狼,作恶多端,已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这是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学做东郭先生,对邪教组织心慈手软,只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也是对公民人权的践踏。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听任邪教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破坏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学做“农夫”，对于邪教进行坚决的打击和彻底的消灭，是对社会的负责，对人民的负责，铲除邪教毒瘤已成为全社会广泛的共识。

近些年来，特别是当前处于世纪之交之际，世界各国加大了对邪教打击的力度。在日本，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后，逮捕并审判了“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及 30 名教团头目，并主要针对防止“奥姆真理教”的复辟，制定立法限制邪教的活动。欧洲各国近几年开始共同打击邪教组织，各地“科学教”的头目和骨干分子被审查或判刑。欧洲国家采取的对策是以议会为中心打击邪教活动。法国议会在 1995 年就设置了有关邪教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用 6 个月时间听取了邪教组织代表和被害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写成一份《报告书》。《报告书》首先提出了邪教组织具备的“精神不稳定”、“非法索要钱财”、“教唆他人与其生长的环境隔绝”等 10 条标准，接着明确指出有 172 个团体可以认定为邪教组织，吁请对这些团体予以注意。法国政府据此于第二年设立了直属总理的专门机构，负责分析邪教的情况和动向，制定必要的对策，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比利时议会也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并于 1996 年发表了长达 670 页的有关邪教组织的报告，报告不仅写出了符合邪教标准的 189 个团体名单，而且明确指出它们有漏税、榨取他人劳动、非法医疗行为、虐待儿童等问题，以唤起政府有关部门提高对邪教危害的认识，要求警察当局严加取缔。德国议会于 1998 年发表了有关邪教组织的报告书，呼吁设立旨在搜集有关邪教组织

的情报机构和处理与邪教有关的财团，以加强对邪教的打击。还建议对所谓“自我启发讲座”等活动采取立法措施，对无证举办或滥用这类讲座的人严加限制。欧盟议会从 1994 年起，已 4 次做出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和议会加强对邪教的打击。

在美国，由于所谓“重视信教自由”，不仅政府和议会过去一直没有就邪教问题采取特别措施，相反，从事邪教问题研究的团体却往往被邪教组织以“损毁名誉”之类的罪名告到法庭，由此造成了邪教组织在美国的泛滥成灾。但是，美国国内一直活跃着数千个抵制邪教的民间社团，他们多次呼吁政府部门加强执法，严密监控邪教组织的活动，并及时采取行动予以打击。邪教组织的猖獗，特别是连续发生多次邪教灾变事件，终于使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打击邪教的非法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 1993 年 4 月，全副武装的特工人员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攻进了邪教组织“大卫教”盘踞的山庄，彻底摧毁了这一邪教组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对邪教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决不给邪教以存在的空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各种会道门组织妖言惑众，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全国公安机关给予了几次集中打击，把它作为同现行反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进行，采取的对策主要是争取教育多数，打击惩办首恶分子和作恶多端的骨干分子。例如，山东省从解放前后到 1953 年，经过了 3 次集中取缔打击行动，全省共取缔反动会道门 211 种，查获大、中道首 1.08 万人，依法判处了一批罪恶累累的道首和骨干分子。到公安机关登记的小道首和

办道人员 2.54 万人，声明退道的道徒会众 101 万余人，查封坛(堂)口 1.2 万余处，缴获会道门财产 737.7 万元，缴获各种罪证一大宗。经过全国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解放初期，各种邪教组织在我国就基本绝迹。近些年来，邪教组织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些新冒出来的邪教组织同样受到了坚决的打击。适应新的历史形势，为惩治和防范邪教活动，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1999 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决定强调，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做出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使我国处理邪教问题有法可依，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严惩邪教的法治精神。

三 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生》

这是一首李商隐感叹贾谊的诗。西汉政治家、思想家贾谊，年轻志大，满腹治国经略，颇思改革，曾任太中大夫，后遭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文帝对贾谊很器重，曾召见他于宣室(西汉未央宫前的正室)，彻夜长谈。因正值祭祀完毕，文帝问的只是鬼神之事，却不间百姓，不问有关人、民生计的大事。汉文帝算得上一代有道明君，依然被鬼神之事深深困扰；贾谊报国宏图难展，亦只能徒叹命运不济。

“迷信”非常重视人的命运，重视人的吉凶祸福。然而人的命运怎样，如何有好的命运，人的行为是凶是吉，如何能够逢凶化吉，对于这样的问题，迷信却是不问人事只问鬼神，人要做的就是去敬鬼侍神，遵从鬼神的意旨。神说不宜

出门就不能出门,神说不宜动上就不能动上,神说是吉就不是凶。……“不问苍生问鬼神”是迷信的真实写照,用它来形容迷信最恰当不过了。

1. 巫风的传承

迷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现象。《辞海》(1999年版。下同)给迷信的定义是“一般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鬼神等的愚昧思想。泛指盲目地信仰或崇拜。”而这些所谓的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都是在人类原始的巫风中形成的。迷信是原始巫风的传承,了解迷信,先要了解巫风。

(1) 巫术与迷信

人类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巫术。巫术产生于人类的蒙昧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对周遭变化莫测而又非常险恶的环境总有一种恐惧而又神秘的感觉。为什么会有风雨雷电?为什么会有做梦、影子、回音、死亡现象?他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灵魂,这便形成了人类最初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的发展,便逐渐形成了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神灵崇拜一旦形成,自然力量本身就不在直接成为崇拜对象,因为神灵成为自然现象、自然力量背后的最终支配力量,因此人们也就径直崇拜神灵了。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去影响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条件下,人类实际的影响、改造自然环境的力量是十分低下的。在神灵的观念支配

下,人类幻想通过神灵的力量来影响、改造自然环境,巫术便产生了。《辞海》解释说,巫术是指“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加强影响或控制的活动。”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也认为,“巫术体现了人类更早历史时期的更为原始的思想状态”^①,“巫术断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对象,无论是人或神,最终总是从属于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适当的仪式和咒语来巧妙地操纵这些力量,他就能够继续利用它。”^②在弗雷泽看来,巫术实质上是人类试图控制自然力的一种行为方式和行为指导。

人们最初总是希望通过巫术活动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发现巫术并不能完全奏效,进而意识到可能有某种不受人力控制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将之作为信仰的对象,这便是宗教。宗教表现为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依赖,人们希望通过宗教与超自然的力量建立某种联系,以求得它的保护和合作。因而,巫术先于宗教,宗教源于巫术。

然而,巫术作为人企图借助自己的行为去影响自然过程的手段,虽然并不能完全奏效,但它确是当时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巫术并没有完全单一地走向宗教,而是仍然试图用各种仪式和咒语以及对鬼神的崇拜来控制自然力量,这样,巫术又走向了迷信。

在中国古代,有专门从事巫术活动的巫。巫的权力很大,主要的职司是奉祀天帝鬼神及为人祈福禳灾,并兼事占卜、星历之术。由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人类的认识能力非

^① 弗雷泽:《金枝》,第 86 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

^② 同上书,第 77 页。

常低下,古代人凡事都要占卜、问天、问鬼神,巫便扮演了交通人与鬼神的角色,他有权解释鬼神的旨意,有资格替鬼神传言,甚至根据他的传言去指导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决策国王的行动,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同打仗一起成为国之大事。实际上,即使出兵打仗,时机如何、结果怎样,也必先祀神问卜。因此,巫便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形成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巫卜文化。巫官不仅权力在握,同时也是集天文、地理、人文于一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善歌舞、音乐,还能医治疾病,因而《国语·楚语》云:“是古巫者,必由智、圣、聪明者为之。”其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巫的职权逐渐缩小,演变成为旧社会中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巫师。

一般认为,夏商之际,巫达到其鼎盛时期,巫祀之礼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形成风气。巫祀离不开歌舞,以歌舞事神,因而巫术又有“跳神”之称。

巫,在民间有各种叫法,汉族称男巫为师公、神汉、先生、处师,称女巫为仙娘、巫婆、神婆。蒙古族称男巫为“波”,称女巫为“乌得干”。鄂伦春族称“萨满”、“德勒库尔萨满”。黎族称男巫为“华摩”、“西波”,称女巫为“苏民”、“么尼”。侗族、瑶族则称巫为“端公”、“领头”等等。

民间的巫师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正、邪两类。所谓“正”,是指古代巫官的传承人。他们历经祖传或师承,保存一些原始的经文旧典、祭祀礼仪,能解释某些符号的含义,在思想上相信鬼神的存在,在一定的文化意义上说,有可取的价值。所谓“邪”,是指巫师本身不信或不完全相信鬼神的

存在，其巫术活动并非真正给人作法术，而是打着巫的旗号，欺人钱财，往往造成斋主家破人亡，在百姓中有极其恶劣的影响，完全属于骗子一类。

民间的巫师一般也可分为三个层次：受过专门训练的，属最高层次；经过一定训练而未取得“正果”的，属中间层次；未经训练而行巫的，属低层次。

高层次的巫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要先行拜师受戒礼。在学习、训练的过程中，学徒要习诵经文，熟背卦文卦义、巫词、咒语，了解祭祀礼仪及程序，行足步斗，禹步作法，学会乐器的演奏和舞蹈，熟悉民间通俗文艺形式，懂得一些医学、天象和地理(相风水)方面的知识，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学成。出徒时由本坛主帅发给“兵牌”（相当于毕业证书），此后即可自行设坛或参加其他坛门师班的祭祀活动。作一名合格的巫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设坛作法时，心要想，口要念，手要做(做各种手势或舞神器)，脚要盘(盘即跳)，要按规矩行事。否则出了差错，被内行发现，就会贻笑大方，甚至丢掉饭碗。这类巫师，在民间有较高“威望”，虽无固定收入，但为人做斋、诊病、看风水等，收入也相当可观。

中间层次的巫师，他们多数进过坛门，往往由于某种原因中途改行，学业未成，没能领取“兵牌”，因而不能独立开坛，多随某一坛班充当助理，无事时则在家务农。

低层次的巫多见于女巫，她们未受过专门培训，凭自我感觉“作法”，装神弄鬼，糊弄百姓。

(2) 术数迷信

中国自古以来的迷信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但总体上说，

最主要的形式是各种术数及祀神活动。史书《左传·僖公四年》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献公想立美女骊姬为夫人，便请人先行占卜，然而占卜的结果却大不一样。龟卜的结果为不吉，不能立；占筮的结果却是吉，可以立。晋献公贪婪骊姬的美貌，欲听从筮人的意见，卜人坚决反对，认为占筮不如龟卜灵验，龟卜的结果是正确的，千万不能立骊姬为夫人。不想放弃美女的晋献公采纳了占筮的结论，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殃及五世的祸患。大概记载这段故事的人比较相信龟卜，因而要人们也要相信“筮短龟长”。只是不知道如果晋献公采纳了龟卜的观点，命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由此看来，我国古代自上而下就非常相信迷信，而且迷信的方式很多。晋献公所用的占卜，是一种“术数”的迷信方式。

“术数”也称“数术”，“术”指方术，“数”是气数，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汉书·艺文志》里列举了六类术数：一是天文，通过日月星辰等天象所进行的占卜，如日食、月食、流星、彗星等天文现象进行的占星术；二是历谱，也称历忌学，是把历学与数学计算相结合的方法来推测某时做某事是凶是吉；三是五行，是把音律与时令、五行相联系推测吉凶；四是蓍龟，包括蓍筮和龟卜；五是杂占，有占梦、占耳鸣甚至占喷嚏等占术以及驱妖镇邪的巫术；六是形法，即相术，包括相人、相物等。《汉书·艺文志》并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但史官久废，除天文、历谱外，后世称数术者，一般专指各种迷信，主要有星占、梦占、卜筮、奇门遁甲、八字算命

扶乩、拆字、相术、风水、占候等等。

下面我们主要通过了解蓍龟、星占、风水等来看一看术数迷信。

①蓍龟可谓是最早出现的占卜形式。中国远古时期，人们最早是借助龟甲和蓍草进行占卜的，“史”与“巫”是专门负责龟卜和蓍筮的神职人员。“史”的主要职责是记载人事变化、观察天象、整理典籍等；巫代替鬼神传言的主要方式是卜筮。龟卜的时候，先把磨成一定形状的龟甲的背面钻一圆窝或梭形的浅凹槽，然后用火灼龟甲背面的窝槽，于是，在龟甲的正面相应的部位就会出现“卜”字形的裂纹，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显隐以及龟甲开裂时所发出的声音，成为人们预测吉凶的依据——卜兆。我们现在出土的甲骨文就是龟卜留下的遗迹。而蓍筮则是用一种名为蓍草的草梗，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推演，以预测吉凶。

②所谓星占，是通过观察星辰运行预言人事祸福的一种方术，即把天上的星宿人格化、神话而进行崇拜，并把它同图腾崇拜、动物崇拜，以及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据此判断世人的祸福，这是原始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人崇拜星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星辰给人们带来利益，人们离不开它。如太阳给他们带来了温暖，月亮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北斗星可以帮助他们确定方向，星移斗转可以帮助他们确定季节。对这些星辰的崇拜表示了人对天象的感激之情。二是对一些异常星相人们不理解，有一种惧怕心理。如人们不理解日月之食，以为被什么东西吃掉了，汉族中流传天狗吃太阳、蟾蜍吃月亮的神话，彝族的神话则是老虎吃太

阳、天狗吃月亮。对星相的感激与惧怕，形成了人们的星神崇拜。

由于人们对自身的吉凶祸福无法认识，更无法预料，特别是当某一祸福同某一天象偶然发生联系的时候，天象就变成了人们解释并预测吉凶祸福的方式，所谓星相迷信便悄然无声、自然而然地从星神崇拜中产生了。日月之食一向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或是氏族的浩劫，或是部落的内乱，或是酋长的死亡。彗星则被认为预示着大瘟疫、大兵变。实际上，人们一开始只有一种星辰崇拜，只有在天上出现某种奇异的星相时，人们才会想到是吉是凶，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随着天文知识的积累及星相观测的增多，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观测星相，把阴阳五行学说融入了其中，并自觉地把它同人事联系起来，用它对人事吉凶祸福预先做出判断，使星相与人事的比附有了一定之规，于是就出现了带有自觉性的星占迷信。原本人们经过长期细心观察所获得的丰富的天文、历学知识也被埋没到迷信中去了。

不仅如此，按照星占理论，星相不但暗示和预兆各种社会人事的吉凶祸福，而且决定着每个人的贫富贵贱、穷达寿夭，这就是所谓以星占命，即“星命”。然而，中国古代的“星命”虽因星占迷信而产生，却很快又脱离星占而汇入一种更粗俗的迷信——推命术。在后世的推命术中，同星占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所谓“神煞”观念。“神煞”是指具有神性的各种各样的神相，它们以干支顺序排列，循环出现。某人出生时适逢某个神煞临照，即所谓“照命”、“人命”，这个神煞就影响此人一生的命运。例如，遇上天德星，就是贵人命，一生吉

利,荣华富贵;遇上月德星也是好命,大吉大利;遇上天赦星也不错,一生处世无忧;遇上三奇星,出类拔萃,博学多才;遇上文昌星,聪明过人,文思敏捷;遇上华盖星,则是和尚命、道士命……要是一个人总是倒霉,肯定是遇上了十恶不赦、六甲空亡、天罗地网、亡神、六厄之类的灾星;若是“酒色猖狂”之徒,据说是“桃花煞人命”。由于作为神煞的星相完全是虚构的,如此推命同星占已相去甚远。

③风水,亦称“堪舆”,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是相宅、相墓之法,即用来选择活人居住地(所谓“阳宅”)和选择死人居住地(所谓“阴宅”)之术。

选择居住的地方,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据长期的经验,避风靠水,是人们寻找居住地的最基本选择。这时的“风水”依靠的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经验知识,没有迷信可言。然而,把“风水”思想引入到“择地葬亲”,特别是注入“荫后报应”的观念后,“风水”便由关于自然环境的经验知识褪变成了相宅、相墓的巫术,“风水”成为了“风水术”,完全变成了迷信。按照“荫后报应”的观点,“择地葬亲”除了表达人的孝思的情感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自己和后代着想。为故去的亲人选择一块好风水的“冥府”,使他们能够安居,死而不朽,他们就会福荫后世,使阳世后人人丁兴旺,富贵荣华。

从根本上说,“风水术”是人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摆脱冥冥之中的大自然的所谓惩罚,而进行的一种巫术活动。它的实质不在相宅、相墓本身,而在于相宅、相墓的指导思想

和目的，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迷信。

(3) 鬼神迷信

祭祀鬼神也一直是很重要的迷信活动。人类社会早期，先民们对与自己生死攸关的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生理现象，不能做出科学解释，认为宇宙事物的一切变化，都是由神来主宰，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支配。因此，人们想方设法用各种祭祀的礼仪形式去亲近神灵，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以达到招祥纳福、禳祸除灾、驱鬼逐疫、化险为夷的目的。

中国民间的祀神具有浓厚的泛神色彩，道教的老君、真人，佛教的菩萨、观音，儒家的“春夏秋冬夫子贵”，古代的英雄、门神，以及自然神的雷公、风伯、山神、土地爷和各地的地方神，统统都是祭祀、崇拜的对象。“见庙就烧香，遇神就磕头”，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泛神色彩。

祀神的礼仪和程序，一般分为请神、迎神、会神、送神等 4 个步骤。会神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向神表达祈神的目的和要求，其他的 3 个步骤都是为这一步骤服务的，离开了这一步骤，其他的 3 个步骤就毫无意义。每一个步骤又由几个部分组成，如请神中包括“请坛起水”、“发功曹”、“结界”、“架桥”等；迎神中包括“进兵”、“造云楼”、“立寨”、“接兵”、“拜请落禁招兵”等；会神中包括“和神”、“敬牲牲”等；送神中包括“邀唱”、“撤寨”、“送行”等。祀神活动时，根据需要，可删可增，可简可繁。祀神做法事时，要择“黄道吉日”、“斋戒洁身”，身穿法衣，佩带神刀、神杖、牛角等。

根据祭祀的目的，祀神活动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祈

神降福许愿,二是酬神欢庆,三是超度亡灵斋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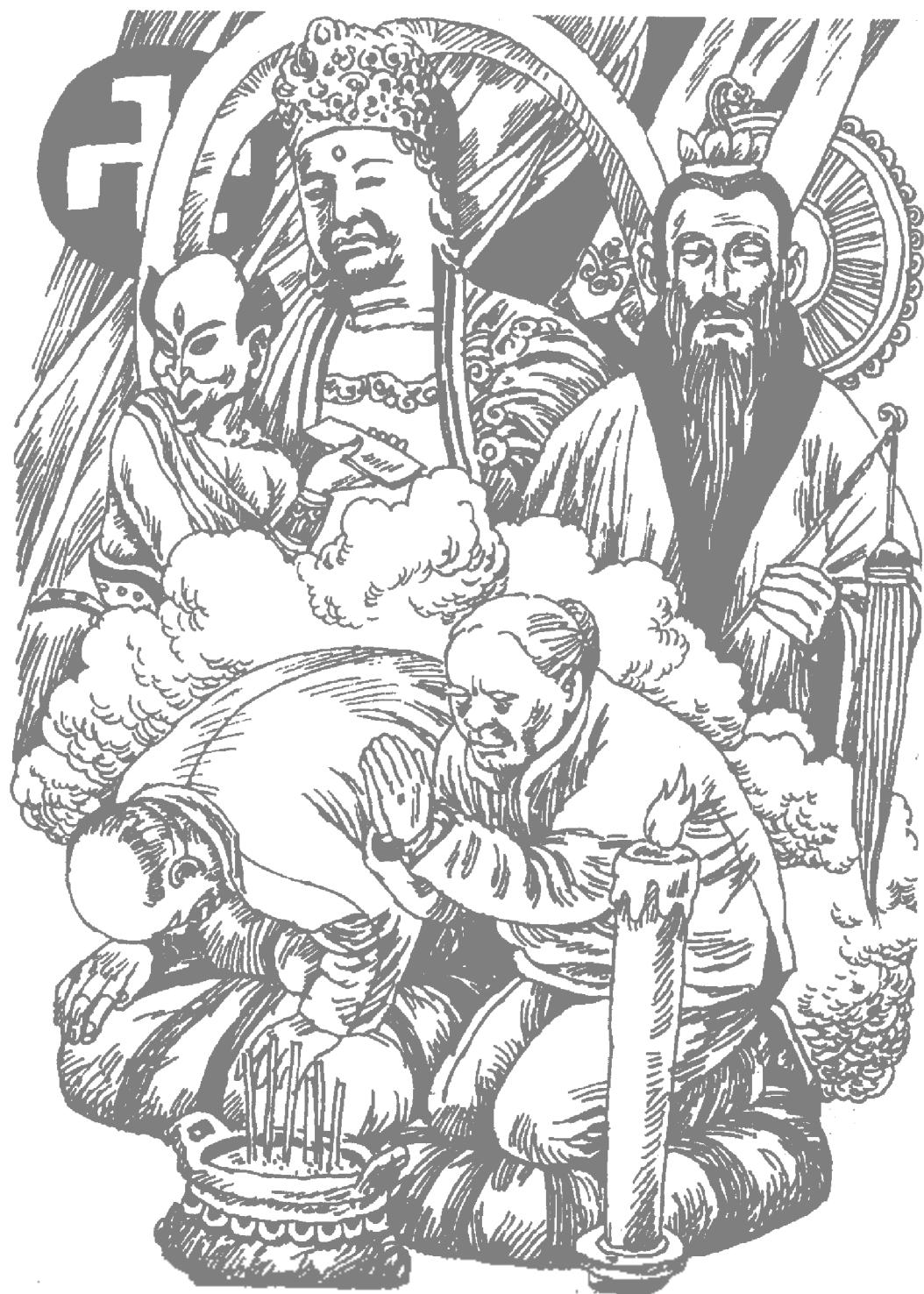
①祈神降福许愿。主要是由于人们碰到了天灾人祸等困难,祈求神灵降福,帮助人们消除灾难。如天旱、水灾、地震、雹灾、虫灾、瘟疫流行时,人们靠自己的力量无能为力,便请巫师设坛祭神,祈福消灾。病人病重或垂危时,认为或是触犯了天条,或是鬼怪作祟,于是便通过祀神,借助神灵的威力,通过“跳神”驱鬼逐疫,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病人转危为安。人们也常常为了实现某个愿望而祈神,如为求子嗣、求配偶、求家庭和气、求功名、求财源、求长寿等而祈神。

②酬神欢庆。每逢丰收年景,生活安定,或遇神灵诞辰,或是先前的许愿已实现,人们便要请巫师设坛祭祀,酬谢神灵。此类祭祀自原始社会以歌舞祀神开始,经商代逐渐演化成一套融歌、舞、乐、诗为一炉的酬神、娱神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在现代有许多已演化成民间的文艺和体育活动。

③超度亡灵斋醮。这是一种死了亲人尤其是死了尊长所举行的一种斋醮仪式。死者的亲属为了安慰亡灵,使其灵魂早日升天,或少受阴间之苦,及早转世投胎而举行的祭祀活动,俗称做“道场”。整个礼仪程序一般包括开台、中发、进表、开路、买酒、念经、解冻、上供、拜谒、献香、棉花、开荒、穿道、跑花、过奈何桥、上刀山、跳火海等内容和程序。有的做三天、七天,多者可做七七四十九天。

(4)迷信的消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迷信活动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迷信不但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统治阶层也非常推



鬼神迷信

崇。从晋献公欲立夫人请人先行占卜，到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从历代国都的确立到历代帝陵的选择，等等，都说明了古人对迷信的虔诚态度。各朝代经常以国家名义进行祭祀活动，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种从朝廷到民间对迷信的推崇，为迷信活动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提供了肥厚的土壤。

应当承认，同宗教一样，迷信的产生也有其客观必然性，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态。由于人们不能认识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吉凶祸福，便认为同天上的某一星相有关，于是有了星占迷信；人们认为做梦同某种还没有认识的东西相联系，于是便有了梦占迷信。“风水”强调风、水在选择宅、墓中的影响，剥去其迷信的外衣，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只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迷信便越来越表现出了它的愚昧性。法国学者加斯顿·马伯乐就巫术问题曾说过，我们不应当对巫术这个字眼抱有那种在现代人心目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鄙夷的看法，古代的巫术正是宗教的基础。古人认为，虔诚的、要想获得神的恩惠的人，除非双手抓住神，否则就没有成功的机会。而这只有通过一定数量的典仪、祭品、祷词和赞歌等等才能得到。迷信也是这个道理。

迷信也曾发挥过它特定的历史作用，比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常利用宗教、迷信等来聚集发动群众。又比如，许多民间艺术，是从迷信活动仪式中演化而来的。迷信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质，迷信活动举行各种仪式，既在娱神，同时也在娱人。许多民间艺术被认为是产生于古代的巫术和迷信

活动,如舞蹈是从巫舞中产生的。古代的祭祀活动都离不开乐、舞,巫必须要善歌舞、音乐。作为民间乐舞祭祀,祭祀必以歌乐鼓舞以娱诸神,娱神实为娱人,所谓“以慰其辛劳之民,使发舒其困顿郁塞之情”。所以巫师们在创作歌舞时,一方面寄希望它们真能产生某种“神力魔法”,同时也力求在视听效果上赋予它们以审美价值,让人们在虔诚祈祷的同时,也得到审美的愉悦。

但是,从总体上说,迷信更多地表现的是其消极的意义,统治者把它用来愚弄广大人民群众,维护其统治地位;巫师们常把它作为欺世盗名、诈骗钱财的手段;而对于广大下层群众来说,迷信使他们的神经更加麻木,把他们引向愚昧的歧路。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迷信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愚昧性,同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破除迷信活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迷信活动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迷信活动基本上形不成气候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2. 迷信的回潮

历史到了 20 与 21 世纪之交,历史老人像是打了一个盹,一睁开眼,竟惊诧地发现:原本在神州大地已经销声匿迹的各种迷信活动,曾几何时又卷土重来且愈演愈烈了!

当你漫步在街头,猛不丁会有人拦住你的去路,要看你的手相和面相;当你徜徉在旅游景点,映入眼帘的常常是烟雾缭绕中的善男信女们烧香拜佛、口中念念有词;当你看到

某一个单位正在修建新大门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到这是缘起于某个不能说出口的原因：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体育运动，但是足球队员去球场的路上，女性绝不能随车同行，若是输了比赛，你难辞其咎……

迷信原本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空前活跃，然而，在新思想、新观念出现的同时，一些旧思想、旧观念也浮出水面，特别是各种迷信活动又沉渣泛起，并且产生了许多现代新迷信。迷信活动为什么在今天又能够沉渣泛起？为什么如此顽固不化？这种现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需要我们进行一番深思。

(1) 从“大刀”与“机枪”的故事说起

20世纪90年代初期，香港流传着一段人人皆知的关于“大刀”与“机枪”的故事。

1990年，香港中国银行大楼落成，这座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大楼高315米，共70层。在人们为这座优美高耸的建筑发出由衷赞叹的时候，有的人却在犯嘀咕了，这楼怎么看都像是一把大刀，“既是大刀，必有所砍”，所砍者谁？与其遥遥相望的汇丰银行大楼自己把脖子伸出来了，这不是要砍汇丰银行吗？汇丰银行大楼曾被当作香港象征的最高建筑，中国银行大楼的落成，使其倏居下位，这如何是好？还好，香港真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当然大有高手在，为避免被砍，汇丰银行请来了风水高手，为其想了一个破解妙着，

于是香港又有了一个新的景观，汇丰银行大楼楼顶架起了一挺“机枪”。一时间，“大刀”与“机枪”的故事便传开了。

如果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迷信在香港从未真正受到过批判和清除，迷信的存在人们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而在国内地，受到过沉重打击的迷信又重新泛滥，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迷信之风日渐回潮，各种迷信活动频频发生，一些地方已经达到了非常猖獗的地步，令人触目惊心。这些迷信活动既包括各种术数迷信，主要是算命、卜卦、测字、相面、看风水、跳大神等，也有各种祭祀神灵的活动。

下面是从《光明日报》及其他报纸上摘录下来的几则关于迷信活动的报道：

——1988年6月28日报道：浙江省林海市上盘镇农民、石匠徐成法自学考古科学后，1986年在村后山上采石的时候发现了世界罕见的翼龙化石，受到了省自然博物馆和林海市政府的奖励。但是村里的一些老人嘀咕：挖了龙骨，断了龙脉，坏了风水，要祸及九族的事也凑巧，1987年正月，本村一位村民上山砍树，突然暴病而死，于是村民便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议论纷纷，结果把徐成法气疯了。

——1991年1月18日报道：山东省莱阳市农村盛行风水，农民盖房，先要请风水先生勘察风水，选择吉地。同村农民常常为争一块“风水宝地”而争斗，不但影响村民团结，有的还闹出人命。政府对6名有劣迹的风水先生严肃处理，追究刑事责任，使全市128名以看风水为职业者全部收起“风水罗盘”，重新做人。

——1999年10月15日报道：1999年在广西大化县卫生局，三位局长上演了一出请“道公”“驱鬼”的闹剧。3月14日，大化县卫生局搬迁到新建成的大化医学培训中心办公楼，迁入当天零时，该局主持全面工作的第一副局长派人请来“道公”梁某“念经驱邪”做“法事”，并在大楼内摆放香火、猪头、鸡肉等祭品，请人鸣枪、燃放鞭炮。他还同另两位副局长一起烧香敬酒，跟着“道公”到大楼的每间房内边念经边敲铃，以示“驱鬼避邪”。他们还在大楼门口、楼梯口、领导办公室、财务室和党员活动室贴上“神符”，在局长办公室安置“神位”。这一迷信闹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闹得新建大楼内一片乌烟瘴气，四周不得安宁。而此次迷信活动的全部经费最后也都公款报销。

——另据《经济日报》1990年2月15日报道：广东省揭阳县税务局于1987年1月搬进了新的办公大楼，风水先生苏某对局长杨某说：“税务局这几幢房子和大门这样安排不合理，要出事，你本人也要出事。”苏某讲的不吉利的“预言”在杨局长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投下了阴影，事有凑巧，税务局近几年内又发生了几件偶然的意外事情，于是杨局长终于坐不住了，便请来了风水先生重新勘察风水，选择黄道吉日，把新建的税务局大门、车库、传达室和喷水池等全部拆掉了，重新另建。

——又据武汉《长江日报》1992年2月10日和3月9日连续报道：武汉市一家名为“三泰”的周易应用研究所将算命当作一种“科技产业”来经营，不仅领到了营业执照，而且还在武昌、汉阳开设了4家连锁店，“顾客盈门，生意兴

隆”,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据《足球》报 2000 年 3 月 16 日一篇题为“风水先生进甲 A”的文章说,在世界足坛,乞讨佩带护身符以及一些看起来可笑的做法已经相当普遍。中国的足球界在这些方面一点都不落后,赛前烧香拜佛、随身携带佛像、固定着装等已经司空见惯。以后发展到避讳女性,有些教练赛前甚至为了避免同女人通话而不得不将自己的手机关掉。不过,中国足球界还有一项密技,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医学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学说已经被应用在诸如训练基地建设和改造等诸多方面。文章说,某俱乐部为了实现当地政府提出的夺冠目标,请了一位“能人”前往参观,希望他能将训练基地内一些影响球队的东西重新打理一遍。这位“能人”当场指出正门的朝向有问题,需要另改门庭,于是俱乐部便紧急施工,重新改门。实际上,有许多俱乐部在训练基地的选址和对基地的改造中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一些风水因素。

当然,各种迷信活动并不仅限于此,上面只是从报纸上采摘的几个例子。窥一斑可以见全豹,迷信活动的泛滥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地方盛行“富不富,看坟墓”,花费大量钱财修坟建墓,在公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建得富丽堂皇的坟墓,不仅死人争去活人大量土地,而且给活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许多地方宾馆开门要看风水,商店开张要选吉日。原来一些以算命、卜卦、测字、相面、看风水、跳大神等为职业的迷信者,也不再躲躲闪闪、地下活动,而是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了,层次低一点的

活跃于城乡的街头巷尾，或摆地摊营业，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算命连锁店和看相一条街；层次高一点的所谓“大师”成了某些领导干部和企业家的座上客，颇为风光。如果你想找人算一卦，容易得很，只要打一个电话或打一个传呼即可，大街上到处贴有所谓“周易应用研究”的寻呼号码和电话号码。

迷信还被应用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有的企业生产效率不好，不是从自身找原因，却听从风水先生的话把大门改了又改，改门以后也没见企业的生产上个台阶，反而造成了企业财物的新的浪费。更有企业以开发所谓“旅游资源”为名，修建阴森恐怖、迷信色彩很浓的种种宫殿，如湖南某公司花巨资兴建了大型宣扬封建迷信的“天下鬼都”，鬼门关、阎王殿、十八层地狱样样俱全，真真一个“阴曹地府”。

更令人悲愤的是，农村有的地方没钱建校舍，却有钱修建庙宇和祠堂。教室课桌门窗破烂不堪，墙体屋顶透风漏雨，学生上课条件异常艰苦；而庙宇祠堂却宽大明亮，鬼神供品不断，有吃有喝，一个或几个鬼神占据着一栋大房子。出现了最好的建筑是庙宇祠堂，最差的建筑是校舍的怪现象。

不仅如此，迷信活动还渗透到了思想文化宣传阵地。各种迷信出版物泛滥，算命、相面、看风水、卜卦等书籍充斥市场，一些日历、挂历上印上了何日是黄道吉日，何日不能动土、不能出门等内容，并堂而皇之地摆上了各大书店、图书馆的书架。

这些迷信活动的回潮，在某些地方已成汹涌之势，以至

于人们都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如果任由迷信泛滥，必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现在应该到了再次大规模破除迷信活动的时候了。

(2) 现代愚昧

迷信往往是同愚昧紧密相连的。在现代社会中，在很多情况下，迷信就是愚昧的同义语，特别容易欺骗那些文化素质不高的人，其危害极大。如果说巫术在人类的蒙昧时期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在文明时期的巫术则是一种愚昧。如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民间反抗组织等常常把巫术作为法宝，认为作法、念咒、焚符、喝符水后，就能勇猛无比，刀枪不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起义前，大多都要举行各种巫术活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近代的义和团同洋人的斗争。在进攻洋人之前，他们常常要设坛作法，以为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虽然其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可嘉，但是在西方文明面前，他们的迷信却又显得非常可悲。

还有通过求巫医术治病者，堪称愚昧之极。巫医术是“巫术”和“医术”的合称，即用符咒、驱神、祈祷等迷信方法，结合药物、手术等为人治病。这本是一种原始的治病方法，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逐渐分开，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秦汉以后，贵医而贱巫，巫逐渐势弱，与医两分家。

然而，巫医并未绝迹，遇到合适气候还会重新出现。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这种非常愚昧的迷信。在我国，虽然现代医疗技术日新月异，各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已明显改善，医学的权威性已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一些医



风水先生进甲 A

疗条件较差、医学常识不普及的地区，仍有一些信巫不信医的愚昧认识，有的人刚吃了几次药便嫌药效不灵，就转请巫医，更有甚者，不请医生请巫医，把疾病看成是鬼怪附体，致使一幕幕把病人迫害致死的惨剧发生。典型的是，在内蒙古赤峰市曾发生过 3 个儿女因为迷信而把父亲活埋的事情。

1984 年 10 月，李姓老汉得了肺炎，经过医生的治疗，在昏迷了一天一夜后，恢复了健康。一个叫孙传芳的“神汉”看过以后却非说老人已死，现在活过来是黑蛇附体，如若不死便会吃人，于是孙传芳便组织了一群人先用浓烟将老人熏昏过去，装入棺材。在送葬的过程中老人苏醒过来，不断求救、哭骂，却还是被 3 个亲生儿女扔入坟墓活埋了。另据《光明日报》2000 年 4 月 4 日报道，河南省禹州市刘村 36 岁的甄素娟 3 月 6 日上山求“大仙”治病，11 日即被“大仙”治死。据“大仙”交待，他给人看病主要是采用空中拔、抓，并通过烧香让神灵赐药治病。

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们，愚昧之极，为了驱走附在精神病人身上的“魔鬼”，竟对病人长时间地殴打，或对病人进行烟熏、火烤、开水烫、热气蒸等，使病人饱受折磨，悲惨死去。在愚昧迷信的指使下，不知多少人成为屈死的冤魂。

(3) 迷信还是科学？

时下流行一句话，“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许多事情现在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了，最搞不懂的就是迷信竟与科学挂上了钩。不仅迷信在利用现代科学，而且迷信在一些人看来简直就是科学了。

不少人可能都看过这样一幅漫画：一算命先生正拿着

一台电脑给过路行人算命，并鼓吹电脑算命快速又准确，美其名曰“科学算命”。科学与算命竟能够联系在一起！看了这幅漫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们不知是要感叹算命先生对科学的崇尚，还是要感叹现代科学的悲哀。

我们还听到了为迷信“平反”、为迷信“恢复名誉”的呼声，要恢复迷信作为科学的本来面目。原本我们视为迷信的东西，一些人花大气力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果倒真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所谓迷信的东西里有大量科学的内容，这些“迷信”不是迷信，反而是—门学问，应该为一些所谓的“迷信”平反。比如有的人提出，“风水术”不是迷信，它同营造学、园林学一道，构成中国古代建筑学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它内含着建筑地理学、建筑地质学、建筑气象学、建筑环境学、建筑伦理学、建筑哲学、建筑美学等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门科学，一门渊博的学问。现在到了给风水术正名、“恢复名誉”的时候了。此外，还有人认为，相命、生辰八字、占星等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应该承认这门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甚至将其冠以“预测学”、“民俗学”、“神秘文化”的美名。

难道我们解放以来移风易俗、批判封建迷信活动搞错了？又是一起冤假错案？这世界变化再快，就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把白的变成黑的吗？我们承认古代有关“风水”（以及其他一些迷信如星占等）的思想在开始的时候有一定的道理，包含有一定的经验知识，但是，“风水”等成为一种术数后，本质上已经不再单纯是经验知识的问题，而是演化为一种同某种神秘力量相联系的相宅、相墓之术。打个比

方,原子弹本质上已经不再是热核聚变的高能物理问题,而是一种同战争相联系的杀人武器,我们不能因为它包含有关于热核聚变的高能物理理论,就否认它的杀人性质,从而把它作为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对于这样一种杀人的武器,我们能为原子弹平反吗?能为原子弹“恢复名誉”吗?试问,为“风水术”平反,是在为什么平反?是为某种神秘力量平反吗?为“风水术”“恢复名誉”,是在为什么“恢复名誉”?是为某种神秘力量“恢复名誉”吗?

还有一些现代迷信,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披上最新科学的外衣。什么场、信息、高能量,什么原子、粒子、正负物质,几乎所有能够利用的最新的术语、概念,全都被当代的迷信派上了用场。近些年来某些人所极力推崇的所谓的“气功”,就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现代迷信。

气功本是通过运用自我暗示、达到强身健体的一种自我心理锻炼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有的人却把它吹成了神功,几乎无所不能。如一位著名的气功师说,气功能够呼风唤雨,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是他成功地实施了一场气功降雨,帮助扑灭了大火,否则,大火不知要燃烧多久,损失就更大了。果真如此,扑灭那场大兴安岭火灾,真应该给气功师们记上一笔功劳了。

有人问,如果火灾一开始,就请气功师搞气功降雨,多搞几次、十几次,把森林大火都浇灭了,不就更好了?气功师回答说:我的功力是有限的,这么大面积的火灾,靠我一个人发功,怎么行呢?有些人问:若真能呼风唤雨,为什么不让气功师掌握气候呢?这样可以防洪抗旱嘛。气功师回答说:

那样大规模地干预气候，是很困难的，需要的功能太大了，不是气功师能做到的，而且，气功师不能搞气功降雨，要讲究顺乎天意，违背天意，会遭天谴的。一语道破天机，这哪是什么科学，不正是迷信者的自白吗？

迷信对科学的这种利用，就像虫子钻进了大枣，它吃空了大枣，却保留着大枣鲜艳的外表，甚至这些被虫蛀过的大枣比别的更加鲜艳。但是，它骗得了人一时，骗不了人一世，迷信就是迷信，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科学，把科学与迷信联系在一起，是对科学的践踏。科学不但不能成为迷信的工具，反而应该成为批判迷信的武器，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武器武装人们的头脑，把迷信从人们的思想中清除出去。

(4) 迷信回潮的契机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迷信活动能够沉渣泛起，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既有主观的原因，又有客观的原因。

从客观上说，首先，迷信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情感需求。趋吉避凶是人们共同的心理定势，迷信正是在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定势。既然迷信说此凶彼吉，就有些人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相信了。其次，科技文化事业的落后，造成一些人思想的愚昧无知，不懂科学、不信科学，使迷信活动有机可乘。第三，我们现在一提起迷信，往往把它同“封建”联系在一起，称作封建迷信，主要是因为迷信活动活跃于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虽然对迷信活动进行了多次批判和打击，但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流传下来的迷信，不可能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从人们的思想中根除，迷信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



伪气功

还会重新泛起，破除迷信活动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从主观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却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思想建设，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共产党员，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阵地”意识逐渐淡化了，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在思想教育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有少数党员甚至党员领导干部，信念动摇，自己热衷于搞迷信活动，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助长了迷信思想的回潮。

此外，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远远不能适应人们日益增强的精神需求，放松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宣传和教育。中国科普研究所在 1996~1997 年作了一次大范围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在此前的 6 年中，对科学技术的有关知识和基本科学观点的理解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科学素养普遍停滞不前。科学思想不去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各种非科学的思想就会去占领，而我们对各种迷信活动的苗头又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打击，必然会导致迷信的重新泛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时候，忽视了对人们精神的关心，过去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变得有些冷漠，特别是那些脆弱的、容易受社会伤害的个人和群体，尤其是老年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退休、下岗人员等等，他们最需要社会对他们关心、信任、温暖和支持，如果他们感觉不到这些，就很容易走上迷信的道路。

3. 睁开智慧的眼睛

人们虽然并不完全是由于愚昧而迷信，迷信却足可以将人导向愚昧。然而，迷信可以一时蒙蔽一些人的眼睛，却终究遮挡不住人类理性智慧的光芒。睁开智慧的双眼，让人类智慧的光芒，照亮人们的心灵，识破迷信的本质，迷信也就彻底没有了藏身之地。

(1)“先生”问路

在 2000 年 3 月北京举行的“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图片展览会上，一幅图画让人看后忍俊不禁，图画上一个“先生”手持幌子向行人问路，“劳驾，往东怎么走？”“先生”自己都不知东南西北，如何给人指点迷津？！

还有一则笑话，说的是一个过路人看见路边有一个算命先生，过路人便靠前让其算了一卦，算完以后过路人拔腿就走，算命先生一把拉住索要算命钱，过路人大声反问：“难道你没算出我没带钱吗？”

看来有时一些迷信活动很难使人相信，如何能使人相信，从而不断了“先生”们的财路呢？答案不用猜你也明白，一个字：骗。骗术是各种术数迷信中经常运用的手段。在长期的发展中，为了能使人们相信，“巫师”“先生”们练就了种种手段，骗取人们的信任，最终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欺骗性成为迷信活动的一个重要特性。

迷信的骗术可谓五花八门，不同的迷信方式有不同的骗术，各种迷信活动特别是占卜，主要是对未来的预测，“巫师”“先生”们往往是煞有介事、信口雌黄。在民间流传着关

于“风水术”的几句顺口溜：“风水先生最荒唐，一只罗盘定阴阳；你要真识活龙穴，何不先葬你亲娘。”可谓一语破的，倒出了风水先生的骗人伎俩。“风水先生”若真是有点识龙穴的功夫，何苦没有一个吉宅在家里静享清闲，却要出来给别人点识龙穴、受苦受累呢？如果占卜已发生的事，“巫师”、“先生”们就小心多了，把信口雌黄变成了模糊预言。有一段相声形象地揭露了迷信的这种骗人伎俩。有一个人请算命先生给算一算他有弟兄几个，算命先生并不明说，而来说了一句“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这一句话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你有几个弟兄他可以给你解释出几个弟兄。此外，“巫师”、“先生”们经常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套出被占卜人的一些情况，然后用到他的占卜中。还有的干脆用“托”的手段进行欺骗，让被占卜者把自己的情况写在纸上，“托”在一边看着，通过抓耳挠腮等手势将内容告诉“先生”；“先生”的功夫岂有不准之理。

总括起来说，迷信用来迷惑人的惯用伎俩，不外乎有以下三点：

①隐密性——神秘化的途径。任何迷信本质上都是虚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魔术，所以它的“谜底”绝不能暴露，否则就无法骗人。所以，古今中外的迷信邪说都会竭力为自己制造一道神秘的光环，将自己隐藏在其中，制造一种“不透明”、“不露真相”的所谓“神秘境界”，使人容易产生畏惧感，从而受到青睐。

②快捷性——吸引人的绝招。迷信要蒙蔽人，除要人产生畏惧感外，还要给人以“好处”。能够“快捷”地解决一切问

题，就是其拿手好戏。它以能让人“唾手可得”、“立等可取”诱人，俗语“神速”可能即由此而来。

③宁信其有——迷惑人的逻辑。迷信还有一个颇能迷惑人的逻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墨子曾说过这样的话：“若使鬼神诚有，是得其父母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诚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意思是说，如果真有鬼神的话，那么你供奉鬼神，祖先亲属都可得到好处，可谓厚利。如果没有鬼神的话，那么你也不过浪费些供品钱财，损失并不大。迷信灌输给人们一套奇怪的逻辑：即使不能确信鬼神的存在，还是宁可信其有为好。实际上，这是利用一些人的贪心来欺骗他们上当。

迷信的欺骗性更主要的还是信迷信的人们在自己骗自己。一些“信迷信”的人其实并不是太相信迷信，但是趋吉避凶以及其他一些心理因素却使他们要去相信，不相信的话心里往往疙疙瘩瘩，于是逼着自己去相信，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有人认为，当前社会信迷信人群比较集中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人，由于他们的“愚”，比较容易上当受骗，这些基本属于被骗的人；一种是工作中风险、竞争压力比较大的人，这些人有的学历并不低，他们害怕失败，便希冀通过迷信活动从鬼神那里寻找安全感或祈求成功，这部分人大多是自己骗自己。

(2) 迷信的危害性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迷信同社会的进步背道而驰，它毒害社会的风气，腐蚀人们的心灵，甚至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

财产安全,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打击。

迷信危害着社会的风气,使社会风气笼罩在乌烟瘴气的迷信氛围中,如出门看皇历,开业择吉日,盖房选风水。有的地方荒唐之极,“富不富,看坟墓”;有的地方企业效益不好不是从内部找原因却怪大门朝向不对,忙着改大门;有的地方,整天烧香拜佛,烟雾缭绕。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报道过河南的一个贫穷村庄,不去想实际办法脱贫致富,全村人却大肆烧香拜佛,全村到处供有神位,在这样的风气下,怎么能够走上富裕之路?

最严重的是,一些党的干部大搞迷信活动,为迷信的猖獗推波助澜,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上面我们提到的大化县卫生局、揭阳县税务局大搞迷信活动,看似是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的事,实际上它关系着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的这种做法,在群众中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群众的意见很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曾提出:“禁止党政干部参神拜庙、求卦占卜、大办丧事,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些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党的规定,对他们做出严肃的处理是非常必要的,群众也会拍手称快。

还有的人利用迷信活动,诈骗钱财,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带来严重损失。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巫婆”“神汉”之类的人物,他们整天不务正业,通过给人算命、占卜、跳大神、巫医治病等手段,骗人钱财,有的人甚至靠迷信活动骗取的钱盖起了洋楼别墅。

迷信活动更为严重的危害性还在于，它使一些笃信迷信的人掉入其中不能自拔，从而残害性命，害己害人。据《齐鲁晚报》1999年12月17日报道，山东陵县一男子沉溺于封建迷信不能自拔，为求“仕途得志”，竟赶走妻子儿女，并将邻居活活打死，结果自己未进天堂先进牢房。1990年，这名齐姓男子竞选村支书落选，被村里安排当了小学民办教师，随后民办教师减员，他又被招到乡党委“帮忙”，几年后又因乡机关清退临时工而回到本村务农。他于是认为自己一直走“背运”，怀疑有人在“克”他，便找了一个瞎子给自己算了一命。瞎子告诉他，由于他妻子和一对儿女的命与他相克，妨碍了他“仕途”上的“飞黄腾达”。从此，他便整个地变了，经常借故殴打妻子儿女，妻子被逼无奈与他离了婚。为了尽快“飞黄腾达”，他又听信了风水先生的话，认为前面邻居家的房屋压了他的“阳气”，为求“破解”，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于1999年9月28日晚上窜入邻居家，将邻居一棍打昏后，拖入河中淹死。像这样陷入迷信不能自拔的例子还有很多，它能够使人完全丧失理智，害了自己又害别人。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迷信活动的消极危害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民心和社会秩序，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破坏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社会安定，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迷信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3)对待迷信的态度

由于迷信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性，反对迷信、清除迷信就成为我们对待它的惟一正确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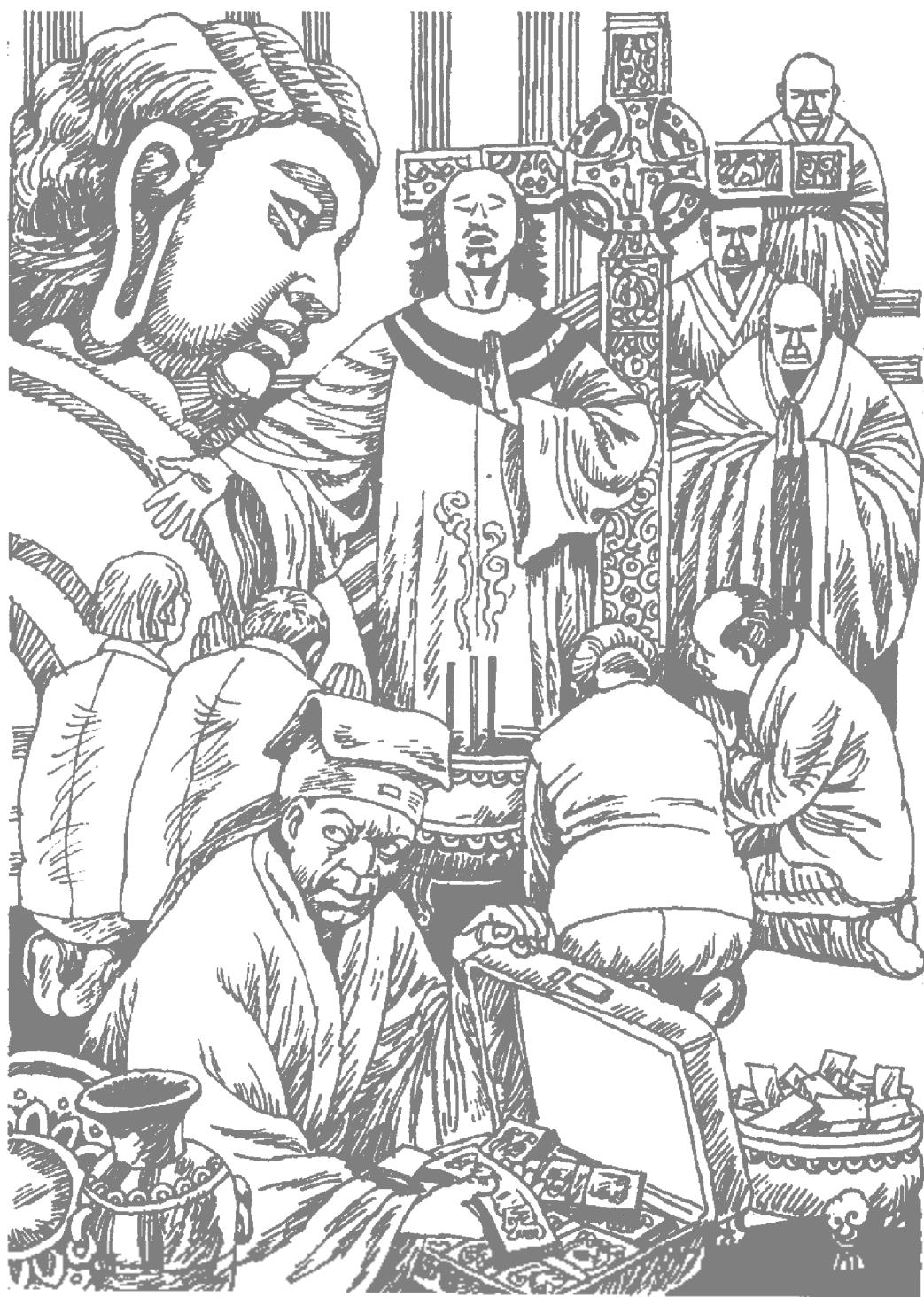
反对、打击迷信活动，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于有一般迷信思想的人，如相信鬼神、烧香磕头、相信风水、择吉日等迷信活动，主要涉及的是思想认识的问题，只能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逐步禁止，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对于有比较严重的迷信行为者，如驱鬼治病、装神弄鬼、修庙塑神，甚至制造谣言、无事生非等迷信活动，不仅要进行思想教育，还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而对于以迷信活动为职业的人，要进行严厉的批评，并坚决取缔他们的一切迷信活动，让其悔过自新，自食其力。那些打着算命、占卜、看风水等迷信的幌子，给人民群众的财产生命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的，必须毫不犹豫地给以坚决打击，并绳之以法，决不姑息。

反对、清除迷信活动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各种迷信观念，需要人们有一个长期的转变认识过程，不是下一道命令就能制止的。对当前来说，反对、清除迷信活动主要应该做好以下一些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广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迷信往往是同愚昧、无知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迷信的天敌，大力宣扬科学技术知识，交给人们科学的武器，人们就会识破迷信，不轻易相信迷信，并自觉同各种迷信活动进行斗争。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精神启蒙并没有过时，普及科学精神、与新老迷信作斗争，只能通过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与科学修养来达到。

第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精神充实。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精神生活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们希望在工作之余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来松弛紧张的神经。为人们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有了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迷信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没有了栖身之所,也就无人相信。

第三,加强监督检查,对于各种以迷信的名义从事诈骗钱财、招摇撞骗、甚至害人性命的迷信职业者,要坚决进行打击,严加惩处,绝不能心慈手软,使迷信活动在社会上形不成气候,最终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



在神灵的名义下

四 在神灵的名义下

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一则“龙生九子”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传说龙生了 9 个儿子,但是却没有一个成为龙的。它们长着不同的面貌,有的像龟,有的像兽,有的像龙,有的像虎,有的像狮子,有的像螺蚌;各有各的爱好,负有不同的职责。当我们理性地审视宗教、邪教、迷信的关系时,龙生九子的故事颇能给我们以启迪。

邪教之所以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活动;迷信之所以容易同宗教相混淆,以至于人们常常把宗教迷信连在一起使用,这说明三者之间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有相似之处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来自于人类最初的原始信仰,是人类最初的原始信仰在长期的发展与分化中所形成的不同的信仰形式。然而,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分化,宗教、邪教、迷信各自从不同角度发展演化了原始的信仰形态,吸收了原始信仰中不同的成分,并在以后的演化中加入了不同的思想内容,而且其信仰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的已截然不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从我们前面的具体阐述中,已经可以清楚地发现宗教、

邪教、迷信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它们都打着信仰神灵的旗号，神灵是它们的最高信仰。但是，在神灵的名义下，它们却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宗教为来世的幸福而祈祷，迷信为趋吉避凶而求神，邪教则做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 神灵：共同的信仰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种信仰形式，宗教、邪教、迷信所信仰的对象都是神灵。在宗教中，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佛祖等，都是神；在迷信中，信仰的各种鬼神范围更是繁杂，具有浓厚的泛神色彩；邪教则信仰其教主，教主就是神，是把教主作为人神而信仰的。神灵，是它们的共同信仰；坚持有神论，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在人类信仰的历史上，有神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宗教、邪教、迷信的神灵观念都是在人类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发展分化而形成的。对有神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也就形成了宗教、邪教、迷信的区别。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有神论的历史发展形态，这对于我们认识宗教、邪教、迷信的有神论特征会有很大帮助。

有神论的最古老、最落后的信仰形态，是把动物崇拜为神。“看一看神圣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在所谓原始部落那里可以看到——这很有意思。神圣的东西最初是我们从动物界取来的”，^①原始人相信动物像人一样具有灵魂，对动物的崇拜，除了畏惧的原因外，也有祈求动物以便获得狩猎丰收的原因。例如，许多原始部落狩猎之前，都要举行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21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定的崇拜仪式，以祈求捕获对象保障狩猎成功。

我国先秦古书《山海经》记载了许多原始时代以兽为神或认兽为神的信仰。书中把所有神灵，不论是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或各地的神灵，都描写成动物或与动物有关。《南山经》中的神灵全与鸟、龙有关系，《西山经》中的神灵均与马、牛、羊、虎、豹有关系，《北山经》中的神灵均与蛇、马、猪有关系，《东山经》、《中山经》中的神灵也与动物相关。

这种以兽为神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的世界现象。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祇，多是动物的形象。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崇拜的遗迹，除了法国拉塞尔山洞的 2 万年前的持牛角的妇女浮雕之外，在法国其他地方和西班牙、奥地利等地还发现了旧石器时期与动物崇拜有关的洞画和动物塑像的遗迹；法国蒙特斯潘洞有熊等野兽塑像，杜克·多都贝尔洞有两个泥土做的野牛塑像，这两处塑像的周围都有猎人举行某种跳舞仪式所留下的脚印。古埃及人特别敬重牛，其他如鳄鱼、羊、狮子、蛇、鹰、猫等，也是他们崇拜的主要对象。而印度等地则崇拜牛。我国古代有过祭马事的仪式。这都是以兽为神的明证。

这种信仰产生的认识原因，是某些部落错误地认为某些动物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影响其生存发展，因而向它们奉献食品，祈求它们给自己降福消灾，这就是后世献祭和祈祷的开始。而最隆重、最高的献祭，就是奉献自己的同类甚至子女。今天的宗教和迷信的一些仪式，就来自于古代的献祭和祈祷活动。奉献自己的同类甚至子女这种在今天看来很残忍的祭献仪式，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在一些邪

教中还保存着。在非洲的一些邪教中，我们仍然还会看到这种最古老、最低级的信仰，而一些邪教发生的集体自杀行为，实质上也是这样一种祭献仪式。这说明，邪教是一种非常愚昧、野蛮、低级的信仰。

继崇拜动物神之后兴起的，是把现实的人崇拜为神，或者称为人神，以及祖先神崇拜。充当人神的，一般是国王或祭司，有时也有普通人。著名宗教学家弗吉泽的《金枝》披露了大量的人神资料。比如，古埃及历代国王，在世之日即被尊敬为神，并为他们设置专职祭司。在中国，《山海经》中的帝，就是当时的人神。依该书所说，日月都是帝喾的儿子，海神则是黄帝的儿子，而颛顼的子孙，则被任命司管日月的运行。直到封建时代，皇帝和大臣还被认为有能力影响日月的运行和天气的状况，所以每逢日食、月食或者地震山崩、旱涝灾害，皇帝要做自我批评，下罪己诏，有关大臣则被撤职甚至处死，这种情况，就是原始时代人神信仰的遗存。

祖先神也是很重要的神灵观念。祖先的亡灵，一般地被认为足会保护子孙后代的，因此常被当做神灵进行比较隆重的祭祀。中国最注重对祖先神的祭祀崇拜。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其“颂”诗及部分“雅”诗就形象地表现了商周时期对祖先神的祭祀崇拜。在殷周人的观念中，他们的祖先生时奉上天之命治国理民，死后则成为神伴侍天帝左右，继续监理下民，福佑子孙。在汉族习俗中，亲属死亡 49 天之内要进行不断供奉，以后每年忌日还要进行祭祀。祖先崇拜也曾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中。非洲诸民族笃信，祖先亡灵通常给予本家、本族以护佑，然而，祖先亡

灵又十分苛刻、挑剔，要人们依礼制祭祀，只有心满意足后方才赐福后人，否则将降罪惩罚。因此，各民族对祖先亡灵的供奉都非常虔诚。

迷信至今依然非常重视对祖先的崇拜，迷信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祭祀鬼神、祖先，并为逝去的亲人找一个好的安葬之地。其目的虽有思念祖先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为了让祖先荫后，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祖先神的祭祀崇拜的遗迹。

人神崇拜在邪教中有很深的体现，仍然是现代邪教的崇拜形式。邪教崇拜教主，是把教主当成人神来崇拜的。把教主当成人神，是由于教主自封为神，吹嘘自己具有超凡入圣的大神通。例如“法轮功”李洪志吹嘘自己“出世千年不遇，万年不遇”，具有各种各样的特异功能，法身无数，是惟一能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中的救世主。把自己吹嘘成一个活脱脱的人神。只是邪教的这种人神崇拜，依然没有脱离低级的有神论的窠臼。

长期的社会实践使人们发现，现实的人和动物一样，都没有超自然的能力，于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也不再以现实的人为神，而精灵神就逐渐成为神的基本形态。所谓精灵神，就是把神看作一种精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将其日益人格化、抽象化，逐渐形成人格神，精灵神的产生，使自然力量本身不再直接成为崇拜的对象，而成为自然现象、自然力量背后的最终支配力量。精灵神是接着人神而来，这时的神至少是主神，也自然被想像为是和人同形的存在。这样的神灵观念影响深远，直到现在，它还是影响最为广泛的神灵观。

念，现代的各种宗教，都是这种神灵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依照新的神祇观念，神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它无形无象，却至善至美，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现在几个世界性的人为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奉的至上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在基督教的教堂里，可以有基督耶稣的像，有圣母玛利亚像，但没有上帝像，因为上帝是无形无象的。在清真寺里，则什么形象也没有，伊斯兰教反对一切偶像崇拜。佛教寺院里有许多佛像，但佛教理论认为，那不过是佛的化身或者应身，而佛的法身，一般认为是无形无象的。因此，相比较而言，宗教是一种最高形态的有神论。

有神论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对以前的神祇观念否定的历史。人神的诞生，同时也是对动物神的否定；精灵神的诞生，则是对人神的否定；而无形无象的神祇的存在，则是对精灵神的否定。否定，就是认为它们不存在。宗教、邪教、迷信都能在这个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痕迹。有神论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当有人重新捡起旧的有神论信仰的时候，他就不是仅仅遭到无神论者的反对，而且也要受到当时的有神论者的反对。迷信、特别是邪教，是低级形态的有神论，它不仅与无神论思想相冲突，而且也与新的有神论形态——宗教相冲突，理所当然要受到人们的坚决反对。

不过，新的有神论思想观念的形成，并不意味着那些遭到社会主流意识排斥的旧的信仰形态立即消失，旧的、低级的神灵观念，就像古老的植物和动物的遗存一样，往往存在于下层信众之中。在社会气候适当的时候，它就可能重新兴

盛。社会矛盾尖锐时,它往往成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思想武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低级有神论的兴起,特别是其中巫术行为的兴盛,往往是危害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给社会造成重大的破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巫术中那些方技的成分被迷信和邪教所继承和利用。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有远见的王朝都把反对巫术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至少从汉代起,宫廷里反对巫蛊、也就是反对用巫术咒人,就是严重的政治斗争。汉代开始独尊儒术,儒经上说:“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占筮以疑众,杀。”(《礼记·王制》)从那以后,历代王朝颁布的法律几乎都有反对巫术的内容。

巫术如果只是个人行为,则主要表现为一种迷信行为,其危害也很有限,如果巫者自称为神,并且还要自任教主,结成团体,就成了一种邪教,那就危害惨烈。

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宗教、邪教、迷信虽然都是有神论,但它们表现了有神论的不同形态和层面。宗教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有神论,是有神论目前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水平;迷信杂糅了多种形态的有神论观念,有高级形态的有神论观念,也有低级形态的有神论观念;邪教则主要是一种低级形态的有神论,还停留在人神崇拜的阶段。

从巫术的角度来看,宗教的有神论观念是对于巫术的理论层面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迷信、邪教的有神论观念,则采用了巫术中许多方技的因素,因而突出了其有神论观念的实用性、功利性和欺骗性。特别是对于邪教来说,它以低级有神论作为信仰的核心,以巫术性质的行为作为活动的

基本内容，其欺骗性更大，危害也更大，先是影响信众周围的社会环境，进而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对神灵的信仰，是宗教、邪教、迷信的共同特征，通过上面对有神论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宗教、邪教、迷信的有神论有一个更具体、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更好地从本质上认识和了解宗教、邪教、迷信的区别。

2. 神灵的不同功用(一)宗教与邪教

宗教、邪教、迷信都坚持有神论思想，这是它们相同的特征，但是它们的有神论思想的内涵却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由于宗教、邪教、迷信不同的社会作用，认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比认识它们之间的相同性显得更有必要，也更有意义。

依照宗教的观点，神创造了人，而人却由于自己的堕落背离了神，在神的感召下，可以通过崇拜神而重新回到神。宗教的含义比较丰富，宗教学之父缪勒认为：“在一般语言里，我们使用宗教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它指信仰的对象，其次指信仰的力量，第三指信仰的表现，即在崇拜行为中或在虔诚的行为中的表现。”^①有的人把这些要素概括为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邪教就会发现，邪教基本上也具备这些要素，邪教把教主说成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神灵，甚至是法力最大、最高

^① 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 6 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的神,这是邪教的神灵观念。邪教大都有自己的教义,声称度人去天国,鼓动、培植信仰者对教主的特殊的崇拜感情,并经常举办种种有特殊仪式的活动。邪教也有自己严密的组织,邪教组织内部有章程、有制度,分工明确,令行禁止,信徒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组织体系非常完备。凡此种种,说明邪教组织确实具有宗教的某些特征。

从学理上说,宗教是高级形态的有神论,邪教是低级形态的有神论,但是决不能就此把宗教与邪教划上等号。宗教与邪教有着天壤之别,它们绝不是一样的教,邪教之“教”不是宗教之“教”,邪教根本算不上是宗教。在人类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科学昌明的今天,不能把邪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相提并论。如果有人硬把邪教说成宗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对现存的人为宗教的亵渎。

人们常常把邪教理解为“邪恶的宗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外,许多邪教是从新兴宗教中产生的,邪教往往以新兴宗教的面目出现。何为新兴宗教?它同传统宗教、邪教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搞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邪教,以及它与宗教的根本差异。

“传统宗教”通常指那些在时间上产生很早,具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中国道教等,它们在时间上都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教义,并以其教义的博大、精致、深邃来吸引信众;其教义往往是开放的,允许自己的信徒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教义与其他思想进行比较,在自由的思维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宗

教信徒的人数众多,几个世界性宗教信徒都以几亿、十几亿计。此外,传统宗教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社会整合,大多已经调整好了自己与社会、与文明、与科学的关系。宗教虽然都强调美好的来世或者彼岸世界,但并不完全否定现实世界的正常生活,甚至还把现实世界的道德生活作为来世幸福的必要条件,要求信徒在现实世界中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它们事实上已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主导方向与社会发展潮流是统一的、相吻合的,它们的生存和健康发展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提升。

“新兴宗教”是相对于传统宗教而言的,一般指那些较传统宗教晚出并具有某些新的形态和特点的宗教。何时兴起的宗教可视为“新兴宗教”通常人们把 19世纪、20世纪或“二战”后兴起的宗教视为新兴宗教。除历史较短而外,新兴宗教通常规模较小、派别纷杂、自成一体,但也有少数规模较大者,如日本创价学会、世界范围的巴哈伊教(自称巴哈伊信仰),分别有 1000 万和 500 多万信徒。

大量事实表明,新兴宗教离不开传统思想,它们大多是从传统宗教、传统教会中分化而来的,如日本创价学会是从日本佛教的日莲宗分化而来的,巴哈伊教自伊斯兰教巴布教派(伊朗)分化而出。它们作为独立的宗教信仰、派别组织和社会群体兴起后,一般都对原有的、母体的传统宗教采取某种批判、疏离或融合的态度。尽管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有某种渊源关系或表面上的联系,但许多新兴宗教一旦初具规模,甚至在其“创教”之初,就自我标榜为更高级的、独立

的宗教体系。由此而引起的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之纷争也时有发生,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邪教与许多新兴宗教派别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如产生时间较晚,借用和修改传统宗教的某些词语概念、教义思想(如末世论),以某些新奇的形式和内容招引信众,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目的性等。

较之传统宗教,邪教以下面几大特征更加引人注目:

①传统宗教尽管也以上帝、神灵等“终极存在”为信仰体系的核心,但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至上神明一般是远离他们的“存在”,人间的教主充其量不过是神灵的代言人,是先知。即便是被基督教神化了的耶稣也是如此;而邪教所崇拜的对象则是能施行各种“神迹”近在身边、至高无上的教主。教主往往吹嘘自己具有超凡入圣的大神通,甚至有驱神役鬼的法力,以狂妄的态度君临世界,让信徒对自己顶礼膜拜。

②邪教根本没有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而是从不同的理论学说中摘取片言只语,糅合成一个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大杂烩。为了掩饰和弥补这种致命的缺陷,邪教思想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宣称其他一切理论学说都是邪魔歪道,惟有自己的才是绝对真理。严禁信徒接近其他思想,使信徒达到非其邪教思想不信的痴迷状态。

③传统宗教一般也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或信仰者团体,但它们都是合法的、公开的宗教组织或团体;而邪教则是类似于帮会、黑社会性质的秘密组织系统,这是由它们反社会、反现实、反人性的邪恶目的所决定的。

④传统宗教有高尚、善良的精神追求，其存在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邪教组织所宣扬的歪理邪说则以反科学、反文明、反社会为本质特征和根本目的。邪教大多利用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或者不尽人意之处，对社会、对政府、对人类进行肆意的攻击，一旦遭到社会的抵制，则不惜以武装抵抗、集体自杀、屠戮无辜平民等方式来与社会、政府对抗。邪教对于科学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

所以，邪教的“邪恶”不仅从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角度来看是邪恶的，从正常、合法、有益的宗教角度来看也是邪恶的。邪教不是法律和纯正宗教意义上的宗教，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异。

3. 神灵的不同功用(二)宗教与迷信

有这样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两个商人来到一个神庙，其中一个商人出门做生意想走陆路，求神给以晴天，并许愿供奉神灵猪头；而另一个商人想走水路，求神以雨，并许愿供奉神灵羊头。神听后对周围的小鬼说：“晴天吃猪头，雨落吃羊头，有何不可！”神当然不会同时满足两个商人的许愿，但神在心里还是会暗笑：反正天不是晴就是雨，自己总会得到供奉。如果水行商人许愿两个羊头，神大概要向着他了。

这则故事虽是谐谑趣语，但它却活生生地道出了迷信的特征，同时也道出了迷信与宗教的区别。从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讲，既然宗教和迷信都是对神灵的崇拜，那么宗教也可以算是一种迷信；但是，却不能反过来讲，迷信也是一种宗教，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二者的区别可以概括为



商人求晴与祈雨

下面几点：

①宗教和迷信二者信仰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在神圣领域以内，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则是包括一套行为本身便是目的的行为，此外别无目的。”^①迷信的各种方技、术数等都是实用的技术，是为着某个时下的现实目的，要求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人们都是有事才求神灵，“急来抱佛脚”；宗教则是一种“终极眷注”，关注自我灵魂的净化，力求超凡脱俗，达到神圣的境界，追求来世的幸福生活，着眼于自我的提升、天国的幸福。它们信仰神灵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如我国早期道教产生之前盛行的巫鬼道、方仙道，虽然是道教产生的重要依据，却依然属于一种迷信的范畴，停留于实用的、功利的层面；只有当道家哲学将其改造为神学理论，将“道”贯彻到系统的教理及教义之中时，它们才成为人们的根本信仰，由迷信上升到宗教的层面，由实用的方技、术数变为灵魂的皈依。

②宗教与迷信都信仰神灵，但它们所信仰的神灵是有差别的。迷信所信仰的神灵广且杂，“见庙烧香，遇神磕头”，而且神灵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秩序，拜信什么样的神灵，完全根据崇拜者拜祭时的需要：受苦受难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大慈大悲、能普渡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天大旱了，就祭起掌水降雨的龙王爷来；每逢过年的时候，就在门上贴个威武的门神，驱邪镇魔；想儿孙满堂，就要给送子娘娘多磕

^①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 75 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几个头,多烧几炷香;要发财,家里不供上财神爷不行;遭了瘟疫疾病的折磨,一定要敬敬瘟神、痘神。还有什么要取功名利禄得拜文昌神,希望城市太平要求城隍神,要想蚕事丰收需拜马头娘等等。大概没有哪个行当、干哪件事不先拜拜鬼神的。而在宗教信仰中,不仅神灵有着严格的等级和秩序,而且不同宗教有不同的神灵信仰,信某一种宗教的神灵,就不能信另一种宗教的神灵,如基督教信仰上帝,伊斯兰教信仰真主,佛教信仰佛祖等,是不能混合信仰的。

③宗教具有较系统和完整的教义与固定的经典。宗教经典如佛教的佛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犹太教的《圣经》、印度教的《吠陀》等,它们一般均从崇拜对象的绝对权威出发,来说明宇宙、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们生前的命运和死后的的生活等。宗教教义所阐述的,不仅是其信仰的神灵,还包括其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与政治、社会思想;而一般的迷信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不仅没有自己的经典,甚至连比较系统的思想都没有,从来没有形成过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所回答的仅是某一人的某一具体事,如占卜、预测、求职、考学、婚姻、疾病、失物等。更有一些巫婆神汉、迷信职业者,借此骗取钱财,坑害群众,扰乱治安。

④宗教具有一定的组织与团体,如基督教的教会、教堂、爱国会、团契;佛教的寺庙、尼庵;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的宫、观等。宗教还具有明确的教规、严格的戒约和固定的仪式节日,例如基督教的十诫、洗礼、圣餐、圣诞节、复活节;伊斯兰教的割礼、五功、开斋节等。这些礼仪与节日,长

期与一定民族的风俗、传统、习惯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和培养了人们的宗教感情；宗教戒约则严格规定了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宗教职业者都有明确的身份，如基督教的主教、牧师，佛教的和尚，伊斯兰教的阿訇等。然而这些都为一般的迷信所没有，迷信不受严格的教义教规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经常靠走街串巷活动。而且他们人数很少，没有也不会形成一定的组织，基本保持个体的活动，靠装神弄鬼、蛊惑人心甚至欺骗的手段维持生计。

⑤宗教与迷信的社会作用也是截然不同的。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产物，自其产生之后，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并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在历史上，宗教曾保存和发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于创造、继承历史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宗教对于国际文化交流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而迷信在历史上没起过任何积极作用，反而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

在宗教、邪教、迷信三者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方面是迷信与邪教的关系。

在神灵信仰中，相对于宗教信仰而言，邪教与迷信都是不正当的、起着消极作用的信仰形式，这也是它们最大的共同点。

从本质上讲，邪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形式主要是信徒对教主个人的迷信，信徒们只能对教主绝对忠诚、绝对服从。邪教之所以邪恶，与对教主的这种无条件崇拜有

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迷信与邪教作为两种不同的信仰形式，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邪教有自己一定的教义、严密的组织体系，邪教是建立在对教主个人崇拜基础上的等；迷信往往是松散的个人行为，没有一定的团体组织和理论体系，它不是对现实的某个人神的崇拜。在某些情况下，迷信属于人们思想认识范围的问题，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可能就会从迷信中解脱出来。因此，不能把迷信等同于邪教。相比较而言，邪教显得更为邪恶，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

但是，迷信与邪教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这主要表现在迷信往往被邪教利用，充当邪教的帮凶。邪教教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借助迷信愚弄、欺骗群众，利用封建迷信建立起家长式的统治。

我们以“一贯道”为例看看邪教是如何利用迷信欺骗群众的。“一贯道”能为许多人相信，一方面，它宣扬的“人道免劫”、“神灵救赎”起了很大的引诱作用；另一方面，其“仙佛降笔”、“仙佛借窍”也欺骗了一大批人。所谓“仙佛降笔”，又称“扶乩”，是将木制的丁字架放于沙盘上，由两人各扶一端，依法请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画成文字，作为神的启示，或与人唱和，或示人吉凶，等等，借口仙佛附在乩手身上，借乩手写下所谓“仙佛训示”来训教信众。这其中有许多骗人的把戏，由于众人不知其中秘密，再加上道内神秘的宣扬以及请神降坛的神圣气氛，普通道徒便深信不疑。而“仙佛借窍”就是所谓的“神灵附体”，本来就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巫术迷信欺骗手段，后被民间的秘密教门组织所利

用。所谓“借窍”，就是指“仙佛”附在天才身上，借天才之身，临坛训示或解难。“一贯道”也常常用它来欺骗教徒。

一般的民众，一直存有很深的迷信心理，邪教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心理。可以说，邪教是对迷信活动的有组织的利用，邪教离不开迷信。反过来说，如果迷信活动成为一种有组织、有团体的活动，迷信就开始向邪教转化。因此，邪教与迷信是有密切联系的。

综上所述，宗教、邪教、迷信虽然都信仰神灵，但宗教与邪教、迷信有着质的区别，三者是决不能混淆的，尤其要坚决把宗教与邪教划清界限。

结束语 拨开迷雾见青天

当我们对宗教、邪教、迷信的发生缘起、来龙去脉及本质特征，有了清晰而明辨的条理，当我们对宗教、邪教、迷信的共性与个性有了正确的把握与判断，当我们对宗教、邪教、迷信各自的属性、目的和功用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和反省的时候，我们再次面对三者的关系，便不会再是满头雾水，一团迷茫，而是豁然开朗，拨开迷雾而见青天了。

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神灵们所占据的地盘越来越受到科学的围攻，逐步丧失其赖以存在的根据地，科学的进步程度，就是神灵的消退程度。当前，科学理性与宗教以及邪教、迷信之间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宗教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越来越具理性及人文的倾向，越来越贴近社会现实，注意关心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日渐呈现出人文化的发展趋势；而邪教与迷信则完全是反理性、反人文的，它们虽然在节节后退，但依然非常猖獗。这就需要我们区分宗教与邪教、迷信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宗教虽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海市蜃楼，却是适应人的

精神需要和追求而产生的,其所构筑的神灵世界,恰恰是现实世界的折射。这是一个信仰的世界。宗教是一个只有信仰的领域,对于神学家和宗教信徒们而言,超越自然、社会、无所不能的神灵王国是人和万物的缔造者和主宰,人类只能信仰它,必须信仰它。这种信仰具有一种非世俗、非功利的神圣性,目的在于净化灵魂、拯救灵魂。离开这种皈依、忠诚、神圣性质的信仰,就无所谓宗教。这是一个情感的世界。它渗透着人类的情感,代表着人类对精神家园的终极眷注,透过宗教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类自己的情感想像、情感需要、情感愿望。宗教体现了人类的精神需要,是人类试图支配自然愿望的曲折表现,蕴含着人类的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是希望与恐惧交织的情感,没有情感就没有宗教。

宗教在当今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一些宗教在教义中实施的深层革新已触及到宗教精神的根本,如巴哈伊教对上帝、天国、地狱、灵魂、复活等的理解是:上帝既不是拟人的实体高居于天堂的宝座操纵着世间事务,也不是泛神意义上的精魂包含在一切事物中,上帝是不可知之本质;天国是人之精神的完满状况,摆脱了愚昧与黑暗;地狱是人的精神的堕落状态;灵魂是指人类一切精神与意识的总和;复活的观念是与肉体无关的,而是指精神上的永存。

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的人学化趋势实际上正是宗教这种深层变革的反映。如生存神学的代表人物、法国的马赛尔从人、人的生存、人的生存体验出发谈神,认为上帝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在人之中的、与人这个主体不可须臾或分、依靠

人的生存体验而存在的东西，而不再是在人之上、在人之外的。上帝对人类而言，就好像“死者依靠我们回忆而活着”。另一位英国学者麦奎利则把神看作“解除生存紊乱”“达到自我”的工具。德国世俗神学家朋霍费尔认为，我们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的时代”，是一个神学世俗化的时代，上帝“取人的形式”，成为一个“为了他人的人”，上帝不再是一个抽象信仰。神耶稣叫人“跟从”他，目的就是承担当世的事业和苦难，是去“入世”，而非“出世”。瑞士加尔文宗教神学家巴特则认为，上帝的神性之意义和力量在于“他与人的对话的历史中”，在于“他与人的共存中”，上帝只是作为人的伙伴活着、说话和行动。上帝的神性并不排除人性，而是内蕴着人性，上帝的神性最终也只能归结为它的人性。而希腊神学家则明确地把上帝宣布为“人的理想”“人的希望”，根本否认作为客体的上帝的存在。德国神学家布洛赫提出，“人是人的上帝”，对上帝的信仰实质上是对“人类自由”和道德自律的信仰，而所谓人神合一实际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即人的希望、理想的实现，是“我将成为一个我将成为的人”。而莫尔特曼则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个面向未来、用我们的理想改造现实的问题。他用希望界定信仰，用未来界定希望，认为更新生活的力量在于顽强不屈、坚定不移的希望。

宗教及宗教精神的这种深层革新和转折，正是由科学理性的进步促成的。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总汇，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洞察力、研究成果及智慧。回顾科学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你会发现，历史上每一次科学的重大

突破，几乎都可以促成人类前进的步伐向科学理性更靠拢一些，而离宗教神学更远一点。

在人类历史的源头上，科学与宗教就与生俱来地纠缠在一起。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人类就有了科学活动的开端。人们通过观察在他们周围反复出现的各种关系，开始对自然有所了解，而且由于自然的规律性，人们还能够作出一定的预测，进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其周围环境。人类最初的这种认识形式往往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宗教中包含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许多宗教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为了了解释自然现象，而并非为了信仰。如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灵”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解释山、水、日、月、生、死、梦等事物和现象而产生的，并非一开始就是为了想像出这样一些东西供人们崇拜和信仰；自然崇拜实际上是对自然力的认识，如火是原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自然力，同时又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对火的崇拜中，包含着对火的认识特别是对火的作用的认识。信仰与科学的这种关系在巫术中最为典型。在现代人眼中，巫术通常被认为纯粹是骗人之术，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可言。实际上，巫术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知识，而且从人类科学认识史上看，巫术甚至干脆就是科学的来源。在古代，当巫术被用来祛病时，有对疾病的认识；而作为巫术的另一重要表现的占星术，其中则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因为占星术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观测天象，古人大量的天文学知识正是通过这样的对天象的观测获得的。可见，天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宗教联系在一起。

而当以宗教作为重要发端的科学知识，日渐积聚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摆脱巫术、迷信等超自然力量的影响，逐渐向科学理性靠近，开始以对自然规律的系统研究代替宗教、迷信。像我国古代，巫史不分，史官近于宗教官，与“巫”、“卜”等其他几种执掌宗教神事的宗教官之间，并没有明确分工。他们与巫祝一样，都是神权的执掌者，既负责传达上帝的旨意，充当神人之间的媒介，监督君王的言行，又负责记录先公先王的世系，记录君王的行事、言论及国家大事。如甲骨卜辞，既是上帝通过巫史向其在人间的代言人君王预示的吉凶祸福，同时也是记事之“史”。史官集记人事与知天道的职责于一身，甚至在巫、史有了较明确的分工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如汉代的太史令，其职责就包括了“国有瑞应灾异则记之”，“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然而，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正是出于巫史之中，如两度为太史令的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正是在对“历示吉凶”的“日月运行”的观测中，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指出了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他还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利转动的浑天仪及测定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在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他还不能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但是天文学的科学发展已促使他远离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他猛烈抨击谶纬迷信为虚妄，力主禁绝谶纬，反对以谶纬迷信欺世罔民，主张以理性治国理民。

在西方，科学发展对宗教的冲击表现得更为典型，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虽然由于宗教教会反对科学方法和科学

思想的强有力的反对，科学的进展是缓慢的，然而，科学还是在进入 16 世纪后取得了最伟大的进展。在中世纪的欧洲，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长期被基督教教会利用为上帝创世说的理论支柱。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经过近 49 年的观察和研究，终于创立了“日心说”，并于 1543 年出版了他的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继承了古希腊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实际观察的大量经验材料为依据，用严格的数学计算和推理，论证了“太阳中心说”。他指出，太阳是静止不动的，处于宇宙的中心，而地球本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行星，和其他行星一起都围绕太阳公转，同时绕自己的轴自转。这样，就以严整的科学形态驳斥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点，以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达 1000 多年的“地心说”。这次天文学上的伟大革命，给宗教及其神权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摧毁了许多重要的宗教信条和神学观点的理论基础，引起了人类宇宙观的革命。

“日心说”是几代科学家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之后，才为人们所接受的。哥白尼的著作被教会宣布为危险的异端邪说，查禁了 200 年之久。在哥白尼之后 100 年，数学家布鲁诺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被认为是“科学方法之父”的著名科学家伽利略虽然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对科学独立的信仰从来没有被动摇过，他因普及哥白尼的理论及对科学思想的其他贡献而遭到囚禁。经过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工作，哥白尼的学说不断得到证明和发展，使“

心说”最终得到承认，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如恩格斯所高度评价的，“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哥白尼是用他不朽的著作“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①。哥白尼的学说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为无神论提供了新证据，奠定了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有着重要意义。

建立在“地心说”基础上的“人类中心说”，与“地心说”一并为中世纪基督教会上帝创世说的理论支柱。“人类中心说”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是宇宙的中心，世界万物都是神为人而创造的，生物界的所有物种都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能在种的范围内变化，而决不能形成新种。19世纪初，地质学家们提出了与《圣经·创世纪》相左的理论，遭到教会的强烈谴责。近代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英国自然科学家、地质学家赖尔，于 1830~1833 年出版了近代地质学的经典之作《地质学原理》。他继承了先辈的地质研究成果，提出了地质进化论思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过去的一系列变化具有一致性，用丰富的实际材料证明了地球表面的各种特征都是由难以觉察的、作用时间较长的自然作用形成的；正是包括雨水、泉水、河流、冰川、潮汐、洋流、火山、地震等在内的各种地质作用，也就是破坏、搬运和沉积作用，在改变着地球的外部面貌。这种作用的过程及其产物在种类和规模上与过去并无不同，对它们的解释根本不需要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446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助于《圣经》或灾变。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这样高度评价了赖尔的科学贡献，“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①

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给予了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以相当大的启示。他不但接受、扩展了赖尔的许多观点，而且把赖尔的观点和方法从地质学扩充到生物学上，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物种是逐渐进化而来的。至此，继哥白尼“日心说”推翻“地心说”抽掉了基督教神学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柱之后，达尔文又提出了进化论，彻底驳倒了“人类中心说”。

达尔文学过医学、神学、地质学和自然历史，酷爱大自然。22岁时，曾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政府派遣赴南太平洋考察的皇家海军勘探船，进行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并采集了大量的地质、植物、动物标本。他根据大量的生物学材料，充分研究、继承前人关于生物进化的已有成果，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伟大著作《论通过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保存良种的物种起源》（通称《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阐述了生物起源和演化问题。他以自然选择为核心，从生物的变异、遗传、生存竞争和适应等各方面论证了物种是可变的、进化的、生物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奠定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在自然界物种形成的过程中，适合于某种自然条件的就被保留，不适用于某种自然条件的则被淘汰；同一物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3~1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种的个体之间、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物种与外界生存条件之间的生存斗争,促成了自然选择的不断进行。环境与物种之间、物种与物种之间、种内个体之间通过生存斗争,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促使其他因素的改变。然而,从长期看,整个生物界都在通过遗传和变异不断进化,从而构成自然选择的基础。他进而指出,物种起源的理论也完全适用于人这样一个自然的物种,人的生物体是从某些结构上比较低级的形态演进来的,人类的智力、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的心理基础等精神的特性也如同人体结构一样,可以溯源至较低等动物的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供了物种起源和进化的唯物主义答案,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目的论、神造论及物种不变论,给予了宗教神学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把进化论视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给予了高度评价。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达尔文学说在推动现代生物学的进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代表了人类对生物界认识的伟大成就,人们从此认识到,宇宙万物都是进化的产物,而绝非神创。

随着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人类日渐深入地认识着宇宙自然的本质与奥秘。现代社会的宗教都面临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这场冲突主要表现在对先知启示的情感依恋与科技理性的冲突,其尖锐性甚至使其丧失了妥协解决的可能性。为解决这一尖锐的矛盾,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出,除非人们认识到同一个字眼——真理,

在哲学家、科学家的用法中和先知们的用法中并不是指相同的实在，而是一个用来表述两种不同经验形式的同形异义词。这要求宗教做出的让步就是：不要再把先知启示放在居高不下的位置上，应在神的领域中为人的精神争取更大的地盘。同时，要求宗教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从中汲取探讨人类意识深层的驱动力。

有的宗教学者将宗教和科学比喻为人类前进中的两只翅膀，可以互相协调。当然，他们所讲的相互协调，并不是要以生硬的态度科学地解释宗教，或让宗教干扰科学发展的轨道，而是力图寻求宗教与科学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巴哈伊教之所以能在近 150 年间得到迅速发展，就在于它一直致力于寻求这种社会功能的互补，变幻莫测的人类精神作为上帝、造物的同位语成为其理解、探讨的核心。巴哈伊教高度关注世界范围的矛盾焦点问题，关注人权问题，关注地球环境保护，关注人类生存环境改善，关注人类伦理道德的提升，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与传统宗教相比，现代宗教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某种质的改变。传统的神的世界不再是现实人类苦难的避难所、庇护地，现代宗教更多的是要求以人类精神的力量去面对、去解决人间社会的种种问题。

与现代宗教的理性化、人文化趋势恰恰相反，现代邪教与迷信却更加背离科学和理性，尤其是邪教，还往往利用科学、理性的名义进行反科学、反理性、反人类、反社会的活动，大肆进行造神运动。邪教虽然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以宗教的面目出现，但实质上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歪理邪说，是

人类肌体上的毒瘤，不断侵蚀着人类社会。它对神灵的崇拜是一种低级形式的有神论，往往是教主为着现实功利的目的自封为神，骗取信徒对教主的特殊感情，与宗教的信仰有着天壤之别。一旦其反社会、反文明、反人性的邪恶本质为人们所认识，吹嘘自己有超凡人圣大神通的教主必然从神灵的宝座跌落凡间，现出其敛财骗色、破坏社会安定的丑恶面目。至于迷信，则往往与愚昧紧密相连，它对神灵的信仰，往往为着时下某个现实目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人们有事才求神灵。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迷信已越来越表现出其愚昧性和欺骗性。

如此，在科学理性面前，神灵越来越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宗教越来越偏重于满足人的情感的需要，而作为对神的崇拜，其信仰功能正在逐渐趋向消亡，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正因为宗教在当今社会还能够发挥情感方面的功能，所以宗教还有它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宗教还会继续存在着。但是，同宗教相比，邪教与迷信连起码的情感功能都没有，有的只是邪恶与欺骗，必然要被人们识破，最终只能走向灭亡的命运。

总体上说，科学的进步程度，就是神灵的消退程度；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学暂时所不及的领域，仍然可能成为神灵们一时的据点。

但是，我们坚信，科学终将战胜愚昧，神灵必将为科学所征服。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时代，“诸神司天”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神秘浩瀚的苍穹，正在日渐展露出它深邃悠远的宇宙之本；而我们大千世界千变

万化的生灵，终将戳穿因果轮回的虚妄，读出其精彩纷呈的生命基因。当神灵在人们头脑中消亡之时，宗教就不存在了，迷信就不存在了，邪教就更不存在了。照耀人类心灵家园的将永远是科学、人文、理性、智慧的光辉。

丛书总序

陈建坤

沐浴着 2000 年的明媚阳光,回望风云多变的 1999 年,我们不由顿生感慨:对中国而言,1999 年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这不仅因为诸多的大事喜事频临这个古老的国度,更是因为出现了邪教“法轮功”的千古奇观。在这出荒诞剧上演时,科学公理受到了公开的挑战,科学信仰受到了新的冲击,致使年迈的著名学者任继愈不得不站出来撰文指出:“当前国际上重大的事变提醒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愚昧也要挨打;在愚昧的基础上,也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因此,我们要在努力脱贫的同时,必须进行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那就是‘脱愚’。”“脱贫”离不开科学,“脱愚”更离不开科学。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科学的力量越来越有力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只有崇尚科学,破除迷

信,消除愚昧,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蓝图。

科学与迷信是对立的。崇尚科学就要破除迷信。科学使人强大,迷信使人愚昧。科学与迷信、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著名的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说过:“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愚昧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从林——巫术和迷信的从林——中发芽成长的,这片丛林一再地对知识的幼芽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鉴于科学与迷信、无神论同有神论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1982年党中央曾发文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是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1999年,我们党又经历了同邪教组织“法轮功”的斗争,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关系到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这一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它的哲学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一哲学的活力和源泉则是现代科学和科学精神。

江泽民总书记在对第二届科普工作会议的致信中指出:“科学技术被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就能更好地成为利用和开发自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力量。”同时他又指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可以引导人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促进人们牢固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人们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进行

社会实践活动。”科学的本质是探索和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科学精神是指导人们探索和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灵魂和动力。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导，无疑于航行在大海上的巨轮没有罗盘。构成科学精神实质内涵应具备这样的要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实际上任何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不管自觉不自觉，在他从事科学活动时，都在实践着这些要素。而科学理性的光芒恰恰蕴藏在这些要素之中。这不仅是人类认知外在自然和激发民智的基本要素，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整体理智升华的最重要的基石。

科学排除一切迷信，它不迷信教条，也不迷信权威。辩证的怀疑批判意识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素。怀疑意识在未知面前表现的并不是迷惘，也绝不等于无知，而是可以摆脱迷惑的清醒剂，是理性的最可靠的保护神。有了怀疑精神，人们才能独立地判断和思考，排除轻信和盲从，而接近科学理性。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法国哲学家库辛有句名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没有批判的理性，就会全盘接受先人或别人的知识和经验，并不自觉地失去纠正前人和他人错误的理论视野。没有批判的理性，在信息时代即使占有了大量的具体知识，也难以升华为超越他人的新见解。

科学精神一面是怀疑的意识和批判的理性，另一面则是研究者在探索未知和未来时所具有的谦恭的心态。它们是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是一个天平的两端。科学鼓励怀疑和批判，欢迎探讨和争论，这是科学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

件；但欠缺谦恭的心态，就有可能走向独断和唯科学主义，使科学探索背离其人文基础。在科学精神的天平上，我们不能偏向任何一边，而要努力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和必要的张力。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并不一般地否定信仰。事实上，无论自觉与否，人们都是在一定的信仰指导下从事自己的科学探索活动，任何的科学活动都不可能是无立场的探索，只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有的是在科学信仰的指导之下，有的则是在鬼神信仰的禁锢之中。科学信仰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一种革命的力量，越来越有力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它提升人的主体能动性，引导、激励人们为推动社会进步、创造先进文明而斗争。鬼神信仰则是一种祈求鬼神的启示和帮助、反科学的信仰，它必然禁锢人的主体能动性，消磨人们的意志。坚持科学信仰，反对鬼神信仰，是引导人们“脱贫”、“脱愚”，不断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可靠保证。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信仰。它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以遵循科学揭示的客观规律为使命的，是人们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巨大动力，是凝聚人心、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科学的理想信念教育始终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主线。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眺望科学征程的万重关山，拨开各种迷信的层层雾障，我们任重而道远。作为对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伪科学泛滥和消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反思，我们山东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了这套《科学与信仰》丛书，以

促进整个社会科学精神的弘扬和理性精神的重建。这套丛书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特点既不同于纯学术的著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普读物，它坚持学理与思辨并重，才情与理趣结合，力求为全社会提供一套有深度，有分析而又不是十分艰深的著述。它面向社会基本群众，面向广大青少年，注重思想性、可读性、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有机统一，避免以枯燥的教条向读者作空洞说教。本丛书以论入史，以史证论，以事喻理，寓教于趣，以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将科学的信仰传达给读者，以期收到持久的社会效益。

2000 年 4 月 26 日